开放学习研究（双月刊）
JOURNAL OF OPEN LEARNING

主　管：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北京开放大学

编辑部
主　　编：褚宏启
常务副主编：袁家政
副 主 编：李　哲
　　李锋亮
编辑部主任：吴亚婕
编　　辑：李　奕
　　刘春萱
　　张春华
英文编辑：杜　贤
发　　行：杜晨渝

出　　版：北京电大学刊杂志社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20日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北京电大学刊杂志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甲4号
电　　话：8610-82192129
投稿平台：openlearn.bjou.edu.cn
邮　　箱：openlearning@bjou.edu.cn
邮政编码：100081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6-15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0-1386/G4
定　　价：10.00元

版权声明：

1.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使用本刊的任何图文。

2. 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用于本刊的网络版、电子版，还将用于与其他数字媒体的合作推广。作者如有异议，请提前告知。

目　　次

第23卷　第5期　2018年10月（总第111期）

【开放学习实践】

增强规模化学习的创新
——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学会规模化学习会议概述
…… [美]李海英　[美]陈伯栋　[美]珍妮丝·戈贝尔（1）

新一代媒体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与反思
——2018年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综述
…… 封　晨（8）

新时代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互联网+”旅游教育学术论坛综述
…… 郭　莹　白晓晶　孙　黎（14）

【远程教育创新】

“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化研究
…… 郭玉娟（20）

“互联网+”时代下“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发展两面观
——在线教育领域中草根模式发展的问题分析
…… 孙雨薇　陈　丽（26）

【开放大学建设】

在线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
…… 韩　斌（34）

基于战略地图的我国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研究
…… 孙　丹（41）

【终身学习研究】

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内涵及价值阐释
…… [澳]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48）

新西兰老年教育：现状与政策概览
…… [新西兰]布莱恩·芬德森（56）

Contents

Innovations in Scaling and Enhancing Learning: Review on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 ***LI Haiying, CHEN Bodong and Gobert Janice***（1）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FENG Chen***（8）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a New Era：Summary of Academic Forum on Internet Plus Tourism Innovation…… ***GUOYing, BAI Xiaojing and SUNLi***（14）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Model Changes in Internet Plus Era ……***GUO Yujuan***（20）

Two-side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 Model under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l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 ***SUN Yuwei and CHEN Li***（26）

The Goal of Onlin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Whole Man" …… ***HAN Bin***（34）

Research on Strategic Planning Framework of Open University in China Based on Strategy Map …… ***SUN Dan***（41）

Wider Benefits of Seniors' Learning: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 ***Denise Reghenzani-Kearns***（48）

New Zealand Older People Education: Context and Policy Overview …… ***Brian Findsen***（56）

【开放学习实践】

增强规模化学习的创新

——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学会规模化学习会议概述

[美]李海英[1] [美]陈伯栋[2] [美]珍妮丝·戈贝尔[1]

(1.罗格斯大学 教育研究院，美国 新不伦瑞克 08904；2.明尼苏达大学 课程与教学系，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 55455)

【摘　要】规模化学习主要研究大规模、基于技术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而学习环境往往依赖复杂的数据储存、数据传送、数据计算、学习环境界面设计以及智能师生对话设计。2018年6月26日至28日，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学会（ACM）规模化学习会议（Learning at Scale，简称L@S）在英国伦敦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增强规模化学习的创新”。大会探讨了新时代下规模化学习和强化学习的创新研究，开发自动化评估和学生知识模型，提供自动化反馈以及学习干预，提高规模化学习系统的智适应性。此外，学者分别就在线学位政策和流程、反馈系统及其自动化发展以及测试试题新类型等三个议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先简要介绍大会总体情况，然后概括分析大会主旨发言、主要议题，并对会议代表性论文进行评述，最后论述规模化学习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规模化学习；网络学位；慕课；智适应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01-007

规模化学习 (Learning at Scale, L@S) 主要研究大规模、基于技术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规模化学习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artin, 2012)，人工智能导师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Li, Graesser, Gobert, 2017)，教育游戏 (Learning Games) (Shaffer, 2006)，协作编程社区 (Collaborative Programming Communities) (Fields, Kafai, Giang, 2017)，社区辅导系统 (Community Tutorial Systems) (Ahmed, Srivastava, 2017)。这些学习环境往往依赖复杂的数据储存、数据传送、数据计算、学习环境界面设计以及智能师生对话设计。通过大规模数据运算，规模化学习可以通过一个或几个专家辅导多个学习者并实现个性化学习的智适应教育。规模化学习会议于2014年成立，是规模化学习尤其是在线教育和大数据结合的一个国际性会议。

本次规模化学习会议收录四类论文：长篇研究论文 (Full Research Papers)、长篇综述论文 (Full Synthesis Papers)、墙报 (Work-in-Progress Posters) 和展示 (Demonstrations)。由于规模化学习研究的跨学科性，参会人员来自包括学习科学、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 (Kross & Guo, 2018)。此次会议为这些

本研究由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包括2个课题：课题编号NSF-IIS-1629045，课题主要负责人为罗格斯大学的Janice Gobert和来自Apprendis公司的共同负责人M. Sao Pedro；课题编号NSF-DRL-1252477，课题主要负责人为罗格斯大学的Janice Gobert）。本文中的观点、研究结果和结论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并不代表课题资助机构、合作机构和其他个人的观点。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1

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交流和研讨的平台，以服务于提高学习效益和质量的目的。

本文主要涵盖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简述本届大会概况；第二部分简述本届大会的两个主旨报告讨论的最新学习模式；第三部分针对本次大会的24篇长篇文章探讨规模化学习的网络学位政策和流程、学习系统和研究内容以及测试评估试题类型；最后一部分展望未来规模化学习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通过展现规模化学习的国际研究、发展与局限，本文旨在对我国规模化学习的研究提供发展方向，促进我国规模化学习环境的开发和研究。

一、会议概述

2018年6月26日至28日，为期三天的第五届国际计算机学会旗下的规模化学习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这次会议与第十三届学习科学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ICLS）和第19届人工智能教育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IED）联合召开，共同组成历时一周的“英国伦敦学习节”（London Festival of Learning），盛况空前。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增强规模化学习的创新”（Innovations in Scaling and Enhancing Learning），开幕式上L@S现任主席、卡耐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究所和心理系教授Kenneth R. Koedinger致欢迎词。第二天（27日）三会合一，各个领域专家汇聚一堂，共同庆祝学习节的开幕。开幕式上，三个会议主旨报告的演讲者共同登台，并于当天下午同时做了主旨报告。人工智能教育国际会议的主旨报告者有Tom Mitchell教授，来自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是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先驱，是最早编写数据挖掘课本的作者，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成员。代表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的主旨报告者是来自于悉尼技术大学的学习信息学的Simon Buckingham Shum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学习分析、文本分析、意义建构以及集群智慧。还有大规模学习会议邀请了美国作家、演讲家、教育家、企业家和计算机科学家Gever Tulley，他是Brightworks、Tinkering、非营利的Applied Tinkering研究所和教学包制造商Tinkering Labs的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围绕学生学习的概念。规模化学习会议在大会第一天还邀请美国西北大学教育和社会政策学院的副教授Nichole Pinkard作了主旨报告。Pinkard是数字青年网络（Digital Youth Network）的创始人，也是社会学习平台Remix Learning的共同创始人。

另外，在27日开幕式之后，会议上7位最佳论文作者作了报告。除上文提到的三个会议，还有以下四个会议和协会也参与了进来，包括文本与话语协会（Society for Text and Discourse， ST&D）、欧洲科技增进学习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EATEL）、学习分析研究协会（Society for Learning Analytics Research, SoLAR）和教育数据挖掘协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Society, EDM）。27日中午，AIED、ICLS和L@S三个会议选出年轻研究者进行了“极速演讲”，并通过墙报展示了他们的研究。当天下午，三个会议共同征集并收录的10篇文章的作者也作了报告。这种不同会议多样化的联谊是一个空前的创新，表明这几个会议虽然研究重点不尽相同，却有着跨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例如教育数据挖掘可以应用到各个与教育有关的会议，语篇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与教育也密切相关，而自然语言处理里的建模与数据挖掘又息息相关，自动化评分的实现又会促进人工智能学习以及测试评估系统的个性化学习设计，学习分析与语篇分析结合通过数据挖掘可以找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瓶颈。由此可见，大规模会议与教育技术、语篇分析、学习分析、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研究等研究领域虽研究重点不同，却密不可分。

本届规模化学习会议收到投稿312篇，收录63篇，其中长篇论文24篇（收录率38.1%）、墙报31篇（49.2%）、展示8篇（12.7%）。每篇文章有三位或四位专家审稿人，收录率为20%[①]。我们对63篇论文全文进行了高频词统计分析，图1展示本届会议论文出现频率较高的单词分布。其中排名前五的高频词分别为学生（Students/Student）、学习（Learning）、课程（Course/Courses）、数据（Data）、在线（Online）。这些词反应了规模化学习会议的研究核心，即通过数据分析学生在线课程学习的状况。本文在第三部分研究主题中将概述代表性长论文的研究主题。

图1 第五届规模化学习会议论文题目中的高频词云图

二、主题报告

Nichole Pinkard的主旨报告题为“STEM学习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吗？为学习建设覆盖社区的社会技术设施”。Pinkward提出如果我们想为年轻的学习者设计一种新型学习方式，让每位学习者平等地为未来生活

做准备，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习的基础设施，设计大型社会技术系统，开发共享资源，通过数据来引导我们的行动和再设计理念。Pinkard提出一个新的社会技术系统框架，这个框架适用于大规模的，如市级或地区级的学习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学习和同伴交互可以跨越学校、家庭以及社区的学习空间。Pinkard通过实例详细剖析了这种学习模式。例如，我们为一个学习者设计一个针对这个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计划，学习者需要将来掌握程序设计、网页设计、图形创建、数字影视制作、数据库创作和机器人技术（Pinkard & Austin, 2014）。为帮助学习者达到这个目标，学校会为学习者提供一些相关选修课程，如计算机、科学技术等相关科目的课程，也会提供一些课后课程。在家里，家长会培养孩子相应的兴趣爱好，并帮助孩子利用家里的资源丰富学习内容。在社区，配套的图书馆、技术中心、博物馆以及课外俱乐部也会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甚至在学习同伴家里，也会通过娱乐、游戏、课题项目和家庭作业等方式将具有相同爱好和志向的学生聚在一起，共享资源、共同学习。另外还有通过网络途径获得的各种书籍、辅导或在线资源等。这样，学习者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有足够的社会技术资源帮助他获取所需的知识。基于这些想法，Pinkard团队设计了一个名为iRemix的社会学习网络（Social Learning Network），把学校课程、家里自学和课后兴趣活动（如数字视频、平面设计、机器人、电子游戏）链接起来。iRemix的数据库平台为问卷调查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数据采集和分析提供可能，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为进一步改进社会技术系统指明方向。这种社会学习技术设施打破了传统的单把学校看做学习基础设施的思想，将可用的全部社会资源调动起来，让地方财政、社会企业和个人资助、社区机构、学校相互配合，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推动下为学习建设新的社会技术设施。这一关注教育生态的理念势必成为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第二个主旨报告来自Gever Tulley，题为“内在动机是投入学习的途径”（Intrinsically Motivated Pathways to Engaged Learning），主要探讨了把学生当作共同创作者的新型教学框架对学习投入的作用，并通过早期教育中各种有趣的故事和实验结果讲述投入在学习中的重要性。Tulley创建的Brightworks学校以动手和项目式学习来满足不同年龄层学生的不同需求，打破了学校与社区的壁垒。学校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创造力、毅力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一套名为“Brightworks弧”的学习框架激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学生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世界的奇妙和探索的快乐，并且通过合作的形式将想法变成现实，彼此交流他们的探索过程。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学生、家庭、志愿者以及支持者等多方协同的社区环境下进行的。“Brightworks弧”每年涵盖三个主要内容：开始阶段的问题探索（Exploration），经过探索后对实验、研究项目或研究情况的表达阶段（Expression）以及最后向社区或学校通过书面写作、口头演讲、问答形式或展板（Exposition）。Brightworks网站[②]详细介绍学生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提出他们的研究问题（如学生穿什么衣服去上学？水是如何进入到城市里的？人脑如何进化？），进行科学探索和实验，最后进行丰富多彩的报告。Brightworks以学生探索为主要教学模式的理念与美国甚至全球的科学测试新模式相吻合，这种科学探索的评估也必将成为规模化学习的一个研究和发展重点（Li, Gobert, Graesser, & Dickler, 2018）。

三、研究主题

24篇长篇文章的作者在大会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其中包括两篇综述和22篇研究论文。各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中，各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韩国、以色列、法国和德国，2位来自荷兰，17位来自美国（71%）。较之前四届会议68篇文章的第一作者都来自西方国家（包括一位来自微软的印度研究院），今年规模化学习会议的研究者更趋于国际化。另外，跨国合作研究在本次会议也逐渐增多。虽然 7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但是4篇的合著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美国。

从研究话题上看，24篇文章中11篇文章是针对慕课、网上学位或辅导的研究，2篇文章探讨人工智能导师系统，3篇对语料库进行分析。其中10篇文章的研究重点是学生模型（Student Modeling）或者知识模型（Knowledge Modeling）。研究的分析方法不仅有传统的T检验、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还有数据挖掘中常用的聚类分析、贝叶斯分类、决策树以及深度学习常用的深度知识追踪和神经网络。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根据24篇文章内容进行分类，主要介绍以下三个研究话题：在线学位政策和流程，学习系统、研究内容以及测试评估试题类型。

（一）在线学位的运作政策和流程

规模化学习不仅限于慕课（大规模在线课程），还包括日益流行的普通高校在线课程。国外许多高校认可学生在慕课所修的学分。因为慕课一般都是由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授课，学生获益不比在本校面授或网络授课少。另外，在慕课修学分要比在学校修学分节省很多费用。即使将来学生在慕课每个学分付200美元的费用，相较高校一学分484至543美元的费用依然便宜很多（Haynie, 2015）。除慕课之外，在线学位在国外也逐渐兴起，教育技术和教学设计等专业在一些学校开始全网络授课。如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的“全球校区”和新组建的普渡大学全球分部（Purdue University Global），都有资质向在线学员授予各级学位，还有一些传统的远程教育高校，如英国开放大学和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所有学位都通过线上授课、辅导，校本部仅有行政人员、教授和研究人员。一个在线学位全部费用大概在6 100至7 100美元之间，一个学期16周的课程约510美元（Joyner, 2018），这比在校获取学位低廉了很多。另外，网络学习不限于时间和地理位置，这种便捷更是在校学习无法相比。既然网络学位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那么如何加强网络学习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以及学术诚信和操守是十分重要的。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Joyner（2018）调查研究了一个网络计算机硕士项目。不同于传统的远程教育，此项目拥有全面认证，相当于在校项目，遵守学分制标准，所有课程都有教师反馈、学术诚信和可信的评估。Joyner提出了名为“大型互联网支持的异步学位”的概念（Large Internet-Mediated Asynchronous Degrees, Limeades）。在线项目的学生年龄相对较大，有全职工作、家庭，这些学生特征对教师办公时间及团队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时学员背景的多样化又有利于他们相互的交流与学习。Joyner提出运作在线学位的一些主要工作流程和政策。在线教育的学生必须像在校学生一样在相同的注册时间和程序注册课程。每个班级学生人数根据教学助理的人数而定，而不是根据传统教育的教室大小制定班级人数。另外，每门课程与传统教育一样都有针对抄袭、合作、匿名和隐私的政策，并且给学生提供抄袭检测工具，从而降低抄袭率。为与在校学位保持一致，在线学位必须保证教师对学生能力的评估和反馈。人工评分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如随机把学生试题分配给教学助理，每位教学助理负责批改某道试题或试题的某个部分，或批改某些学生的全部试题。另外，自动化评分和反馈越来越多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课程中使用，有提交作业立即收到反馈的同步评分和使用本地测试脚本对学生提交的作业批量评分和反馈的非同步评分。

在线学位项目师生互动的形式有论坛交流（如Piazza平台）和办公时间交流。论坛交流采取虚拟课堂的形式，主要有问答和通知的形式。为了及时、准确回答学生的问题，教学助理通过指定论坛、每日论坛、话题论坛和自由论坛回复学生。教师办公时间辅导有使用网上视频软件与学生沟通的传统模式，也有通过提前搜集学生问题、视频通话或者聊天室现场回复并将录音分享给所有学生的补充形式以及使用工作聊天工具（如Slack）直接回复学生的文本形式。

由此可见，在线学位为了保证学位的质量在政策和流程上日臻完善。随着国际在线学位的增多和对在线学位的认可，中国教育人数众多，完善在线学位，提高认可度也将提上日程。

（二）反馈系统及其自动化发展

Kross 和 Guo (2018) 对前四年 (2014~2017年) 规模化学习会议的69篇长篇文章进行总结，从反馈模式角度将规模化学习系统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系统。一对一系统指研究非同步的同伴反馈 (Joyner et al., 2016；Staubitz et al., 2016；Waters Tinapple, Baraniuk, 2015）。一对多系统指一个专业讲师针对多个学生给出反馈。如在慕课中，使用文本分类技术可以将简答题聚类分析，将结果反馈给学生 (Brooks, Basu, Jacobs, Vanderwende, 2014；Head et al., 2017；Wiese, Yen, Chen, Santos, Fox, 2017）。多对多学习系统指将非常优秀的学生作业解答汇集起来作为标准答案发给其他学生以供参考 (Williams et al., 2016）。学习系统的反馈研究与自动化评分系统的研究密不可分。自动化评分系统可以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给出个性化反馈（Kwon & McMains, 2015；Lan et al., 2015），还可以根据学生日志文件 (Log Data)，即学生行为对学生的下一步学习进行推荐或引导 (O’ Rourke, Ballweber, Popovii et al., 2014；Pardos, Tang, Davis, & Le, 2017)，即我们所有的智适应教学 (Intelligent Adap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本届会议的研究仍旧围绕系统的自动化发展。如Davis、Seaton、Hauff和Houben (2018) 根据学习设计的原则通过转换概率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和轨迹挖掘（Trajectory Mining) 方法将177门慕课教学设计进行自动化编码，并比较这些课程的设计，探讨了慕课设计是否在结构 (如视频等) 上有不同。随着教育内容的增多，人工设计足够的练习和测试题越来越难。Wang 等 (2018) 使用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模型根据教育内容 (如课本) 自动生成测试题目，由此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称为QG-Net。依据人工评估与标准题库评估，QG-Net生成的问题比当前的以神经网络和规则为基础的系统生成的问题更精确。除此之外，自动化还表现在规模化学习线上讨论的自动化分析 (Fiacco & Rosé, 2018)；认知投入的自动化分类和可视化 (Yogev, Gal, Karger, Facciotti, Igo, 2018)；通过计算机视觉算法从视频中自动提取源代码和动态编辑信息以促进学习者与视频互动 (Khandwala & Guo, 2018)；自动介入学习鼓励学生适时寻求帮助（Teusner, Hille, & Staubitz, 2018）。

知识追踪研究的目的也是为更好地实现个性化学习，只有了解学生在学习系统中的学习历史以及知识点的掌握，建立学生模型，才可以设计针对每个学生的智适应学习系统。这类研究以学生知识模型为主，力图了解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知识，什么时候知道的，并对学生课

前、课中以及课后的知识进行建模，来帮助教师明白课程材料需要如何改进，如何在学生遇到瓶颈时进行干预，了解学生是否已经准备好学习更多的知识。Yeung 和 Yeung (2018) 使用神经网络模型即深度知识追踪为学生建模，将重建 (Reconstruction) 和波纹 (Waviness) 的正则化概念 (Regularization Terms) 引入深度知识追踪模型的损失函数 (Lost Function)，此方法比传统方法效果更好。纵观四届会议论文，系统的自动化研究以及知识追踪模型的开发是规模化学习会议的重点研究内容，也是智适应系统的开发和完善的关键。系统自动化研究不只局限于对学生文本输入作业以及在线讨论的自动化评估，并且有向评估测试题目自动化生成发展的趋势。学生知识追踪模型不仅在模型建造的算法上有突破，对学生信息采集的方法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学生日志文件、文本输入信息，还有通过设备和仪器收集的学生在学习中的情感、脑神经信息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个性化学习将在在线学习的课程中大规模实现。

（三）测试评估试题类型

规模化学习的一个目标就是提供跨越教师、学生、科目、课程以及媒体的教育实践新观点。有效的教学应该提供有效的学习内容、教学活动以及与学习目标相匹配的评估工具。一份试题的好坏取决于试题是否测试教师所要评估的学习目标，也就是试题的效度 (Validity) 以及多次测试的高度一致性，也就是试题的信度 (Reliability)。另外一个标准是测试题目是否有很好的区分度 (Discriminative power)，即高分、低分学生在全部学生或某类学生中的比例。另外好的试卷容易操作且不会有评分偏差 (Bias)。

Laskowski、Karayev和Hearst (2018) 研究了大学STEM课程中将近1 780份笔答的总结性评估试卷的测试题型，每份试卷的被试不低于100人。数据由教育公司Gradescope收集，包括120 000个学生回答的22 854道不同的测试问题。研究者将试卷扫描到网页应用程序，然后注解人员通过详细的注解找到教师们目前使用的试题形式。研究者突破过去传统问题二分法 (单选题或问答题) 研究的局限把问题分成7类：二选一 (有两个备选项)、多选一 (有多个备选项)、简答题 (填空或简答)、中篇问答题 (答案是一句话或一个段落)、长篇问答题 (答案是几段或一页)、多题型以及画图题。作者比较了这七类问题在不同课程的分布以及在试卷中的地位与学生分数的关系。作者通过随机效果的方差分析为每一个题型构建了测量信度，评估出每个题型的问题所需要达到相同水平的信度。结果发现，长篇问答题信度更高，二选一和多选一信度较低。具体说，三个以上的单选题或五个以上的判断对错题有可能达到一个长篇文字叙述题的信度。七个题型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学生能力通过七个题型检测，其分值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关度超过70%，但是判断对错和单选题相对其他题型相关性很低。另外，线性混合效果模型分析还发现教师们采用从易到难的顺序排列问题。

与此相关，Li、Gobert和 Dickler (2018) 研究了一个名为“模拟科学探索” (Inq-ITS) [③]的人工智能导师系统中的题型。其中包括：多选一的内容知识前测，学生在模拟实验室中的探究实验 (如根据研究问题提出假设、收集数据、分析和诠释数据) 以及开放式的科学解释题型 (李海英，Graesser，& Gobert，2017)。Li、Gobert和Dickler (2018) 用学生内容知识、科学探索操作水平以及写作水平来预测学生科学知识的写作质量。结果显示三种水平知识可以显著预测学生的论点质量，但只有写作水平可以有效预测学生的论据和理由。研究进一步支持他们之前的研究结论：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与写实验报告的能力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如果科学测试侧重简答或实验报告，那么具有高水平实验操作能力的学生就会被错误评估为科学能力很低。相反，如果科学测试侧重实验操作，那么具有高水平实验报告写作能力的学生就会被错误评估为科学能力很低 (Li，Gobert，& Dickler，2017)。为避免错误评估学生科学水平，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已经逐渐增加模拟环境下的科学探索题目，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测在科学测试中也逐渐加入模拟探索实验室的测试题目 (Li，Gobert，Graesser，& Dickler，2018)。

四、未来研究趋势和展望

根据会议主旨发言和主要议题，规模化学习大会展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首先，参会作者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国际合作研究逐渐崭露头角，说明规模化学习的发展已趋向全球化。纵观历届会议，长篇论文的作者至今没有来自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的高校，但是在墙报和展示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高校和教育公司的研究人员，说明我国也开始逐渐重视规模化学习的研究。其次，在线学位或网络学校也已蓬勃发展，对于全球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终身学习意识的提高有推进作用。在线学位发展的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需要完善相应的政策和流程使在线学位得到进一步认可。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线学位无疑可以帮助缓解教育资源有限的矛盾，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在线学位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再次，随着数据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自动化在线学习环境越来越深入，不仅推动更多的自动化评分功能的提升，而且自动化教学设计、自动化问题设计等也成为发展趋势。为了实现个性化学习，学生知识模型追踪一直以来是规模化学习会议的研究重点，这一趋势将来势必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国有强大的科学技术人员队伍，为大规模开发个性化在线学习课程提供了研究基础，而政府的资金投入也为在线课程开发和研究提供了保障。此外

测试评估试题创新也是国际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现有的传统测试题型（如封闭题型和开放题型）已经不能满足新技能（如探究式学习技能和合作问题解决技能）的评测。探究式学习不仅已经成为学习参与的核心理念，而且以探究为基础的虚拟实验室测试已经进入大型国际考试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在线科学课程也可以设计相应的虚拟科学实验室，为学生的科学探索提供平台，也可以在测试题目中加入更多科学实践的要素（如提出假设、收集数据、分析理解数据），以更全面地支持和评测学习。同样的，合作问题解决技能也已经进入国际考试中，合作问题解决的测试评估注重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虽然有通过聊天信息和行为进行评测，但是至今未有一个高效度和高信度的评测工具。最后，由地方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等构成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可以打破只以学校为教育唯一途径的局面，进而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有效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注释

①详见会议论文集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3231644.

②详见Brightworks网站http://www.sfbrightworks.org.

③详见Inq-ITS相关网站http://www.inqits.com

参考文献

[1] 李海英， Graesser, A. C., Gobert， J.（2017）. 具身在人工智能导师系统中隐身何处?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79-91.

[2] Ahmed, T., & Srivastava, A. (2017).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the behavior of technical users. A study of developer interaction at StackOverflow [J]. Human-centric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7(1):8. DOI: 10.1186/s13673-017-0091-8.

[3] Brooks, M., Basu, S., Jacobs, C., & Vanderwende, L. (2014). Divide and Correct: Using Clusters to Grade Short Answers at Scale [C] // In A. Fox, M. A. Hearst, & M. T.H. Ch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Conference. New York, NY: ACM Press: 89-98.

[4] Davis, D., Seaton, D., Hauff, C., & Houben, G. (2018). Toward large-scale learning design categorizing course designs in service of supporting learning outcomes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 10.1145/3231644.3231663.

[5] Fiacco, J., & Rosé, C. (2018). Towards domain general detection of transactive knowledge building behavior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55.

[6] Fields, D. A., Kafai, Y. B., & Giang, M. T. (2017). Youth comput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wild: Understanding experience and equity in participating and programming in the online scratch community [J].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ing Education (TOCE), 17(3). DOI: 10.1145/3123815.

[7] Haynie, D. (2015). Opportunity for credit a new hook for MOOCs. U.S. News & 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education/online-education/articles/2015/05/27/chance-for-credit-gives-new-life-to-moocs [N]. 2015-05-27.

[8] Head, A., Glassman, E., Soares, G., Suzuki, R., Figueredo, L., D'Antoni, L., & Hartmann, B. (2017). Writing Reusable Code Feedback at Scale with Mixed-Initiative Program Synthesis [C] // In J. Reich & C. Thill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2017)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89-98.

[9] Joyner, D. (2018). Squeezing the Limeade: Policies and Workflows for Scalable Online Degrees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49.

[10] Joyner,D.A., Ashby, W., Irish, L., Lam, Y., Langston, J., Lupiani, I., Lustig, M., Pettoruto, P., Sheahen, D., Smiley, A., Bruckman, A., & Goel, A. (2016). Graders as Meta-Reviewers: Simultaneously Scaling and Improving Expert Evaluation for Large Online Classrooms [C] // In V. Aleven, J. Kay, I. Rol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2016)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399-408.

[11] Khandwala, K., & Guo, P. J. (2018). Codemotion: Expanding the design space of learner interactions with computer programming tutorial videos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52.

[12] Kross, S., & Guo, P. J. (2018). Students, systems, and interactions: synthesizing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learning@scale and charting the future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62.

[13] Kwon, Y.P., & McMains, S. (2015). An Automated Grading/Feedback System for 3-View Engineering Drawings Using RANSAC [C] // In D. M. Russel & B. Woolf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2015)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157-166.

[14] Lan, A.S., Vats, D., Waters, A.E., & Baraniuk, R.G. (2015). Mathematical Language Processing: Automatic Grading and Feedback for Open Response Mathematical Questions [C] // In D. M. Russel & B. Woolf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2015)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167-176.

[15] Laskowski, P., Karayev, S., & Hearst, M. (2018). How do professors format exams? An analysis of question variety at

scale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67.

[16] Li, H., Gobert, J., & Dickler, R. (2017). Dusting off the messy middle: Assessing students' inquiry skills through DOIng and writing [C] // In E. André, R. Baker, X. Hu, M. Rodrigo, & B. du Boulay (E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IED 2017.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10331). Cham: Springer: 175-187.

[17] Li, H., Gobert, J., & Dickler, R.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and the proficiencies of content, inquiry, and writing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60.

[18] Li, H., Gobert, J., Graesser, A. C., & Dickler, R. (2018). Advance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science inquiry assessment [J]. Policy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71-178.

[19] Martin, F. G. (2012). Will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change how we teach?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5(8):26-28.

[20] O'Rourke, E., Ballweber, C., & Popovií, Z. (2014). Hint Systems May Negatively Impact Performance in Educational Games [C] // In A. Fox, M. A. Hearst, & M. T.H. Ch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Conference. New York, NY: ACM Press: 51-60.

[21] Pardos, Z.A., Tang, S., Davis, D., & Le, C.V. (2017). Enabling Real-Time Adaptivity in MOOCs with a Personalized Next-Step Recommendation Framework [C] // In J. Reich & C. Thill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2017)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23-32.

[22] Pinkard, N., & Austin, K. (2014). The digital youth network learning model [C] // In B. Barron, K. Gomez, N. Pinkard, & C. K. Martin (Eds). The digital youth network: Cultivating digital media citizenship in urban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7-40.

[23] Shaffer, D. W. (2006). How computer games help children lear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7-40.

[24] Staubitz, T., Petrick, D., Bauer, M., Renz, J., & Meinel, C. (2016). Improving the Peer Assessment Experience on MOOC Platforms [C] // In V. Aleven, J. Kay, I. Rol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2016)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389-398.

[25] Teusner, R., Hille, T., & Staubitz, T. (2018). Effects of automated interventions in programming assignment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50.

[26] Wang, Z., Lan, A. S., Nie, W., Waters, A. E., Grimaldi, P. J., & Baraniuk, R. (2018). QG-Net: A data-driven question generation model for educational content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54.

[27] Waters, A. E., Tinapple, D., & Baraniuk, R. G. (2015). BayesRank: A Bayesian Approach to Ranked Peer Grading [C] In D. M. Russel & B. Woolf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2015)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177-183.

[28] Wiese, E.S., Yen, M., Chen, A., Santos, L.A., & Fox, A. (2017). Teaching Students to Recognize and Implement Good Coding Style [C] // In J. Reich & C. Thill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2017)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41-50.

[29] Williams, J.J., Kim, J, Rafferty, A, Maldonado, S, Gajos, K.Z, Lasecki, W.S., & Heffernan, N. (2016). AXIS: Generating Explanations at Scale with Learnersourc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C] // In V. Aleven, J. Kay, I. Rol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2016)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379-388.

[30] Yeung, C., & Yeung, D. (2018). Addressing two problems in deep knowledge tracing via prediction-consistent regularization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47.

[31] Yogev, E., Gal, K., Karger, D., Facciotti, M. T., & Igo, M. (2018). Classifying and visualizing students'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course readings [C] // In S. Klemmer & K. Koeding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New York, NY: ACM Press. DOI: 10.1145/3231644.3231648.

作者简介

李海英，博士，美国罗格斯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智能系统、自动化评估、学习分析、语篇分析、语言和语篇加工等。

陈伯栋，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学习分析学、计算机辅助的协作学习、在线学习等。

珍妮丝·戈贝尔（Janice Gobert），博士，罗格斯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智能系统、科学探索、可视化学习等。

（下转第19页）

【开放学习实践】

新一代媒体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与反思

——2018年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综述

封 晨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香港 999077）

【摘 要】为促进教育传播科技的发展、提高香港教育技术专业水平，香港教育技术协会为广大研究者与实践者搭建交流平台来分享专业经验。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于2018年7月25日至2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大会主题是新一代媒体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与反思。本文将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描绘教育变革的趋势和挑战。新一代媒体推动了教育变革，包括创设了新的学习空间、汇聚了新的办学力量、催生了新的供给方式、孕育了新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时代教育变革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理论陈旧、对媒体角色认识局限、体制机制不适应。新时代教育技术学研究呈现出新的方向以应对挑战，包括研究教与学的新规律和新原理、研究海量信息管理方法、重新定义教学与学习以及开展教育技术学元研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帮助读者把握教育变革的新趋势，认识教育技术学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新一代媒体；颠覆型技术；教育变革；趋势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08-006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式，正在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着各领域业态的优化、增长和创新。教育作为最具广泛和长远影响的重要领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正在发生从班级授课式、标准化服务走向灵活、多样、开放、终身的个性化教育的深刻变革。这种变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良，而是生产力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虽然与商业、金融等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教育领域的变革略显缓慢，但这种变化已然拉开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序幕。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在教育领域推进“互联网+”（李克强，2018）。两会代表共同呼吁推进“互联网+教育”，促进教育变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数据的出现，将对现有的教育形态产生巨大冲击”，将迫使工业时代批量化生产人才、标准化培养人才的现象发生变革，“一种对整个教育产生整体性冲击的变革即将来临”（周洪宇，2018）。在实践中，新一代媒体正在推动教育系统呈现结构性变革，这种趋势以及带来的挑战在2018年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上已充分体现出来。

一、会议的总体情况

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是每年一次的例会，已经成为汇聚国内外教育技术学领域最新成果的高端学术平台，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2018年香港教育技术学术年会于7月25日至27日如期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会议由香港教育技术学会主办，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承办。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学系Liping Deng教授担任大会主席。2018年会议的主题是“新一代媒体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与反思”，分八个方向，分别是：①便携式媒体；②学习分析与教育人工智能；③游戏学习与泛在学习；④慕课与开放教育；⑤设计与应用；⑥社交空间与学习环境；⑦教育中的社交媒体；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2

⑧新一代媒体应用的伦理与挑战。会前，大会征集到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的16篇论文被论文集收录，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意大利、菲律宾、土耳其、南非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论文集已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会议邀请了三个大会主题报告，第一个主题报告人是美国教育技术学会的前任主席、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布朗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新一代媒体与教育变革”；第二个主题报告人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王周绮华教授，她报告的题目是“利用AR技术提高学生对诚信与伦理的重视水平”；第三个主题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陈丽教授，她报告的题目是“颠覆型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趋势：中国大陆的经验”。会议组织了一个大会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新一代媒体对学习的影响：证据与评判方法”。会议还组织了7个工作坊和11个平行交流论坛，参会代表共80余人。

二、新一代媒体推动教育变革的趋势和方向

在聆听本届会议的主题报告、大会论坛和参与分组交流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媒体具有的颠覆性特征，即打破原本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轨迹，创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其不仅给教育带来了创新手段和新机遇，还对传统教育体制机制提出了挑战。与前期增强型媒体创新不同，新一代媒体已经成为教育的内生动力，正在推动教育结构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一代媒体创设新的学习空间

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一代媒体具有泛在性、普及性、时空灵活性和操作简单性特点，使学习者可以方便地运用移动终端进行自学或者与其他同学交流。AR等新一代媒体不断提高学习过程的沉浸感和参与感，使学习体验和学习参与性不断提高。新一代数字原住民容易适应网络空间中的各种学习活动，新一代媒体正在促进情境学习和体验式学习的普及与应用。

在第一个大会主题报告中，来自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布朗斯教授明确指出，新一代媒体可以提供认知工具，更好地支持和促进教室内的经验性学习。经验性学习一般只是指基于真实经验或者观察实践的学习，由于学校中的教室远离实践场所，过去经验性学习只能发生在工作场所。新一代媒体可以在教室内创设问题情境，支持学习者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完成知识迁移。他还提出，在新一代媒体的支持下，教室变成以学生为中心、支持实操的体验式学习空间（Branch，2018）。新的学习空间（见图1）包括学习者、媒体、学习内容、教师和同伴五个要素，在精心的教学指导下，学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实现特定的学习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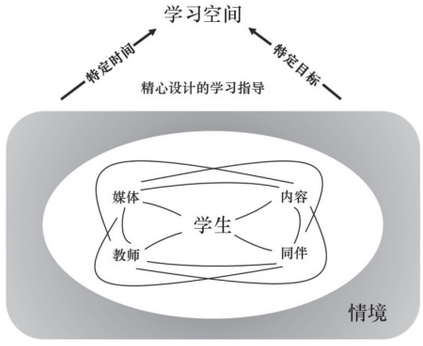

图1 学习空间

在大会的第二个主题报告中，香港浸会大学的王周绮华教授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新一代媒体促进情境学习的成功案例。王周绮华教授目前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全人教育教与学中心的主任。作为中心团队负责人，她正在主持一个实验项目，项目的名称是“利用基于AR的App，促进情境学习，提高学生对学术诚信的认知水平”。课题的主要目的是整合移动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AR），开发一个以学术诚信为内容的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手机应用软件和学习资源，支持学生在生活中利用手机开展情境学习，提高大学生对学术诚信的认知水平。实验项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资助的课题，课题经费为800万港币，研究时间是2014年秋至2018年。经过前期的研发，课题团队于2015年1月正式推出了4个诚信教育的专题，学生可以用手机应用和AR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截至2018年6月课题组完成了11个单元的AR学习资源的开发，共有来自香港五所大学的4 427名学生参与了实验。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质性反馈和学习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实验情况进行了跟踪。结果发现，多数学习者对基于新技术的情境学习体验很感兴趣，情境学习确实提高了他们对学术诚信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课题开发的工具和学习资源即将推广到更多的学校和香港社区。该项目展示了移动终端和AR技术正在进一步促进和支持情境学习。

笔者认为，两个主题报告中的体验式学习和情境学习从本质上是同一类学习，都是通过创设沉浸式的学习情境，辅以混合式学习与适应性学习设计、学习分析（王宏，肖君，谭伟，2018），帮助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的过程。新一代媒体正在不断丰富并快速普及交互式和沉浸式的学习工具，使学习更加有趣和有效。

（二）新一代媒体汇聚社会的办学力量

新一代媒体不仅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还撬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办学和服务。陈丽教授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大陆互联网教育产业的兴起。在中国大陆，互联网教育产业是与新一代媒体教育应用应运而生的新业态，发展态势迅猛，2018年预计市场规模超过3 000亿人民币（知识库，2017）。互联网教育产业不仅提供信息化装备、软件、资源和平台，还直接提供教学服务和学习社区，教学服务内容覆盖从K12教育，到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所有学段，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笔者认为，互联网教育兴起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大陆新阶段教育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与个性化优质的终身学习需要之间的矛盾，外在动力是新一代媒体的联通功能使教与学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互联网教育产业的兴起一方面弥补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教育服务质量监管提出了新挑战。

高等教育信息化领域也存在新服务缺乏制度支撑的现象，例如，MOOCs课程由于缺乏认证制度，学校无法判断课程质量，以至于多数学校不认可MOOCs课程学分，导致学生辍学，影响了优质资源共享的范围和成效。校外教育的兴起客观上调动了社会办学的力量，是满足不断提高的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快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机遇。在管理上，应该将互联网教育产业的办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进行管理；在制度上，应该用开放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思维进行制度创新，构建有效汇聚社会办学力量和规范社会办学行为的制度体系。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其性质不是规范违规行为，而是要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教育制度体系，是从传统教育管理向现代教育治理的转型。

（三）新一代媒体催生新的教育供给方式

与互联网重构社会各个行业的供给方式一样，在云技术和移动终端配合下，Web2.0理念和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教育服务的供给模式，陈丽教授在其大会主题报告中分享了中国大陆的创新实践。在新一代媒体的支撑下，教育供给的内容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学习者可以不必像过去一样，只能通过注册一个专业或者一个培训项目，才能修读课程，现在学习者可以直接选择修读一门课程；教育供给的渠道不再仅是学校和班级，出现了教育服务云平台，例如MOOCs平台，甚至产生了一个在线平台仅提供一门课的服务模式，不同学校的学习者选择在同一个平台选学同一门课。在北京通州区，甚至还实现了中学生课下可以自由选择北京市内所有教师的个别辅导；在供给方式上，派生了消费驱动的教育供给方式，教育服务的供给不再是由学校和教师确定供给地点、时间和内容，而是由学习者根据其需要和兴趣选择服务时间和服务内容，网络的联通功能使服务地点具有了空间灵活性；教育提供者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再仅是学校，而是包括学校、产业、联盟，甚至个体。

笔者认为，新的教育供给模式为破解教育公平的难题，实现个性化教育服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模式，值得高度关注。早期，教育技术学领域更多地专注于技术促进课堂教学模式变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效推动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新时代教育供给方式变革也是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着力点，是新一代媒体重构教育体系的必然趋势，值得高度关注。正如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的观点，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过两次革命，正在经历着第三次教育革命的浪潮。第一次教育革命：从原始的泛在化、个别化教育走向正规的学校化教育；第二次教育革命：从正规的学校化教育走向班级授课式的规模化学校教育；第三次教育革命：从规模化教育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个性化的教育（周洪宇，鲍成中，2015）。教育供给侧改革从本质上是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教育体系，是教育体系顺应时代的一场变革。

（四）新一代媒体孕育新的研究范式

新一代媒体可以纪录教与学全过程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为教育数据分析提供不断丰富的处理方法，教育成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大数据技术为新阶段教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可能。本次会议中分享的多项研究都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教与学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编程教学中在线论坛交互模式”研究中，研究者利用编程论坛中的帖子内容和交互行为数据揭示了交互模式，包括同伴交互的模式、发帖回复的规律、热点话题以及交互参与程度与学习结果的关系（Hu & Huang，2018）。再如，另一项研究“在慕课课程‘对新闻的认知’中各国学生对社交媒体传播的认知研究”，研究者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课程论坛中的398条帖子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社会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媒体的作用、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影响等规律（Hodgson，2018）。

陈丽教授在其主题报告中也介绍了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数据结合，正在推动教育评价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推动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推动教育研究的科

学化，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新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她列举了北京师范大学正在研究的两个典型案例，分别是：①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开发的平台——智慧学伴。该平台提供学生学科素养的诊断，并利用可视化工具将诊断呈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认识学术潜质，实现个性化的诊断，同时根据诊断结果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②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开发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智慧线。该平台能够根据在线学习的行为数据实时诊断和呈现每个学生、每个教师、每门课程和每个专业的运行情况，实现对在线教学过程的实时监控。陈丽教授还预测，大数据技术与教育交叉而成的计算教育学将是未来教育研究的新兴领域。

三、新时代教育变革面临的挑战

（一）教育理论亟待创新发展

陈丽教授在其大会主题报告中揭示了在互联网环境下，知识生成方式和知识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全新的规律。知识不再是由个别精英在书房里或者试验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网络中由群体智慧汇聚产生的，知识是动态的、不断生成的，甚至知识生成与知识传播发生在同一个过程中，学习不再仅是个体的实践，而是伴随着集体智慧汇聚的过程。网络环境中的社会网络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非线性关系和自组织等复杂系统的特征。正如联通主义理论所阐述，学习是三个网络形成的过程：神经网络、概念网络和社会网络（Siemens，2005）。陈丽在报告中列举了两项最新的理论创新，一个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关于学习的复杂网络分析新框架。这个研究成果的核心观点是传统教育理论是用线性思维去解释学习规律，这些理论不适用于互联网环境下的联通主义学习。教育研究者应该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去揭示互联网环境下学习的新规律，构建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学习分析框架（雅各布森，卡普木，赖曼，2018）。另一个成果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在线教育自组织与他组织关系的模型。这个研究成果的核心观点是在线教育出现了自下而上自组织行为，在线教育自组织是一个非平衡系统，它涌现的条件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差异的整合、系统和环境共塑等。人们应该积极看待在线教育自组织的作用，从认识、管理、文化三个层面将自组织的开放性和他组织的保障性相结合，为自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这是推进当前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抓手（殷宝媛，陈丽，2018）。

笔者认为，教育理论创新既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信息化实践对理论提出的迫切要求。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教育信息化实践中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了大量投入效益低下，甚至引起了社会对教育信息化的质疑。大数据为教育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范式，教育信息化实践为教育理论提供了土壤，教育理论创新必将破茧而出。

（二）对媒体角色与作用的认识局限

对媒体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的认识是影响教育信息化方向的基础问题。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教育信息化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有分歧。尤其在媒体换代阶段，新一代媒体与老一代媒体的角色与作用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所有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和决策者的面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今后一段时间各国各地区教育信息化的方向。为此，在本次大会的论坛上，主持人将这个问题作为论坛嘉宾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1.媒体是工具

来自香港大学的论坛嘉宾袁海球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学习的内涵并非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互联网技术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新形态，无论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式，都有了颠覆性的变化。只有能服务于新的学习方式的媒体才有意义，否则会影响学习。来自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布朗斯教授复议到，应该强调媒体的工具属性，是否采用这个媒体，不应该以媒体的先进性为选择标准，而是应该判断这个媒体的应用是否对学习有帮助。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论坛嘉宾王周绮华教授进一步强调，只有学习者才真正有资格去评价新技术和新一代媒体是否能够促进学习。

2.媒体是学习空间

陈丽教授认为新一代媒体的作用不同于前期的媒体，新一代媒体不仅是工具，更是学习空间。互联网是继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后，人类生存的第三个空间。这个新空间不仅能够与前两个空间相互补充，更好地促进前两个空间中进行的教育活动，还将派生出新要素、新规则和新关系。因此，我们在认识新一代媒体的角色与作用时，不能只局限在它对现有学习的促进意义，更要面向未来，看到新空间能够实现现有两个系统中无法实现的教育功能。

笔者认为，这两个观点的分歧是视角不同，第一个观点仅从媒体对学习的意义视角来认识媒体的作用，第二个观点是从新一代媒体重构教育体系的视角来分析媒体的作用。第一个观点是微观教学媒体观，第二个观点

是宏观系统媒体观。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由于四个学者所在地区教育信息化实践背景不同造成的。两种观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与会者系统地揭示了媒体在微观和宏观上的教育作用。早期教育技术学学者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发挥媒体对教学的微观促进作用，在新时代，应该同时兼顾和研究如何发挥媒体变革教育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的作用。

（三）阻滞和影响教育变革的制度因素

对阻滞和影响教育变革因素的讨论是大会论坛的话题之一。与早期的媒体相比，新一代媒体已经显示出推动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作用，许多实验案例的成效确实证明了新一代媒体可以破解教育矛盾，使教育变得更好。但是，大面积常态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仍然有一定的阻力，教育变革的进程相比社会其他领域，仍比较缓慢。

袁海球教授认为，学校对新鲜事物本能的惧怕感，是影响创新实践快速普及的原因。他认为，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经验对基于技术的教育创新实践进行风险评估和绩效预判，评估后一般会谨慎选择，政策对新一代媒体教育应用的要求变化过快是导致学校无法深化应用的重要原因。由于教育信息化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导性实践，政策会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而不断提供新的设备和提出新的要求，造成学校没有时间消化新技术和新方法，教师总是处于简单学习新一代媒体的追赶阶段。同时，教师担心改革教学方法会降低学生评价分数也是影响教师应用新一代媒体和新方法的重要原因。王周绮华复议到，在大学中，应用一项技术的时间至少要2~3年，如果周期太短，只能浅层次应用，劳民伤财。布朗斯则建议通过建立校级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可以推动教学创新的普及与应用。正如罗杰斯所说，朋友熟人的推荐是使得某人接纳一个新观点的途径，而加强各个学校主体的连接度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Rogers, 2010) 。

陈丽教授在她的大会主题报告中特别强调，新一代媒体正在推动教育与社会的融合，但现行的教育制度仍只适合学校体系和面授教学，造成大量的教育创新只能在试点中昙花一现，难以持续推动和应用。例如，学校对教师工作量的考核仍采用课堂讲授的学时来计算，工作水平的考核仍是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标准，若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则需要在教学设计、资源整合和在线辅导等环节投入大量的精力，由于这部分贡献不被认可，教师必然选择回归课堂讲授。因此，学校教育制度不适应教育创新实践是制约媒体驱动的教育变革的主要原因。陈丽教授在论坛中特别呼吁，有远见并对学生未来负责的学校和教师，应该积极投入到教育变革中，不仅要探索新方法，还要探索新体制和新机制。

四、新时代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新方向

新一代媒体将教育信息化带到了新的阶段，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也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时代教育技术学研究应如何适应教育信息化的新要求，继续发挥对教育信息化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本届会议的大会论坛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揭示网络环境中教与学的新规律和新原理

陈丽教授认为，新的技术为我们创建了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新空间。新空间以互联网为载体，在新空间中，传统课堂的行为模式，学习活动和互动模式都不再完全适用。因此，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和研究框架，去揭示在新空间中的各种行为规律。

（二）研究海量信息管理的策略和方法

布朗斯教授建议大家应该去研究新空间中的信息管理问题，即如何才能在以指数级增加的大量信息中，有效地寻找、提取、管理和利用信息，这将会成为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重新定义教学和学习的内涵

袁海球教授关注于各个角色的重塑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呼吁大家重新思考教师、学生和学习在新时代的新定义，与此同时以哲学的角度切入技术，研究其在学习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以及这两种性质的转换。他强调，应该回答：“在学习中，技术何时作为一个工具为人所用，何时又会主动地引起一些预期外的结果，何时它又将会不可取代？”

（四）开展教育技术领域的元研究

王周绮华教授提出，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基于教育学科的特殊性，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有可能会在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我们需要长期的研究来真正有效验证其有效性。但长期追踪研究通常极其费时费力，并且难度极大。相比而言，对于某个特定领域的元分析则是相对简单的，能够将各个国家和地区碎片式的研究整合在一起，这也是教育技术领域迫切需要的。

四个论坛嘉宾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问题域覆盖整个教育领域。笔者以为，在新阶段，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畴应该从方法手段，扩充到包括微观的行为模式、中观的方法手段、宏观的体制机制三层全谱系。

五、总结

本届会议历时三天，与会代表通过充分的研讨，高度共识了新一代媒体已经引发教育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反映在学校学习中，还体现在校外学习和社会生活中，不仅体现在教与学的方式中，还体现在资源配置方式、教育供给方式和教育组织体系中。笔者在三天的会议中还深刻地感受到教育信息化的地区差异性。尽管新一代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同步推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变革实践差异显著，因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重点也具有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差异性正是国际会议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201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Z]. (2018-09-10). [2018-08-2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22/content_5315668.htm.

[2] 李克强(2018).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8-09-10). [2018-03-05] http://www.gov.cn/zhuanti/2018lh/2018zfgzbg/zfgzbg.htm.

[3] 迈克尔·J·雅各布森，摩奴·卡普木，彼得·赖曼（2018）. 学习与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之争——建立学习的复杂系统概念化框架[J]. 开放学习研究，（2）：1-8.

[4] 知识库（2017）. 易观：2017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年度分析[R]. (2018-09-10). [2017-11-27] http://www.useit.com.cn/thread-17243-1-1.html.

[5] 周洪宇(2018). “互联网+教育”“人才大数据”——在《两会大家谈上》的讲话[EB/OL]. (2018-09-10). [2018-03-05] http://news.youth.cn/gn/201803/t20180311_11492740.html.

[6] 周洪宇，鲍成中(2017).论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J].中国教育学刊，（3）：24-28.

[7] 王宏，肖君，谭伟（2018）. 网络教育新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智慧学习空间设计[J]. 开放学习研究，（3）：36-42.

[8] 殷宝媛，陈丽（2018）.在线教育自组织的科学原理与趋势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3）：56-66.

[9] Branch, R. M. (2018).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C]// Lipeng. Deng & Will.W.K. Ma & Cheuk W.R.Fong (Eds.) ,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selected papers from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gapore: Springer:3-11.

[10] Hodgson P. (2018). Global leaners' behavior on news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 through a MOOC[C]// Deng, L., Ma, W. W., & Fong, C. W. R. (Eds.). (2018). (Eds.) ,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selected papers from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gapore: Springer：141-148.

[11] Hu, Q., & Huang, Y. (2018).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earning pattern towards online forum in programming course[M]//. Deng, L., Ma, W. W., & Fong, C. W. R. (Eds.). (2018).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selected papers from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gapore: Springer:71-81.

[12] Rogers, E. M. (2010).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Y: Simon and Schuster.

[13] Siemens, G. (2005).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J]. International Journey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 2(1): 3-10.

作者简介

封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学习的学习设计与学习分析。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ENG Chen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HKAECT) is devoted to promote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n Hong Kong and improve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 established platform for interac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HKAECT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s been held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on July 25, 2018, with topic “New Media for Educational Change: Effect on Learning and Reflection on Practice”. This essay is to outline the trends and challenges of educational change point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conference. New media has undoubtfully promoted, if not led, educational chang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eating new learning space, inviting new stakeholders, encouraging new supply way, and urging new research methodology. Meanwhile, it has also brought unforeseen challenges, such as outdated theory, limited understanding and traditional system. Therefore, it requires new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 the new era by revealing new principle, exploring how to manage massive information, redefining teaching & learning, conducting meta-analysis on this field. The main purpose is to present the conference with analysis from educational technology's perspective and outline the edgy trends and uprising challenges for academics.

Keywords: new media; disruptive technology; educational change; trends and challenges

【开放学习实践】

新时代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互联网+”旅游教育学术论坛综述

郭 莹 白晓晶 孙 黎

（北京开放大学 合作办学部，北京 100081）

【摘 要】在信息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与教育全面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实现教育领域变革、开放与创新，旅游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旅游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论坛以“新时代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为主题，旨在探讨如何顺应“互联网+”新时代，服务首都旅游业发展，改革与创新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北京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立足于开放大学内涵建设，从旅游教育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出发，充分借助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从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平台资源整合、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新兴技术融合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创新与改革，以契合旅游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呈现了学术论坛中学科和行业专家学者观点，助力“互联网+”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关键词】互联网+；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14-006

2018年6月23日，北京开放大学举办了“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揭牌仪式暨新时代‘互联网+’旅游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论坛”。来自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市教委和国家开放大学的领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以及中国饭店协会、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北京烹饪协会等相关协会的领导和中国青旅实业集团、首旅集团的领导共同就立足新时代，服务首都旅游业人才培养，创新与发展旅游教育新模式贡献了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建议，并对北京开放大学的发展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此次活动聘请了17位学科和行业的专家学者成为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的首批特聘教授。

一、立足开放大学内涵建设，迎接旅游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立足开放大学内涵建设，助力旅游行业新发展

近年来，旅游业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大力推动了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质量的提升，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旅游经济的综合功能呈现被强化的态势。传统旅游中的吃、住、行、游、购、娱逐步实现融合，旅游与工农业及第三产业的产业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旅游+”“+旅游”正深刻影响着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在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快速改变了传统旅游业的发展态势和商业模式，影响了交通、住宿、饮食等各个领域。智慧酒店、智慧餐饮、智慧交通、智慧景区的新型旅游业态层出不穷，互联网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新动能，加快了“互联网+”旅游业产业融合，提高了旅游创新能力，旅游业进入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智能旅游新时代（张辉，岳燕祥，2015）。“互联网+旅游”的新型产业结构悄然而至，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给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让旅游行业传统模式、市场竞争方式等发生了重大改变，适用于新形势下的旅游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势。面对变化，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将立足于内涵建设，助力旅游行业新发展。

1. 坚持办学理念，丰富新型大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对办好“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加快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3

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办好开放大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应有之义。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北京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在北京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艰巨任务下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徐辉富，魏志慧，李学书，2017）。国家开放大学书记兼校长杨志坚强调指出，开放大学是一所新型大学，教育部批文中明确了新型大学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学。不同层次、类型的学校承担的培养职能和作用不同，办学宗旨、使命任务及培养方式也不同。开放大学是一所百姓身边的大学，是一个以民生为主的伟大教育工程。

北京开放大学发展战略目标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完成战略转型，使学校成为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且特色鲜明的新型大学，开启建设一流新型大学的新征程。面对新时代，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的路径选择。北京开放大学书记黄先开指出，什么是新型大学？第一是新理念，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学有所教、有教无类”。想学习就能够找到学习平台、获取学习资源、得到学习机会。学校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第二是新机制，“不为所有、但为所用”。学校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把全社会资源整合到开放大学平台，为学生、为社会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支持服务；第三是新模式，注册入学、学分积累，实行宽进严出。这是作为新型大学的三个基本要求。面对新时代，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也是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的路径选择。到2020年，学校要全面完成战略转型，开启建设一流新型大学的新征程。

作为新型大学，餐旅学院的成立恰逢其时，一同肩负着服务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任和使命，北京开放大学将坚持“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实行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通过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满足首都社会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需求，促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强调，北京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与普通高校不同。第一点，教育对象不同。开放大学的教育对象是在职需要处理工学矛盾的学习者。他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第二点，教学模式不同。学生与教师的教与学活动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在线教与学，同时辅助线上线下学习支持服务。第三点，培养目标不同。培养目标强调学生职业能力和实操能力。因此，开放大学的学生培养目标重点突出两项：一是培养学生的高阶能力，具备创新和逻辑思维能力。二是培养学生的善良品质。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作为新型大学要适应新形势的需求，面向新业态下的旅游人才培养，实现全面育人的培养目标。

2. 顺应时代需求，服务首都旅游行业新发展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是正在培育的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2018）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处长邵文杰强调，希望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能够对接北京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需要，提升餐饮、旅游等相关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主动适应学习者的新需求，遵循特色发展与创新原则，构建消费驱动的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为首都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和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北京开放大学将顺应大众旅游时代新需求，立足服务首都旅游业发展，以秉承和发扬中国旅游文化、餐饮文化、酒店文化为己任，结合“互联网+”和“旅游+”发展，坚持“能力导向，学习驱动”的人才培养理念，通过内涵式发展开拓“深耕行业、产教融合”的开放教育办学之路。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将依托开放教育形成特色学院，借助餐旅学院创立的契机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旅游教育的深度融合，服务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助推旅游、酒店、餐饮等产业转型升级，并以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搭建旅游从业人员终身学习的立交桥，服务首都旅游行业新发展。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巡视员史安平指出，开放大学应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积极探索加强“旅游+服务业”教育新思路、新举措，为北京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积极发挥开放教育优势，促进多方资源共享，创新教学模式，以餐旅为着力点，推进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希望餐旅学院开创旅游行业教育新局面，成为北京旅游行业示范性教育机构。促进旅游与教育融合发展，多方位提高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是旅游行业发展重要一环。

（二）迎接机遇与挑战，创新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大举推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育革命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之一。“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学习知识、共享知识。优质教育资源正通过互联网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教育资源，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新形势，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互联网+旅游”的发展，实现传统旅游业的升级。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发展“互联网+旅游”（国务院，2015）。2016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旅游业处于黄金发展期、结构调整期和矛盾凸显期，也面临不少挑战。要大力推动旅游科技创新，要实施“互联网+旅游”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除了要有新的政策促进行业发展，也要有新的举措来进行创新。北京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北京交通大学张辉教授认为，要迎接变革时期的新变化，首先要思考学科建设能否适应新时代要求。目前旅游行业要求的学科知识和体系已发生变化。北京开放大学可先行为北京市建设旅游教学创新基地，围绕新时代走出一条旅游教育创新之路。北京旅游学会高端旅游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蔡红教授认为，面对旅游行业的新形势，北京开放大学在未来很有可能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创新上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建议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精准定位，二是精细管理，三是精美呈现。

“互联网+”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建设一流开放大学的新征程，也是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桥梁。肩负着服务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任。对于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的成立是一个新起点，一个新机遇，更是一次新挑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旅游行业变化迅速的时代背景下，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需要共同协作，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国务院，2016）。“互联网+”旅游教育的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开拓创新以开展我们的教育，来满足学习者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和如何面对新形势进行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黄伟教授讲到，北京开放大学是服务于北京市市民的新型大学，让学习者拥有终身学习的平台，这是学校的职责和使命。餐旅学院揭牌成立，需要引入旅游行业、教育行业的很多新技术，有机遇也有挑战。旅游教育进入新时代，是一场新的“革命”。旅游教育要主动出击，充分运用新技术，贯彻旅游教育新理念，开发新的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互联网+”时代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一）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新要求

教育部旅游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大学马勇教授认为，北京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的办学模式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高等教育已经呈现变革式的发展，对于人才培养需求更为专业且严格。作为新型大学，面对新型旅游发展形势，需要重新定义和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旅游产业的深入运用，互联网带来了旅游行业的转型升级，出现了定制旅游、智慧旅游等新型旅游产品和旅游业态，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对旅游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产生了新的旅游人才需求趋势。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平安稳提到，培养旅游人才要按照市场需求和新业态发展来考量，首先要思考市场实际需求。例如酒店已迈入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新时代，形成了多业态、多模式、多投资主体、多文化主体的经营模式，形成了跨界合作、大住宿发展的新格局，衍生出很多酒店业和外界品牌融合的新物种。对应旅游人才培养需求体现了三个方面：一是运用高科技、智能化、现代化设备设施运营手段来经营管理酒店的高科技运用人才；二是具有系统专业知识并热爱旅游行业的专业人才；三是具有创新精神、综合性管理能力且懂得金融、公共关系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栗书河在发言中也谈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国内的旅游专业教育发展将近四十年，旅游专业各个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均有变化。几十年前的旅游骨干人才技能目前已经成为基本技能，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认真研究现在的行业需求，行业需要具有扎实且丰富的专业文化知识积累和综合性管理技能的旅游人才。

可见，面对新型旅游发展形势，需要重新定义和建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要实施重点人才开发计划，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型智库。将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地方重点人才支持计划，实施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培养和开发旅游官产学研领域中的行政领导干部、经营管理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2016）。被誉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旅游战略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及创新人才作为支撑。在这种需求下，旅游行业对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相应的新要求。中国青旅实业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尚志勇讲到，中青旅实业集团倡导的是“发现未知的自我，遇见未知的自我”的一种新型旅游理念。基于这种理念对旅游人才的诉求为三点：第一是需要具有旅游专业知识和互联网专业知识的跨界人才，兼有新型经营理念、商业模式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第二是需要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哲学修养的高素质高修养人才；第三是要具有艺术表达素质和素养的艺术型人才。

旅游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趋势愈加复杂，趋向于综合素质全面且兼具跨界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作为旅游人才培养的专业院校则需要大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才能培养出行业急需的新型旅游人才。概括来说人才培养需求包含几方面：①旅游综合素质高、职业素养强的复合型人才；②精通外语的国际化旅游人才；③旅游电商科技人才；④旅游新业态经营管理及旅游跨界融合人才（陈晖，2018）。

针对行业企业需求，北京开放大学在专业建设过程

中，要找到高校和行业的契合点，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行业现状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建设，加快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开放大学特色的旅游类行业人才。旅游英语专业学科带头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国际学院院长老青教授说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目前对旅游人才培养的定位为跨界人才培养，培养方向为出入境服务与管理方向，有效拓宽了学生就业面。旅游英语专业在北京地区应以服务首都、面向北京四个中心功能服务来定位，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要针对定位来进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这是开放大学可以借鉴的。北京联合大学石金莲教授发言说，对于新时代旅游人才培养需求体现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要关注时代的特征，把时代特征与旅游发展结合起来。第二方面是要关注新时代的旅游行业发展趋势。例如高端定制、在线旅游。第三方面是要关注人才需求。人才需求对应培养方案。第四方面是要关注学习群体，有效进行学情分析，从而构建人才培养框架与模式。

围绕“互联网+”“旅游+”的大趋势，跟上时代变化，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加快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旅游信息化专业人才，是旅游教育领域中新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目标。

（二）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转变

如何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背景下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实现旅游专业人才素质提升的重要举措。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设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以目标为导向积极探索面向新时代旅游教育的培养方式和模式，打破固有培养目标的恒定模式。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行业现状发展趋势和成人学生学习现状及学习需求，适时调整培养方案，找出适合于行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并在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形成良性循环。

1.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师资建设是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新时代在知识结构、课程设置、理论应用等各方面都发生变化，对于教师专业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如何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是首要问题。教师除了要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实践创新能力。要根据时代发展和专业建设需求制定合理的教师培养计划，鼓励教师深入企业进行实践活动，引入行业企业专业人才进行培养扩充教师队伍，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体系建设。

北京烹饪协会会长云程讲到，面对餐饮行业呈现的多业态的跨界发展态势，餐饮教育的核心问题：第一要有一个好校长；第二要有专业教材；第三要有专业教师，要注重实践，这是教育关键；第四是进行专业资源整合。

华侨大学国家级旅游实验中心主任、旅游学院创院院长郑向敏教授认为，开放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师资建设和培训等多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创新来顺应行业变化。要重点解决教师知识更新问题，充分发挥开放大学的优势，运用互联网的多元化资源，探索并推出一套顺应时代的旅游专业教师培养方案和学生培养方案。

2.课程建设顺应时代需求兼具专业特色

除了专业教师队伍培养，课程建设也是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课程建设应根据时代的需求做出改进，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设计、课程呈现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行业发展和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除必修课程外，可以探索创新性的选修课程建设，例如结合旅游专业进行创新创业课程及智慧旅游课程设计，丰富课程体系，对接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首旅集团培训中心主任宋杨发言说，中国旅游业正处于迅猛发展期，旅游行业最大的前景是变化，最重要的工作是创新。学科建设要有效调整以培养行业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教材内容更新要结合行业变化。课程建设过程中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北京旅游学会高端旅游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蔡红教授认为，未来是跨领域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立足的新时代，对人才的培养、教学方法要积极创新，教学手段要具有针对性，例如开展案例教学。针对一个案例从几个不同学科进行多方位研究，体现学习价值。在课程设计中也要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构建，引进心理心智测试，让学生充分了解自身能力，还要充分运用开放学习平台整合资源来进行课程开发，制定个性化课程方案。

3.教学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对接首都百姓生活

学校将围绕专业特色，聘请行业企业一线专家和高校旅游专业资深教授参与教学课程资源平台的建设，与行业企业共建共享共同形成优质教学资源，优化整合到开放大学学习平台，并充分运用便捷有效的载体进行呈现。建立适合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教学平台，为学生、为社会提供教育资源服务和学习支持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饭店产业研究基地主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谷慧敏教授认为，基于北京开放大学的办学特色来思考如何进行资源建设。第一是要去追踪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专业团队，充分运用行业资源去开发教育资源和教育产品；第二是要明确教育定位，充分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在不同发展阶段要思考定位问题；第三是要搭建平台和整合资源，符合学习者需求；第四是要创新技术并提供支持服务，在教学模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和引领。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实践教学中心主任于平教授认

为，针对学生特点应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线上课程除了由专业教师来建设和开发外，要充分利用旅游行业的优质课程作为备选课程。行业专家是强大的师资储备。资源可运用手机端等载体使市民学习者享受时时可学的便利性。

4.产教融合形成创新实践教学基地

实施产教融合工程，建立对接行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首先要主动寻求多方力量，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起来，与政府、旅游企业、行业协会等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具有专业特色、并和行业对接的创新实践教学基地。探索实践教学改革的产教融合机制，充分发挥校企协同育人在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实践教学中心主任于平教授认为，除了线上课程资源开发，线下可以借助企业行业场地及餐饮和旅行社等现有资源，进行产教融合的尝试，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新实践教学基地。目前，北京开放大学已经实现了一些基于新技术的实训基地，例如大数据创新中心、科大讯飞会议实时翻译系统，都是创新教育的体现。在“互联网+”时代，最新的高新技术都可以应用到教学和实训当中。

5.学科建设融合新兴技术实现智慧旅游教育

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智慧旅游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智慧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培育若干以智慧旅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形成系统化的智慧旅游价值链网络（国家旅游局，2015）。智慧旅游是未来旅游行业发展的方向，需要大量新型人才作支撑。因此，在进行专业学科建设时要融合互联网和新兴技术，设计旅游智能软件应用、智能化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智慧旅游教育的发展。

北京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北京交通大学张辉教授谈到，进入新时代，面对共享经济时代、高速交通、新常态经济，这些变化对旅游教育有着翻天覆地的影响。要从过去以劳动和资源两个要素来建设专业的方式变为以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学科体系。开放大学可以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来实现智慧旅游教育，走出旅游教育的创新之路。

三、结语

论坛围绕“互联网+”旅游教育新时代背景下，旅游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旅游人才培养需求及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行业企业专家、高校学者均从自身角度进行了旅游行业发展趋势解读，提出新形势下人才培养需求及改革方向。旅游行业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创新复合型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在这种需求下对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新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综合素质高、职业素养强且善于创新的复合型人才、精通外语的国际化旅游人才、旅游电商科技人才和旅游新业态经营管理及旅游跨界融合人才以适应旅游行业市场需求。面对新形势，北京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主动出击，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创新与改革，教师队伍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着重培养双师型教师；课程建设要顺应时代需求兼具专业特色；教学平台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对接首都百姓生活；创新实践教学基地要和行业企业有效对接；学科建设要融合新兴技术实现智慧旅游教育。这些在开放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过程中都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在旅游行业变化迅速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运用“互联网+”这个未来的关键竞争力（刘文清，2018），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支撑，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共同协作，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深入挖掘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契合点和创新点，建立与行业企业间的协同培养机制，实现专业的贯通融合和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保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在满足行业人才需求的同时，走出开放大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

参与本次论坛交流的行业企业专家及高校学者也达成共识，一致表示要积极参与，给予支持，发挥行业企业和高校的优势与特色，携手共进，创新发展，为建设“特色鲜明、水平一流、国内知名”的旅游学科的发展目标努力创新。北京开放大学将坚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致力于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开放型终身教育模式，力争做“互联网+”旅游教育的先行者，努力为新时代的旅游教育和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晖（2018）.智慧旅游新业态下职业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J]. 人才培养，（1）：69-71.

[2] 国务院（20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DB/OL].（2015-08-11）[2018-07-1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11/content_10075.htm.

[3] 国务院（2016）.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DB/OL].（2016-12-07）[2018-07-1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26/content_5152993.htm.

[4] 国家旅游局（2015）. 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DB/OL].（12015-01-10）[2018-09-10]. 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2/content_2803297.htm.

[5] 刘文清（2018）. 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开放大学——开放大学拿什么面向未来[J]. 开放学习研究，23（1）：20-24.

[6] 习近平（2018）.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3（2）.

[7] 徐辉富，魏志慧，李学书（2017）. 开放大学五年：总结与

反思——“开放大学建设进展与成效研讨会”综述[J]. 开放教育研究，23(6)：21-26.

[8] 张辉，岳燕祥(2015). 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互联网+”思维[N]. 中国旅游报，2015-05-13(11).

作者简介

郭莹，北京开放大学合作办学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远程教育。

白晓晶，北京开放大学合作办学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在线学习、混合式教学。

孙黎，北京开放大学餐旅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旅游教育。

本综述根据2018年6月23日在北京开放大学举办的餐旅学院揭牌仪式暨新时代“互联网+”旅游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论坛资料进行整理编辑，未经参会者本人审阅。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a New Era: Summary of Academic Forum on Internet Plus Tourism Innovation

GUO Ying, BAI Xiaojing and SUN Li

(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and education creates a new ecology, which promotes the reform, opening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ourism education is no exception. The academic forum of Internet Plus tourism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tourism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era. It aims to explore how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Plus new era,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ourism industry, and reform and to innovate new mode of tourism education talents' training. As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JOU)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JOU makes full use of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and takes initiative to make innovation and reforms in terms of faculty training,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ing platform resources integration, innovative practice teaching base establishment,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talents' training.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erspectives and idea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industry during the academic forum, aiming to assist the training mode exploration of Internet Plus tourism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et Plus; tourism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reform and innovation

---

（上接第7页）

Innovations in Scaling and Enhancing Learning: Review on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LI Haiying[1], CHEN Bodong[2] and Gobert Janice[1]

(1.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NJ 08904, USA; 2.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55455, USA)

Abstract: Learning at Scale (L@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large-scale, technology-based, learner-centered environments, which usually depend on the storage, transmission and computation of complex data, interface design for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human-computer conversation/interaction design in intelligent systems. The Fifth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t Scale (L@S) took place in London, UK during June 26-28, 2018. This year's conference theme was “Innovations in Scaling and Enhancing Learning.” The L@S conference covered innovations in scaling and enhancing learning in emerging contexts, automated assessment and learner knowledge models, automated feedback and interventions, and adaptivity of large-scal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addition, L@S researchers shared recent work on policies and logistics of online degrees, automated feedback systems, and emergent types of assessment item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L@S conference, reports on emerging paradigms from two keynotes and major research topics covered by full papers.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L@S research.

Keywords: Learning at Scale (L@S)；online degree；MOOC；smart adaption

【远程教育创新】

特约栏目主持

陈 丽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在重构教育的服务体系和组织体系。“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关注点已经从课堂变革转向教育体系变革，其中包括教育的哲学基础、教与学规律、教育供给方式、教育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发展。这种趋势直观地体现在对《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的“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推动教育观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的认识上。尽管“互联网+教育”是一个内涵仍然不够清晰的概念，但在“把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构建教育发展的新形态”的目标追求上是毋庸置疑的。而教育服务模式的创新则是这一教育新形态的核心标志之一，这不仅因为“探索新型服务供给方式”被列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重点行动，更在于商业领域、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新型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就这一新型服务模式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研究沿着理论探索和实践归纳的思路力求接近新模式的应然状态，这也是两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化研究

郭玉娟

（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创新性、颠覆型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教育变革，高等教育的服务模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以适应高等教育新要求，是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互联网+教育”内涵与阶段特征的认识出发，结合教育传播模式，提出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分析框架，包括服务供给方、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服务受众。其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案例为支撑，分析了高等教育服务模式中四个要素的变化。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方由单一转向多元；服务内容由预设性转向生成性；服务方式更加开放、混合、联通和个性化；服务受众更加多样化。最后，提出了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变化需要开放的制度支撑，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互联网+；高等教育；服务模式；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20-006

一、研究背景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与早期的印刷术、音视频技术、多媒体和BBS等增强型技术不同，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些颠覆型技术，如Web2.0技术、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SNS技术、大数据等增强型技术的应用在于把原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提高和改善原有的功效，不会对原有的组织框架产生质的影响，但颠覆型技术的应用有可能改变整个行业的组织结构与资源的分配方式，进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4

而影响整个行业的组织模式与服务模式，具有变革性与破坏性。其容易改变游戏规则，为实现变道超车带来机遇（Thomond，Herzberg，& Lettice，2003）。

互联网等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着各领域业态的优化、增长和创新。网络购物、滴滴打车等新的生产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出现，正是互联网与各行各业跨界融合以推动各行业跨界融合产生的新产品、新业务和新模式。网络购物、滴滴打车等运用创新的服务模式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与出行方式，变革了传统商业和出租行业的服务模式，促使其行业结构、内部运转机制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案例充分证明了技术具备重构各个领域的能力。

反映在最具长远影响的教育领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颠覆型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育的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深层次的需求以及尖锐的难题正在或将被创新的教育服务模式解决。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互联网+”给传统的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机遇和挑战，大量的创新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也在围绕其开展，我们应该积极面对“互联网+”，认识“互联网+教育”的内涵及其阶段特征，了解“互联网+”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二、研究综述

（一）“互联网+教育”的内涵与阶段特征

“互联网+”时代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机遇，不同于教育信息化的起步、应用阶段，是深化教育服务模式改革的变革阶段。“互联网+”是一种思维，是把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来推动教育的改革创新。“互联网+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其本质并非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也不仅仅是教育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学习平台，而是互联网与教育深度融合、创新，是推动教育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增强教育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教育变革（秦虹，张武升，2016）。“互联网+教育”的跨界融合，将推进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与学、教育管理、教育治理等领域内的关键性业务。一方面将有助于提高这些业务的效率，另一方面将为这些关键业务提供完全不同的实施环境，从而优化这些业务的流程与模式，改变教育服务的基本流程、运作规则及运作形态，最终导致教与学、教育管理和教育治理的变革，重构教育的生产关系，教育服务供给的方式与结构都会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余胜泉，王阿习，2016）。“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指运用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技术，跨越学校和班级的界限，面向学习者个体，提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的新型服务模式（陈丽，2016）。笔者认为这类新型的教育服务模式和传统的学校教育服务不同，它是在线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具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的显著特征，是教育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态。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以其开放性、共享性正在打破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封闭环境，重构教育的服务体系。

（二）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现状分析

在国内和国际上，教育都被划分为服务行业。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3）》把教育划分为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颁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也把教育划归到服务业门类。由此可见，教育具有服务产业的属性。

关于教育的服务模式，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①从教育资源的视角来探讨，曾海、贾鑫鑫、陈品德、谭颖臻、谢巍（2014）提出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模式，要素涵盖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表现形式、服务方法与手段、服务反馈与评价机制四个方面；余亮、陈时见、赵彤（2017）基于大数据背景，将数字资源服务模式分为共建共享的云服务模式、群体定位的服务模式和个性化追踪服务模式；②从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视角，林世员（2016）提出“互联网+”新型高等教育生态体系的服务模式，包括定制化服务模式、“草根”服务“草根”的同伴互助模式、专业化公共服务；陈丽、王怀波、孙洪涛、刘春萱（2017）基于MOOCs提出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方向，包括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融合、新技术支持下的智能学习环境、互联互通的学习、质量保证与认证制度的建立。从当前的研究可见，对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服务内容（教育资源）层面以及宏观地提出高等教育服务的几种模式，但对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要分析高等教育的服务模式，首先必须明确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

三、分析框架的提出

教育主要是传递前人的思想、经验、知识与技能，这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系统的传播行为，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递给特定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南国农，2005）。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就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因此，对典型的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构成教育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进而为本研究提出的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分析框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信息传播过程须具备“信源”“信息内容”“渠道”和

“信宿”这四个构成要素，而信息传播过程就是信源通过渠道向信宿传播信息内容的过程。南国农（2005）提出了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见图1），认为教育传播系统是由教育者、教育信息、教育媒体、受教育者四个要素构成，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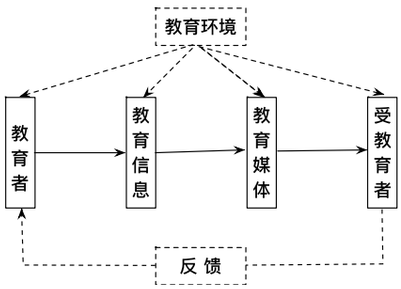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传播基本模式（南国农，2005，p.39）

在这一模式中，教师根据某种需要选择教育信息和教育媒体，并通过媒体将教育信息传输给学生，学生主动地接受通过教育媒体传来的信息并进行反馈，教师根据反馈信息进一步调整教育信息与媒体，达到优化传播过程、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传播环境对传播系统的各个要素都有一定的影响。反馈和传播环境虽然对传播效果有重要影响，但它们不是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故在图中用虚线框表示。综上可知，教育传播过程的要素就是将信息传播的要素和过程赋予了教育含义，比如教育传播的要素是教师（信源）、学习资源（信息内容）、媒体（渠道）和学习者（信宿）。

基于教育是一种传播活动的认识，结合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本研究构建了认识和分析高等教育服务的理论模式。本研究认同，“信源”“信息”“渠道”和“信宿”是构成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但用“信源”“信息”“渠道”和“信宿”的表述是不合适的。通过本土化，并结合“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征，本研究将采用“服务供给方”来代替“信源”、采用“服务内容”来代替“信息”、采用“服务方式”来代替“渠道”、采用“服务受众”来代替“信宿”。因此，本研究认为服务供给方、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受众是构成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

四、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变化

本研究结合“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案例，对“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各个要素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服务供给方——多元化

“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将更加地多元。传统教育服务模式下，政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是绝对的主导与支配，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方主要是高校，比较僵化和单一。在“互联网+”时代，学习者所获取的高等教育资源将不再局限于单一高校的一元提供者，除了传统学校，一些商业机构与个人也为学习者提供高等教育服务。

1. 草根

在“互联网+”时代，现代信息技术以其开放、共享基因帮助高等教育体系整合不同机构的资源，提升自身的资源供给能力进而提升承载力和服务能力，任何机构或草根均可提供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方。

可汗学院就是草根提供教育服务的创新实践案例，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萨尔曼·可汗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最初只是通过在线的方式辅导远方的表妹学习，但随着其发展，可汗学院的课程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球拥有超过6 000万的注册学习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较大影响[①]。国内的麦课在线也是草根提供教育服务的典型案例，其运用移动互联的学习方式，开发了多媒体交互式的在线安全课课程，供学习者自由、灵活地学习。麦课在线与全国的各个行业学会合作，协助举办全国安全教学大赛，目前已经包括22个省市，广西、山东、山西等多个省份把该机构开发的安全课程列为必修课。而且麦课在线与众多高校合作，线上学生已经突破20万人次[②]，学习之后考核通过，即可得到学习者所在学校的学分认证。

可汗学院与麦课在线的出现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一些教育观念，尤其是对教育服务的认识，如只有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才可以讲授内容、学习者只有学习本校教师开设的课程才能得到学分。它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转变，成为了现代信息技术影响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

2. 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机构

传统的高等教育服务绝大多数被限制在大学与独立的教育机构中，极少将高等教育的服务让大学以外的机构来承担。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并没有触及教学人才培养的核心领域，最多也仅是高校后勤的社会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高等教育的组织由封闭慢慢走向开放，向办学服务提供者开放。

在MOOCs发展的初期，就已出现专业化的分工，比如高校负责提供学习资源，专业的技术公司负责搭建平台和运营，风险投资公司和公益基金机构负责为MOOCs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机构相互合作，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为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以Coursera、FutureLearn等平台为例，它们利用专业化的考试公司在全球的考试中心提供线下考试服务。公共服务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曾出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实践过程中建立的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知金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三家公共服务机构，它们以社会化公共服务的方式向远程教育的机构和学习者提供支持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加复杂与多元，更加依赖不同教育服务机构的分工与协作，单一机构提供人才培养全过程服务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复杂多元的高等教育发展，任何教育服务机构都应该重新定位自身的优势，而将一些教育服务功能交由一些专业化的机构来承担和提供。

（二）服务内容——由预设性转向生成性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服务中，服务的内容会提前根据教育目标设计好，主要体现在课程内容的设计安排上。互联网模式下的高等教育，服务内容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在课程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生成性上。

Web2.0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联通主义是以教学交互和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型学习，其典型的实践形式是：探究复杂问题联通的cMOOC。学习者面对未知的、复杂的问题获取分布在网络中的相应资源，并与相关的人联通。他们通过深层次的互动形成问题的新认识，并创造新的知识或形成问题的解决方案，产生新话题，吸引新的参与者持续地互动，这是一个开放动态生长和不断分化的网络（Siemens, 2011）。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者贡献的内容本身已经成为重要的教育服务内容，通过聚合群体智慧共同生成学习内容。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在交互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教师和学习者通过在复杂网络中持续不断的交互，生成课程内容。

（三）服务方式——开放、混合、联通主义、个性化

1.开放的服务方式

互联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开放，拓展了教学的时间、教学空间以及教与学的主体，任何人只要在有网络的环境下，均可以享受高等教育服务。MOOCs的出现，强化并拓展了高校社会化服务的职能。

以众所周知的MOOCs为例，MOOCs创新了一种优质教育的开放服务方式。在MOOCs平台上注册，就可以参加学习，没有种族、国籍、身份、地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真正地实现了开放、共享以及教育的公平。以Coursera平台为例，截至2018年7月底，该平台上有超过150所世界著名的合作学校，开放了涵盖艺术与人文、商务、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生命科学、数学和逻辑、个人发展、社会科学等领域超过2 700门课程，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 300万名注册学习者[③]。而在针对果壳网MOOC学院注册学习者的调查显示，该平台注册了来自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学习者。2016年，MOOCs学习者数量排在前三位的省市为：北京、江苏、广东[④]。数字化学习环境也对教育服务提供者开放，从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服务能力。同样以Coursera平台为例，截至2018年7月底，Coursera共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所世界著名的学校进行合作，共同提供课程服务[⑤]。MOOCs作为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大大拓展了学习者的容纳程度，也拓宽了学习者的来源渠道。

当追踪MOOCs的发展轨迹及分析其本质属性时，我们发现MOOCs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变革，更立体、全面地诠释了高等教育“开放”的理念，MOOCs的开放属性为：开放的主体、开放的内容、开放的对象、开放的形式、开放的目的（祝智庭，2013）。MOOCs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以专业为单位、校园为场所，仅面向少部分精英的服务方式，而是一种以课程为单位，基于网络的、开放灵活的优质高等教育服务方式，这样的服务方式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课程，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

2.混合式的服务方式

借助互联网提供教育公共服务，将传统的线下服务方式变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方式。互联网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进行信息交换，可以打破传统单一线下教育服务方式的局限，实现线上线下服务的无缝衔接和补充，丰富不同受众获取教育服务的手段和途径。

混合式教学的具体做法是借助MOOCs平台进行教学，同济大学从2013年9月开始，将大学物理课程作为MOOCs混合式教学的试点，将整个学期一半的教学课时安排为学生自由在线学习知识点，另一半课时为面授，教师进行课程的知识讲解，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在其课程的混合式教学中，通过平台对学生在线学习过程做多维度（线上视频学习持续时间、课程学习进度、进阶学习过程测试、章节测试、学习资源利用率、学习笔记等）的记录，并将其数据纳入学生的综合评价中（门路，王祖源，何博，2015）。虽然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最后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服务方式带来了大量传统教育无法提供的新形态教育服务，例如自动批改、人工智能解题、社交化学习、即时反馈、在线辅导与答疑等，且学习者线上的学习痕迹被保留了下来，更加有利于对学习者进行过程性评价。

3.个性化的服务方式

教育大数据和学习分析使高等教育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成为可能。教育服务的受众具有多层次和多元性，借助大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师生教与学的全过程数据。在全面采集师生全过程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处理、分析，可实现以数据驱动的“因材施教”、教育评价与决策的科学化。随着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均已出现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应用。

在国外，美国普渡大学的课程信号系统（Course

Signals)，依据学生在学习管理系统中以前和现在的学业表现，利用智能分析技术，判断学生可能存在的学习风险，帮助学生学业成功。在国内，研究者运用学习分析技术对在线学习者的综合评价开展了研究，从投入度、完成度、调控度、联通度和主动性等五个维度构建了学生综合评价参考模型，通过分析在线学习平台的数据形成了学生综合评价的参考值（郑勤华，陈耀华，孙洪涛，陈丽，2016）。通过在网络教育机构中的实际应用，也证明了研究构建的评价参考模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随着学习分析技术的不断提高，学生综合测评模型也不断完善，借此为教与学的个性化干预提供指导建议，进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质量。

（四）服务受众——身份多元化、观念更多以兴趣为主

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高等教育对象为18~22岁之间的青少年，即对象多为适龄人口的大学生（潘懋元，2010）。互联网支持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大大拓宽了学习者的范围，使不同年龄和结构且有不同高等教育需求的学习者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也带来了学习者观念的巨大转变。

在国内，2016年12月，果壳网对30 187位学习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学习者的年龄大多数是90后，占全部调查者的69.32%；居第二位的是80后年龄段的学习者，占23.53%；居第三位的是70后年龄段的学习者，占4.46%；其后分别是00后、70前年龄段的学习者，分别占1.81%、0.89%。虽然年龄段相对集中，但学习者的覆盖范围比较广，55.61%的学习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51.50%的学习者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水平，而传统学习方式催生出来的学习需求，如提高学习成绩仅占22.70%，而为通过考试的仅占25.83%[⑥]。

在国外，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整体性设计，其中一个方面即是：建立开环大学（Open Loop University），对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既可以是少年神童，也可以是耄耋老人。改变传统的固定学制，时间从四年延长至六年，而且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实施弹性学习制度，只要取得入学资格，学位终生有效，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任选六年进行学习。

在“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的年龄结构不再局限于某一年龄阶段的学生，社会公民不分等级、不分年龄阶段均有机会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受教育群体的范围明显扩大，而且越来越多学习者的学习观念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五、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大量教育创新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各要素的变化，使教育服务供给方更加多元，草根和专业化的服务机构都参与到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方；服务的方式更加多样，包括开放、混合、联通、个性化、碎片化的服务方式；服务受众身份更加多元，观念更多以兴趣为主；高等教育环境中的政策制度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都在表明一种全新的、开放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为此，为更好地引导现阶段的创新实践，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好更快发展，基于“互联网+”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服务模式的变化，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育改革的方向应是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

“互联网+”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思路都是利用互联网开放共享、互联互通的功能，充分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推动供给侧改革，构建全新的教育服务体系。“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也充分证明，教育信息化已经进入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互联网的开放性正在撬动传统学校教育封闭的大门，重构教育的服务体系（陈丽，李波，郭玉娟，彭棣，2017）。新技术为资源的汇聚和共享提供了新平台和新模式，而且行业和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高等教育体系中以个体学校为单位的服务模式势必要解构与重新组合，未来教育服务体系必将与社会高度融合，更加开放。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需要两个系统做支撑：一是不断丰富和智能化的技术环境；二是开放的教育制度（陈丽，2016）。技术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会更加丰富与智能，但开放的教育制度则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

（二）加强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与集中领导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改革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在系统性顶层设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局部无序发展，容易带来问题，甚至会引发教育危机事件。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不是学校教育改革，是重构出一个全新的教育服务体系和组织体系的创新实践。国家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应广泛吸纳具有先进理念，具有创新思维，特别是对“互联网+教育”有创新经验和深入研究的各类专业人员参加。社会教育体系中的教育改革不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互联网教育产业、草根等。明确公立学校教育的职责范围，鼓励社会各界力量提供教育服务，提出并实施“互联网+教育”行动计划，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加快构建学分成果认证制度

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迫切需要构建开放的教育制度，需要构建学分成果认证制度。比如MOOCs，其实质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服务模式

的变化，MOOCs不仅是教育资源向大众开放，更重要的是一种教学服务的开放，它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文化传统、价值观等进行灵活自主的个性化学习，创新了教育服务模式，打破了教育的垄断，增加了人们对教育的选择性，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但MOOCs学习者辍学的最大原因是MOOCs学分不被认可，可持续的学习动机难以维持。传统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MOOCs的发展，若有开放的教育制度支撑，如学分积累和学分转化制度，有更多的MOOCs课程，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面向世界顶尖的大学，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课程，自由灵活地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学历。这种开放的教育服务体制，更好地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灵活、优质”的学习需要，扩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服务范围。

六、总结

“互联网+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其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建设技术环境与推动技术应用，而是运用互联网破解教育发展的难题，推动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互联网以其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消费驱动等特征，必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教育创新实践，构建灵活开放的教育体系，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所描述的特征并没有在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机构呈现，当前只是呈现出冰山一角，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特征将更加显现，整个的教育体系将会重构，这个趋势已经存在，只是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观念不同，改革的魄力不同。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进程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如果我们能突破传统的体制机制，中国教育必将催生出更多的创新教育服务模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注释

①详见可汗学院官方网站https://www.khanacademy.org.

②详见麦课在线网站http://www.mycourse.cn.

③⑤详见Coursera官方网站https://www.coursera.org.

④⑥详见果壳网网站http：//3.im.guokr.com/IqtKiwa4sQuiCgIqWE07bld1hMSVyRBp8YnnaAiSBO8tAgAABCAAAFBO.png.

参考文献

[1] 陈丽，李波，郭玉娟，彭棣（2017）.“互联网+”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新趋势和新方向[J].电化教育研究，（5）：5-12+27.

[2] 陈丽（2016）.“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本质与变革趋势[J].远程教育杂志，（4）：3-8.

[3] 陈丽，王怀波，孙洪涛，刘春萱（2017）.中国MOOCs的回归与高等学校教学服务模式变革方向[J].中国电化教育，（8）：1-6+12.

[4] 林世员（2016）.“互联网+”新型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变革战略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5] 门路，王祖源，何博（2015）.MOOC本土化的可行性和关注点——基于MOOC平台的大学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J].现代教育技术，（1）：53-59.

[6] 南国农（2005）.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7] 潘懋元（2010）.潘懋元文集（卷2）理论研究（上）[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339.

[8] 秦虹，张武升（2016）.“互联网+教育”的本质特点与发展趋向[J].教育研究，（6）：8-10.

[9] 余亮，陈时见，赵彤（2017）.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内涵、特征和模式[J].电化教育研究，38（4）：66-71.

[10] 余胜泉，王阿习（2016）.“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10）：1-9.

[11] 曾海，贾鑫鑫，陈品德，谭颖臻，谢巍（2014）.开放大学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服务模式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11）：50-54.

[12] 郑勤华，陈耀华，孙洪涛，陈丽（2016）.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学习者综合评价参考模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9）：33-40.

[13] 祝智庭，闫寒冰，魏非（2013）.观照MOOCs的开放教育正能量[J].开放教育研究，（6）：18-27.

[14] Siemens,G.(2011) Orientation: Sensemaking and wayfinding in complex distributed onlin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D]Aberdeen: University of Aberde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15] Thomond, P., Herzberg, T., Lettice, F.（2003）. Disruptive innovation: Removing the innovators’ dilemma. In:Knowledge into Practice-BAM Annual Conference[C]. Harrogate,UK.

作者简介

郭玉娟，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远程教育基本理论。

（下转第33页）

【远程教育创新】

“互联网+”时代下“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发展两面观

——在线教育领域中草根模式发展的问题分析

孙雨薇　陈　丽

(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互联网催生商业领域的转型和变革，产生“草根服务草根”的创新服务模式，但草根模式在在线教育领域中久经尝试却失败。为了探寻其中的原因，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制度、政策梳理构建了“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分析框架，包括商业和教育两大要素，学习者规模、成本-效益、制度保障、政策土壤、教学成效等五大子要素。之后选取了商业领域和在线教育领域中典型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实践案例，利用分析框架对案例进行了分析和对比，总结出在线教育领域该模式发展的问题框架。研究发现，“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在教育领域中的发展和成熟存在诸多障碍和欠缺，集中为四个要素：用户对教育的消费习惯和意识不足够开放，迷信权威，用户的公信文化培育不良；支持模式发展壮大的可持续性的成本-效益模式不成熟；欠缺相关制度保障，缺少学分认证制度、质量保证制度、用户评价制度等，来激励草根参与服务并保证资源与服务的质量；缺失政策土壤，缺少维护网络知识产权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缺少政府对在线教育领域内实践的有效监管，也缺少推行创新教育模式积极实践的支持性政策。

【关键词】“草根服务草根”模式；互联网+；商业领域；在线教育领域；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26-008

一、引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其优化、增长和创新（陈丽，2016）。“草根服务草根”模式便是技术支持下的创新，最先出现在商业领域，促进了其在互联网时代下的优化、变革。“淘宝网”是该模式典型的成功案例，它让我们认识到“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力量和应用潜力。教育领域中，原有的以学校和权威机构为供给主体，以规模化、标准化教育产品为内容的教育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林世员，2018）。在线教育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均在积极寻找变革教育的途径。其中，不乏对“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尝试，却没有出现如“淘宝”一般的成功实践，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教育领域内“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践是否可以实现呢？第一，该模式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必然会带来极大动力，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二，商业领域和教育领域二者在需求和发展趋势上存在共同点。学习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二者的发展趋势均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消费者为中心，即“消费驱动”。第三，教育领域中存在很多教育问题，单靠学校等传统教育体系和角色解决不了，而社会中蕴含着大量的草根资源，他们能为解决部分教育问题贡献极大的力量（陈丽，2016）。教育领域是非常需要这些草根资源的。由此，我们相信，教育领域内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是可以实现的。

虽然，目前在教育领域内尚未有成功的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模式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在特定的时代阶段和文化背景下遇到了瓶颈和束缚，周遭支持其发展的条件不具备、不充足，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利用分析框架，分析两个领域中该模式的实践，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探寻“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在商业领域成功的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5

原因，以及在在线教育领域中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草根”的内涵

现今，“草根”一词正在大范围出现，草根金融、草根传媒、草根教育等，在不同的情境下有其具体、不同的涵义。草根媒体指普通人利用简便传播工具、途径发声，具有自媒体、私媒体的特质（闵大洪，2008）；草根金融意指置于底层的、民间性的、普惠性的金融组织（皮天雷，2012）；而教育中的“草根”，可能指社会机构，可能指扎根一线实践的教师（徐光涛，吴永强，任友群，2014），还可能指社会普通个体（陈丽，2017）。

在本研究中，取“草根”的“群众的、个体的、普通人的”的涵义，而抛弃其“底层的、乡村地区的”内涵。具体确定为，社会中的个体用户、个体学习者，而非底层人民或拥有优良资源和支持的社会企业、机构、团体等。

（二）“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对应于“草根”的内涵，“草根服务草根”在不同领域也有不同的涵义。最早出现在金融领域，例如利用互联网实现个体与个体间的直接借贷，即P2P网贷（余许友，2016）。教育领域中，陈丽（2016；2017）提出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不仅仅是政府、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还有广泛的社会机构、社会普通个体，通过互联网向他人提供教学资源和服务。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下，教育领域中的新现象——草根服务草根。

本研究中，“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内涵借鉴陈丽（2016；2017）的观点，具体指的是颠覆传统的资源和服务提供方，社会中的草根个体提供资源和服务，草根个体享受提供的资源与服务，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交流共享，彼此服务是一种新的服务模式。

互联网以其互联互通的特征为“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现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基于互联网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特征可总结为：①去中心、去权威：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者；②基于渠道和路径：利用网络、平台、社区等实现；③互联互通：个体与个体之间，需求与供给之间相互联通，寻找便捷；④协同与共享：个体与个体之间交流共享，协同解决问题。

三、“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分析框架

（一）商业领域中“草根服务草根”模式成功实践的分析框架

“草根服务草根”模式是商业服务模式之一，而判断一个商业模式是否能长久成功，需要检验标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更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①从商业模式的内涵来看，许多研究者将商业模式定义为经济模式，本质内涵为盈利（Rappa，2000；Stewart & Zhao，2000）；②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来看，共性的要素包括收入模式、利润模式、盈利模式等（Linder & Cantrell，2000；Petrovic & Kittl，2001；Osterwalder，Pigneur，& Tucci，2005；熊国钺，2016；陈治扬，2017）。此外，还有学者提到顾客范围要素（Afuah & Tucci，2001）、用户基数（陈治扬，2017）等；③从商业模式的评估来看，以往大量研究均采用盈利性的指标来评估商业模式（Hamel，2000；Gordijn，Akkermans，& Vliet，2001；Afuah & Tucci，2001）。互联网时代下，胡世良（2016）认为检验和判断互联网商业模式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四个标准：能否形成庞大的用户规模及用户黏性，能否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等。其中，用户规模最为关键，它是决定模式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而盈利是商业模式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目的（胡世良，2016）。

综上发现，无论是之前，还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现在，盈利和用户规模均是评判商业模式成功与否最为关键的要素。盈利指企业的利润创造，利润点是盈利的重要指标之一（栗学思，2003），互联网时代下包括产品、服务、内容、广告、用户流量等利润创造方式（曾繁旭，王宇琦，2016）。用户规模即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或使用者群体的规模（栗学思，2003），包含用户数量和用户黏性（胡世良，2016），而在“草根服务草根”模式中，通常拥有提供者和购买者双边用户群。

除了上述两个内部要素，“互联网+”时代下，维持商业模式的长久成功，制度保障和政策土壤等外部要素也缺一不可。本研究中，制度保障具体指行业、产业或产品在体制和机制上的支持与保证。盈利和用户规模的创造，往往是依靠新技术加持下的产业机制的改革与升级，正如电商零售颠覆了传统零售一般。政策土壤指政府的监管和扶持。创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消费模式挑战了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现今存在诸多的法律空白，而这些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不断修改和完善监管措施和法律框架（汤天波，吴晓隽，2015），政府的监管和扶持始终是商业成长的阳光雨露。综上，将商业领域中草根模式成功实践的分析框架确定为商业领域中模式分析框架（见表1）。

表1 商业领域中模式分析框架

商业要素			
用户规模	盈利	制度保障	政策土壤
用户数量 用户黏性	产品 服务 内容 广告 用户流量	制度支持与保证	政府监管 政府扶持

（二）在线教育领域中“草根服务草根”模式成功实践的分析框架

在线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也有其经济特性（郝源，2006）。它的成功除了必须遵守相应的教育教学规律，也必须形成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即成本−效益路径（郑勤华，陈丽，许玲，2015）。同商业领域中“盈利”的内涵相似，一个教育服务模式的实践也需要成本投入，无论是产业投资还是政府拨款；也需要效益产出，无论是利润还是教学成效。传统远程教育相较课堂教学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有效的规模经济，而今，标准化、大规模、单一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已难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郑勤华 等，2015），原有的经济优势难以体现。因此，成本−效益模式的重构是在线教育相关实践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互联网环境下，只有当学习者的规模足够大时，能够分担固定成本，降低学习支持投入，在线教育实践才有可能实现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郑勤华 等，2015）。因此，学习者规模关系到有效“成本−效益”模式的重构。它们将共同决定一个创新实践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生存。

对于创新的教育服务模式，当下传统的政府管理措施必然会产生束缚的力量，需要新的教育监督管理措施，帮助其破茧成长。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培植也必不可少。在MOOCs参与高校教学服务模式变革的实践中，教育部和国务院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和《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这些干预和扶持对MOOCs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陈丽，王怀波，孙洪涛，刘春萱，2017）。足以见得，政策土壤也是教育服务模式成功的要素。

要加速社会力量与教育的融合，推动草根服务草根的扩张，必然需要配合相应的教育体制机制（陈丽，2017）。这些制度包括：①激励制度。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化工作应致力于建立开放的体系和制度，建立支持与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草根力量参与到教育服务（陈丽，2017）。②质量保证制度。“互联网+”时代下，各种教育类型、学习方式层出不穷，为了保证各种资源与服务的质量，建立统一的中国在线教育质量保证制度迫在眉睫（陈丽，沈欣忆，万芳怡，郑勤华，2018）。③用户评价制度。特别是对于“草根服务草根”这种存在双边用户的模式，透明的用户评价制度利于维护双方权益（胡格源，张成刚，2018），公开教育产品或服务质量。 这些新的教育制度，能够促进所有有价值的知识、经验和服务在互联网流通起来，进而保障该模式有效、有序的实践。

除了商业性质要素、政策、制度要素，“草根服务草根”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服务模式，其教育的特殊性不容忽视。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模式最重要的功能是带来积极的教学成效。教学成效可指学习者知识的习得、能力的提升、满意度或成绩的提高、学习成果转化等。人才培养、全民学习是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育服务模式的最终目标（陈丽，2017）。因此，教学成效是评价该模式在教育领域中成功与否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

综上，评判在线教育领域中该模式成功并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如表2所示。

表2 在线教育领域中模式分析框架

商业要素		教育要素		
学习者规模	成本–效益	制度保障	政策土壤	教学成效
学习者数量 学习者黏性	固定成本 学习支持投入（产品、服务、广告、用户流量等） 利润创造 教学成效产出	激励制度 质量保证制度 用户评价制度	政府监管 政府扶持	知识习得 能力提升 满意度提高 成绩提高 学习成果转化

四、“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分析

（一）“互联网+”商业案例分析

在商业领域中，选择了三个实践案例。首先，这些案例是典型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践；其次，它们要么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要么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当下流行趋势。

1. 淘宝网：草根提供商品

淘宝网，中国最大的网购零售平台。以往，用户购买产品容易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被困在传统商业模式中，消耗着时间和经济成本，往往还满足不了需求。现今，凭借互联网互联互通和快速响应的优势，淘宝为用户搭建了一个大规模社会化交易的平台，社会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品的提供者，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轻易地找到商品实现需求，淘宝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特征，利用“草根服务草根”的模式实现网络交易，成为商业领域最为成功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实践。

1）遍布全国甚至扩至海外的用户规模。一方面，淘宝采用C2C的交易模式，向社会大众开放，具有低门槛的准入机制，吸引了大量草根商户。另一方面，淘宝采用用户免费体验策略，积累了大量消费用户，且用户黏性强。

2）盈利巨大。淘宝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流量，创造网络时代下的商业价值，其他利润点还包括电商服务、广告等。

3）制度创新，拥有保障。淘宝最大的创新和贡献在于搭建了一个在线交易平台，为“草根服务草根”提供了渠道。同时完善了相应的制度体系以长期保障，包括：安全准

入制度，淘宝引入实名认证制；第三方支付保障机制“支付宝服务”，保障用户与商家的利益；用户评价制度，消费者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用户评价来了解商品质量，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

2. 众筹经济：汇聚草根力量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众筹经济模式出现，活跃在社会大众身边。“众筹”主要由融资者、投资者以及平台构成（王陈，2016），融资者利用互联网对项目进行小额融资，并且在一定风险水平下为投资者提供回报（易辉，郝演苏，2016）。

“互联网+”时代下，出现了更多样、参与对象更广泛的众筹模式，例如，微信中的“轻松筹”、“水滴筹”等，靠朋友圈的人际扩散筹得资金与帮助。这种新形式的“众筹”有以下特点。

1）辐射人群广泛，参与对象众多。一方面，其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能在短时间内汇聚社会上的大量个体。另一方面，融资者的需求通常十分迫切，而投资者在善良、互助的优良品德的驱动下，往往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因此有一定用户黏性。

2）多方均可实现“盈利”。融资者能够得到及时的经济帮助，投资者可以获得心理满足感或获得利润回报，而平台或APP则可利用服务和用户流量实现盈利。

3）制度保障尚未完善。目前，“众筹”用户需要自身实名认证，有的还需亲友提供证明，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例如项目书、病情诊断书等，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众筹”的真实性。但准入之后的系列运作机制还不透明、不完善。

4）政府监管空白。尽管存在准入制度，但“众筹”面临的安全、信用问题仍较为突显。还需相关机构和政府出台必要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以保障众筹经济的健康发展。

3. 共享经济：草根提供闲置商品与服务

现今，社会共享经济掀起一阵热潮，例如小黄车。虽然还未像淘宝网那样已创立了雄厚的商业帝国，但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P2P共享经济的形式包括：基于互联网的租赁和二手交易市场；共享技术、时间、劳务等无形资源；共享高价值固定资产，如民宿等（汤天波，吴晓隽，2015）。这些共享产品的提供主体指社会草根个体，而非企业和政府，更强调P2P。

P2P的共享型经济迅速发展，但配套的制度和政策还未跟上。

1）便捷地创造价值，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社会中存在大量的、被闲置的草根产品与服务，个体将这些闲置资源进行社会化利用，既能实现提供者的额外收入，又能便捷地、性价比高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共享经济具有庞大的、潜在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基数。

2）制度保障缺失。共享经济是全新的经济模式，存在安全、信用、税收等多方面的问题和隐患（汤天波，吴晓隽，2015）。虽然部分共享平台和APP设置了用户评价制度，但共享经济的产业还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体系。

3）政策监管空白。共享经济同样也在不断挑战传统的政府管理，该模式下各主体权利、义务与责任不清（汤天波，吴晓隽，2015，p.80）。虽然我国政府对共享经济大力扶持，但相关的监管措施、法律法规还未配备到位，存在隐患。

4. 分析与总结

上述案例在多方评判要素下有不同的实践成就，证明了“草根服务草根”这种模式在经济领域内可以实现并发展（见表3）。

表3 商业领域案例的成就分析

	用户规模	盈利	制度保障	政策土壤
淘宝网	✓	✓	✓	
众筹经济	✓	✓		
共享经济（P2P）	✓	✓		✓

将商业领域内的案例之间进行纵向对比（见表3）。淘宝网无疑是最为成功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践，它的规模辐射全国，盈利巨大，更是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效应。它最大的创新在于利用互联网创造了一种C2C的服务，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与支付方式，养成了我们网购和虚拟货币的消费意识和习惯，而这种成功能够不断扩大和延续的关键是“支付宝”这个第三方支付机制，为它的长久发展保驾护航。相较淘宝，众筹经济和共享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方面不那么“成功”。

分析原因，淘宝网的成功归结为两点，一是抓住了“草根”力量，创造了“草根”服务；二是有完善的制度上的保障。而众筹经济和共享经济也关注并创造了“草根”服务，甚至还有政府的扶植，但是缺乏完善的保障制度和监管措施，也就缺少了可持续扩展的土壤，长此以往，可能滋生“细菌”。可见，制度的保障、政府的监管对于“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实践的发展与成熟多么重要。

（二）“互联网+”在线教育案例分析

在线教育领域中，同样选择了三个案例，这几个案例不仅具有非常典型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特征，而且在教育领域内影响深远，被认为是能够推动教育变革的创新实践，备受学术界关注。

1. “淘宝同学”：草根提供教育产品

“淘宝同学”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教育类产品交易平

台。任何用户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在“淘宝同学”发布课程或申请在线直播权限。

1）学习者规模方面。淘宝同学打破了教育产品的中心性，学校与专门教育机构不再具有天然的学术霸权，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教育产品的提供者，促使教育产品多样化。大众可以像在淘宝网上选择商品一样，在平台上寻找并付费获取自己需要的教育资源，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要。但淘宝同学的用户流量与淘宝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原因在于，教育的特殊性使得大众对教育服务和产品的选择非常慎重，长期的传统教育使大众迷信学校和教师的权威，很难相信在网络上由陌生人提供的教育。

2）成本－效益方面。淘宝同学作为一个商业化的教育产品，加之淘宝网的前车之鉴，它有较成熟的、可持续的成本－效益模式，主要利用产品、服务、广告等创造利润。

3）制度保障与教学成效方面。淘宝同学更像是淘宝网从商业领域复制到教育领域的产品，仅有第三方支付机制从商业方面来保障双边用户的权益，但没有从教育方面配置相应的内容标准来保证教学成效，缺少内容的准入标准和质量保证制度。

4）政策土壤方面。虚拟教育服务和产品、网络知识的产权的维护，这些均是现今法律法规的空白。

2. 可汗学院：草根提供教育资源和服务

可汗学院不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紧密的MOOCs，它不限制课程提供者的身份，可以无障碍地分享自己的课程。可汗学院的独创价值与淘宝同学一样，在于颠覆了传统学校体系中教师的资格和身份，学校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服务的唯一渠道，社会的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和服务（陈丽，2016）。

1）学习者规模方面。可汗学院是非营利性质的，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学习这些免费的、优质的课程，因此其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学习者。

2）成本－效益方面。可汗学院虽不向学习者收取任何费用，但其公益性激励并吸引了大批提供者，大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可汗学院利用庞大的用户流量，巧妙地通过各视频网站的广告费来维持运作。这使得可汗学院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实现了“盈利”。

3）教学成效方面。可汗学院以其灵活、有趣的课程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马明山，乔丹丹，汪向征，2014），有效辅助了学生的课外学习，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4）制度保障与政策土壤方面。可汗学院颠覆了教育资源与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这一创新必然伴随了课程质量保证、网络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法规问题。

3. 联通主义在线课程：草根与草根间的知识共享

在此类课程中，学习者既是资源和经验的提供者，又是受益者，学习者利用互联网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学习者进行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实现知识建构和创造。而教师更多扮演设计者、组织者的角色，承担引导功能。

目前，联通主义在线课程并没有被大规模地开发，在国内，火热的MOOCs也仅有1到2门属于联通主义课程（郑勤华，李秋菊，陈丽，2015）。这关乎诸多方面的因素。

1）学习者规模方面。虽然联通主义课程是由学习者提供资源与服务，但这对学习者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有一定要求，在无形中增高了学习者进入的门槛。

2）成本－效益方面。联通主义在线课程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其在组织、管理和学习支持上的成本要高于一般MOOCs和其他在线课程，目前又没有明确的“利润点”，例如，内容付费、学习成果转化等，因此始终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成本－效益模式。

3）教学成效方面。相较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的在线课程，联通主义的学习能帮助实现“评价”“创造”等高层次的教学目标（陈丽，冯晓英，2015），汇聚群体智慧，实现知识创新。

4）制度保障和政策土壤方面。联通主义课程的学习成果如何转化？学习者贡献的知识和资源如何保护？现存的这些制度和法律问题是激励学习者参与、维持课程可持续的障碍。

4. 分析与总结

在线教育领域中的三个案例，在不同的评判要素上有不同的成就，也存在不同方面的缺陷（见表4）。

表4 在线教育领域案例的成就分析

	商业要素		教育要素		
	学习者规模	成本－效益	制度保障	政策土壤	教学成效
淘宝教育		✓			
可汗学院	✓	✓			✓
联通主义在线课程					✓

表4将两个领域的实践案例进行横向对比。

可汗学院和联通主义课程均是最为典型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均为草根个体贡献知识与经验，相较可汗学院，联通主义课程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效的成本－效益模式。它在管理和支持服务上将耗费大量的成本（郑勤华，2014），但它无法像淘宝网、淘宝同学一样直接收取学习者的“学费”，因为这必将限制学习者的准入，而缺少学生基数的课程将无法联通。因此，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特征

设计有效的成本−效益模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淘宝同学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淘宝网，而二者成就的差异源于教育的特殊性。淘宝的成功在于搭建了一个服务平台，壮大了C2C这种服务，而非用户本身；然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不在于服务，它不仅要关注服务的模式，更要保证服务的内容，保证教学成效，二者的落脚点是不同的。因此将淘宝模式迁移到教育领域却没有相应的教育方面的质量保证制度和产权维护法律法规的支持，仅靠商业方面的维持，其很难实现发展壮大。

在商业领域和教育领域，政府的扶植和监管作用均不明显。商业实践尚可依靠雄厚的经济力量维持，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实践往往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尤其是处于发展初期的教育创新实践，例如联通主义课程，若没有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以及法律法规上的完善，难以保障其日后长久发展。共享经济虽有政府的扶植，但政府相关的监管措施未完善，且在无产业制度的约束下，其发展存在很多隐患。因此，扶持与监管缺一不可。

五、讨论与总结

基于分析框架，对商业领域和在线教育领域的模式实践进行了横向、纵向的交叉分析。据此，本研究从用户特征、成本−效益模式、制度保障、政策土壤四个方面，归纳现今在线教育领域内“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见表5）。

表5 在线教育领域中“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发展的问题框架

要素	内涵
用户特征	消费习惯与意识 公信文化
成本−效益模式	固定成本 学习支持投入 产品、服务、广告、用户流量等的利润创造 教学成效产出 ……
制度保障	学分互认制度 质量保证制度 用户评价制度 ……
政策土壤	实践监管措施 网络知识产权维护法律法规 推动实践的支持性政策 ……

（一）用户特征是规模形成的障碍

用户消费意识和公信文化的培养是模式实现的基础。一方面，大众迷信教育权威，使得用户对教育产品的消费意识远不如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意识开放。但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相信人们对教育产品“草根服务草根”的消费习惯和意识，也会像如今网上购物和电子支付一样的习惯和认同。另一方面，国民的公信文化培育欠缺。资源分享与经验交流过程中个体分享的资源与成果，如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可能产生滥用侵权的现象，难以形成良性的教育资源分享循环，难以激励学习者的参与。

（二）成本－效益模式的不成熟

成本−效益模式的可持续性，是草根模式实现的根本。无论是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都需要靠有效成本−效益模式来支持其运作。相信在便捷、联通的互联网时代下，大规模的学习者群体将会降低在线教育的固定成本，学习者间的互助也会减少学习支持的投入，同时更易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增加教学成效产出，并且带来大量可以创造价值的数据和流量。

（三）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制度保障是模式实现并健康、长久发展的保障。这包括建立激励学习者参与的制度，如学分互认制度；教育资源与服务的质量保证制度；还有透明、专业的用户评价制度等。在线教育领域至今都没有统一的、权威的质量保证机制或第三方机构评估，无法保证草根提供的教育资源与服务的质量；也没有完善的激励制度和用户评价制度。这对教育领域中“草根服务草根”的实践与长久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四）政策土壤的缺失

政府的监管和扶持是模式实现健康、长久发展的另一大保障。目前，在线教育领域内专门的法律法规是缺失的，例如网络资源与服务的产权法律法规，使得学习者之间的资源共享难以形成良性循环；缺少政府对在线教育领域甚至是教育领域内实践的有效监管；还缺少推行教育领域中创新模式实践的支持性政策等。教育的特殊性尤其需要政府为在线教育领域中“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现及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虽然目前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现今在线教育领域内没有成功的“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实践而否定模式本身，也不能因为存在上述问题的限制而丧失对模式的信心。首先，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具有互联互通、传递速度快、用户成熟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极大地促进“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派生。其次，学习者自身不断成熟，既拥有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自身也拥有很多资源和经验，在消费驱动的时代下，草根与草根之间能够相互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相信在未来，上述的这些问题能够被逐渐解决，制约“草根服务草根”模式的瓶颈不复存在，模式将发挥极大的潜力，成为教育体制机制变革的创新成果，不仅为在线教育甚至将为整个教育的变革贡献极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丽，冯晓英（2015）. 学习理论的发展与网络课程教学策略创新[J]. 开放学习研究，（1）：1-8.

[2] 陈丽（2016）. “互联网 + 教育”的创新本质与变革趋势[J]. 远程教育杂志，（4）：3-8.

[3] 陈丽，李波，郭玉娟，彭棣（2017）. “互联网 +”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新趋势和新方向[J]. 电化教育研究，（5）：5-12.

[4] 陈丽，王怀波，孙洪涛，刘春萱（2017）. 中国MOOCs的回归与高等学校教学服务模式变革方向[J]. 中国电化教育，（6）：1-12.

[5] 陈丽，沈欣忆，万芳怡，郑勤华（2018）. “互联网+”时代的远程教育质量观定位[J]. 中国电化教育，（1）：15-21.

[6] 陈治扬（2017）.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成功要素研究——以亚马逊为例[J]. 市场营销，（2）：39-40.

[7] 胡格源，张成刚（2018）. 共享经济平台双边用户评价与权益保护机制研究——以滴滴出行为例[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35（2）：109-117.

[8] 胡世良（2016）. 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的标准[J]. 中国电信业，（7）：56-57.

[9] 郝源（2006）. 现代远程教育成本核算体系初探[J]. 中国远程教育，（2）：15-18.

[10] 林世员（2018）. “互联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动因、内涵与特征[J]. 开放学习研究，23（4）：50-55.

[11] 栗学思（2003）. 如何规划企业的赢利模式[J]. 通信企业管理，（6）：59.

[12] 闵大洪（2008）. 草根媒体：传播格局中的新力量[J]. 青年记者，（15）3：9-11.

[13] 马明山，乔丹丹，汪向征（2014）. 公众视野中的可汗学院课程评价及其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1）：93-98.

[14] 皮天雷（2012）. 草根金融理论分析：逻辑、比较与制度变迁[J]. 中国经济问题，（5）：22-29.

[15] 汤天波，吴晓隽（2015）. 共享经济：“互联网+”下的颠覆性经济模式[J]. 科学发展，（85）：78-84.

[16] 王陈（2016）. 我国互联网众筹发展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

[17] 熊国钺，袁婧祎（2016）.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成功要素研究[J]. 管理观察，（2）：72-74.

[18] 徐光涛，吴永强，任友群（2014）. 唤醒基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内在力量[J]. 中国电化教育，（8）：8-13.

[19] 易辉，郝演苏（2016）.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众筹相互保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4）：35-41.

[20] 余许友（2016）. 草根金融及其发展——互联网金融P2P网贷发展的当下问题及对策探讨[J]. 理论探讨，（4）：95-98.

[21] 曾繁旭，王宇琦（2016）. 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的盈利模式[J]. 新闻记者，（4）：20-26.

[22] 郑勤华（2014）. 学习理论与远程教育成本效益实现路径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20（5）：29-37.

[23] 郑勤华，陈丽，许玲（2015）. 远程教育的比较优势仍在？——互联网时代远程教育成本—效益的实现路径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107-117.

[24] 郑勤华，李秋菊，陈丽（2015）. 中国 MOOCs 教学模式调查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21（6）：71-79.

[25] Afuah, A. & Tucci, C.(2001). Internet business models and strategies: Text and cases[M]. Boston: McGraw- Hill /Irwin: 32-33.

[26] Gordijn, J., Akkermans, J., & van Vliet, J.(2001). Designing and evaluating e-business models[J].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16(4):11-17.

[27] Hamel, G.(2000).Lead the revolution[M].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56-198; 196-201.

[28] Linder,J. & Cantrell,S.(2000). Changing business models: Surveying the landscape[R]. Accentur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Change.

[29] Osterwalder, A., Pigneur, Y., & Tucci, C.L., (2005). Clarifying business models: Origins, 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J]. Communic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15(5): 1-25.

[30] Petrovic, O., Kittl,C., & Tekste, R. D.(2001). Developing business models for e-business[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Vienna, Austria.

[31] Rappa, M. (2000). Managing the digital enterprise-business models on the Web [EB/OL].[2018-07-15]http: // digitalenterprise. org /models /models. html.

[32] Stewart, D. W. & Zhao, Q. (2000). Internet marketing, business models, and public policy[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19(3): 287-296.

作者简介

孙雨薇，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

陈丽，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

Two-side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 Model under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l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SUN Yuwei and CHEN Li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s: The Internet has given birth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field, resulting in an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of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 but this model has failed in online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 model through literature, system and policy, including the two major elements of business and education, and the five sub-elements of the size of learners, cost-benefi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policy soil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n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typical cases that chosen from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online education wit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summed up the problem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odel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the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 mode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user's consumption habits and awareness of education is not open enough, and the user's credit culture nurture is poor; lacking of cost-benefit model to support the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eva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lacking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credits system,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user evaluation system to motivate people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policy, lacking of maintenance of netw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lacking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lacking of supportiv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l.

Keywords: "Grassroots Service Grassroots"model; Internet Plus; commercial field;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 model

---

（上接第25页）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Model Changes in Internet Plus Era

GUO Yujuan

(Research Centre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revolutionary impact to the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et has also trigg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ow service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change to meet the need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phas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model including service providers， service content, service pattern and the customers of service. Then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case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changes of four elements in service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tends to develop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service content tends to develop from single to generative, the service pattern is more open, mixing, connective and individuation, the customers of service are more divers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more open system supports to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mode, aiming to enlighte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ternet Plus;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mo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开放大学建设】

特约栏目主持

李 哲 博士
北京开放大学教授
合作办学部主任

【编者按】开放大学的未来在哪里？它能成为在线教育的引领者吗？拿什么作为引领？如何走向引领之路？每一步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种衡量要遵循什么原则和评价体系？“开放大学在线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试图探求答案，其系列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以飨争鸣。“在线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立足现实、构想未来，在线教育不断弥补传统教育，未来在线教育有充分的技术条件去建立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教育模式，为未来社会培养“完整的人”。“基于战略地图的我国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研究”提供了一种更灵活和更具适应性的方法，可视化展现从“学习与成长层面”到“使命层面”的逻辑关系，保证战略规划的动态性。未来尚未明确，努力不能停止，“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在线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

韩 斌

（北京开放大学 创意设计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让每个公民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机会和能力，这是新时期国家对于教育的明确要求。随着未来人才结构的变化，在线教育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者，在线教育的目标便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在线教育要在高尚教育与实利教育之间，知识、技能教育和创新教育之间，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现实使命。研究提出了在线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狭隘的商业目标，而是培养“完整的人”。在追求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在线教育应当广泛呵护社会的创新基因，提供更加开放而包容的教育服务。

【关键词】在线教育；教育目标；完整的人；线下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34-007

一、教育面临无声的危机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提出，“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研究基金（全通教育）重点项目“开放大学在线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批准号：2016ZD105）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远程学习者情感体验设计研究”（项目编号：SM201551160002）阶段性成果。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6

“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是一个整体，个体在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奉献社会，在实现自己梦想、获得自身幸福的同时改造世界、造福人民。显然，教育的目标应该对完整的人生负责任。然而，当前世界多国的教育制度大都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传授更加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还是培养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公民？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以下简称WEF）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10年来，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经济持续增长面临极大挑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以胜任更为复杂的工作，并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生产体系不断演变的需求（世界经济论坛，2017）。此时，教育的目标已经面临着某种无声的危机。一部分线下传统教育囿于长期的专业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实际教育工作中选择“抛弃了一些技能”，偏向设置更实用的学科，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学习者的需要，而另一部分线下的传统精英教育又不具备普及性。

在线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进步不断革新教育的形式。然而，未来人才的结构也在发生急剧变化，很多传统职业都在逐渐消失。在线教育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者，他们不再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不再希望仅仅被看作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他们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希望彰显自己的个性、发现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在适应社会迅速变化的同时，也希望有能力辨识、批判、改善社会中不好的地方。简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个体思想的成长，人们对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教育的弊端也都逐渐地显现出来了。对此，未来在线教育的目标如果仍然和一些传统线下教育一样，局限在培养掌握某个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某种人”，只是提供一种流水线式的或是短期的职业技能训练，将很难再获得学习者的认同。

为了突破传统线下教育的某种局限性，帮助未来的学习者，激发出他们的个性潜能和创造力，赋予他们从容应对变化的能力，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复杂性，在线教育有责任思考和拓展对于教育目标的认识。

二、在线教育的现实使命

（一）在高尚教育与实利教育之间寻求平衡

高尚的教育以培养“至善”为最高目标。在评论中国教育问题时，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2016）认为，在人的素养方面，我国国民呈现出“低均值、高方差”的现象：平均素养低，素质差别大，其中素质极差的也不在少数。例如，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些知识水平高，但道德极差的人。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2002）在他的著作《我和你》中阐述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我—它”关系模式。“我—它”关系类似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我—它”关系中，“我”的兴趣总在于从“它”那里获取什么或达到什么目的。当这种关系存在于“我”与世界之间时，往往会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成就。然而，如果把这种关系和态度简单地放在人与人之间时，“我”如果同样不把这个“他”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当作可利用的“物”来看待，这就是人性的一种堕落。可是，当我们用马丁·布伯的眼睛看社会时，会发现此种关系和态度已被有意无意地采用。如果这种关系模式再简单移植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就成了“教育者”谋求利益的对象，这无疑是和人类的教育精神相违背的。

功利关系的形成往往和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事实上，个人或社会如果能够尊重他人的个人尊严和价值，保护他人的权利，通常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平民阶层中的一员，都有着“愿为知己者死”的勇气，实现自我价值、维护个人权利和尊严对于他们来说，是比生命更重的东西。他们愿意以生命的代价去维护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要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要倡导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也试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获得相应的回报，首先就应该在教育中倡导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应该相信，只有那些没有被纯粹的功利心看待、获得了权利的维护、实现了自我尊严和价值的学习者，才能够进一步接受道德和法律约束，成长为能够和谐共处的社会成员。

文明的进程也是人类不断摆脱不公正、不平等的进程。在线教育建立在公平教育的思想之上，崇尚高尚教育、平等教育，摒弃功利性教育是在线教育在践行自己的承诺。作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创新型学习模式，相比线下教育的时空局限及其面临的困难，科技的进步将使在线教育成为追求非功利性教育目标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一种现实选择。

（二）在知识、技能教育和创新教育之间寻求平衡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经济体竞争形态的划分，中国走过了依靠非熟练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要素驱动

阶段”，正处于依靠开发更高效的生产工艺并提升产品质量的“效率驱动阶段”，但远未达到依靠最精致的生产工艺和不断创新的“创新驱动阶段”。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分指数评分中，中国得分最高的是“市场规模”，而“高等教育与培训”和“创新能力”得分均偏低（世界经济论坛，2017）。近年来，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纠纷也表明，未来中国再走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模仿他人新技术、挖人才学技术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中国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然而，在知识、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方面，我国国民长期呈现“高均值大、方差小”的现象，也就是：“平庸人才多，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少，拔尖人才少。”（钱颖一，2016）事实上，处在“效率驱动”发展阶段并形成规模经济持续推升经济增长的中国，“更高效的生产工艺并提升产品质量”所需的创造发明，很多都并非来自本国。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利用技术提升生产力的能力与该技术是否由本国发明无关，关键在于在一国开办的企业应有机会接触先进的产品与图纸，并有能力对此加以吸收利用（世界经济论坛，2017）。大批国内企业正是依赖技术引进的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才迅速发展起来。

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关键。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需要获得政府与公众的支持和投入，核心就在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也就是“创新教育”。有学者认为，创新教育是一种超越式教育，不以“重复过去”为己任……相对现实教育而言，创新教育是一种主体性教育，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是创造活动的基本保证（龚春燕，龚冷西，2014）。本文认为，创新教育就其目标而言，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或者说是原创性人才。创新教育的基础在于提供“又宽又深”的知识范围，并且构建一个使学习者产生内在动力的环境，从而不断激发学习者自身的潜力和学习主动性。而创新教育的关键则在于对学习者个体人格的多样性、丰富性的呵护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例如，美国教育家罗德斯（Frank H.T. Rhodes）曾经指出，宗教以及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和戏剧等艺术形式是对于人们经历和遭遇的记录，我们需要对人类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进行探索。传统教育长期采取的专业化和知识分化的做法，消弱了通识教育的可能性，最终转变了学生的兴趣，损害了学习经历的多样化和活力，消弱了对于单个学生个性发展的普遍关心。（罗德斯，2007）

至于社会始终关注的创新成果，往往是个体自由发挥自身的潜能、想象力、创造自己生活时的副产品。因此，在线教育就需要超越传统的线下教育，提倡开展“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教育，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广泛的基础。即使培养合格技术员和熟练、半熟练劳动者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应该是所有国家发展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承旭，顾明远，2015）。不能将在线教育等同于在线职业和技术培训，而是应当努力在知识、技能教育和创新教育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

（三）在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个体在解决了涉及生存的“活”的基本问题之后，他并没有完成人“活着”的全部内容。他还要去关注生存质量问题，要去解决个体人生的种种烦恼，要关注个性潜能的发挥，要实现个人全面的成长，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伴随着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事业的参与和贡献，人类社会必然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个体受教育的目标，除了有一个强调个人收入增长的短期目标，还有一个确定自我成长的长远目标。而自我摆脱不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拥有自由的思考和批判理性精神。从1808年开始，哲学就是法国高中的必修科目，哲学考试是法国高中生毕业会考最重要的一科，考试长达4小时（见表1）。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法国中学生的哲学自由、理性的思考能力和有组织的表达、论述能力。”（陈赛，2016）

而且，对于学习者而言，“以技能和职业为目标的培训”不能等同于“受教育”或“有教养”。美国教育家罗德斯认为，“开放式的态度、自信和好奇心、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正确认识、经历和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定领域的知识水平、有责任感的公民、与价值观和道德观相应的方向感”等七种品质是“有教养的人”的重要标志（罗德斯，2007）。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克·约翰逊在一篇题为“职业可多向发展”的文章中指出，“花费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从事一种职业可能会让人感到厌倦，……技术变革意味着，很多职位将变得多余，这让新职业的再培训成为必要。长达30年的退休生活会让人止步不前、懒散、苦闷。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并且几乎从一开始就尝试从事多种职业。”（约翰逊，2013）除此之外，削减工作时间也已经渐成各国趋势，人们期望在工作之余，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例如，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

表1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题目汇总

	文学科考生试题	经济科考生试题	科学科考生试题
2015	1.尊重任何生物是不是一种道德义务 2.我是不是我的过去所造就的 3.评述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40）的一个节选段落	1.个体的意识是否只是其所属社会的反映 2.艺术家是否给予需要理解的东西 3.评述巴鲁赫·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670）的一个节选段落	1.艺术作品是否一定有意义 2.政治是否可以逃避真相的约束 3.评述西塞罗《占卜论》（前1世纪）的一个节选段落
2014	1.艺术作品能否培养我们的感受力 2.为了幸福是否必须尝试一切 3.解释卡尔·波普《客观知识》（1972）的一个节选段落	1.是否只要有选择便能称为自由 2.为什么要试图了解自己 3.解释汉娜·阿伦娜《现代人的处境》（1958）的一个节选段落	1.我们的生活是为了幸福吗? 2.艺术家是他作品的主宰吗? 3.解释勒内·笛卡尔《指导心灵的规则》（1628）的一个节选段落
2013	1.言语只是一种工具吗? 2.科学只局限于确定事实吗? 3.解释笛卡尔《致伊丽莎白的信》（1643）的一个节选段落	1.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是什么 2.人们是否因为认知缺陷而演绎解释 3.解释圣安塞尔姆《论和谐》的一个节选段落	1.人们是否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却按道义行事 2.行动是否有助于认识自我 3.解释柏格森《思想与运动》的一个节选段落

休闲时间为2.27小时，仅为美国、德国等国的一半（宋瑞，2018）。长期来看，个人目标越来越趋向于崇尚自我意识、个人兴趣的培养、个性潜能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对个人职业方向、个人时间的自由支配等，而这些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并不总能获得完全的协调一致。实际上，当传统线下教育面对学习者日趋多元、复杂的个人目标时，也遭遇着显而易见的困境。

心理学认为，个体不仅受适应环境的需要驱使，还由成长趋势或日益接近自我实现的趋势所激发，适应需要和成长需要并存在同一个体内（Jess, Feist, J. Feist, 2005）。也就是说，个体倾向于既满足自我成长需要，也能够适应环境的需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的短期目标可能并不关心个体是否具有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精神，包括是否满足教育家“有教养”的更高标准。然而，社会的长期目标必然不限于此。那些“有教养的人的重要品质”和社会的持续进步、社会的创新能力息息相关，显然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的长远目标是趋向一致的。

传统线下教育模式下，学习者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去掌握某个专门学科的知识或技能，这种教育模式难以同时满足个人与社会的短期和长远目标。在线教育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安排的、主动的“个人学习”包括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碎片化学习、混合式学习……，在线教育一直努力在改变传统线下教育的弊端。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在线教育能够充分协调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仅是教学习者赚钱和找个工作，而是超越个人短期的功利性目标，帮助学习者在逐渐发现自己、成熟自己、获得个人成功的同时去奉献社会，投身国家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建设。

三、在线教育的未来目标

（一）在线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完整的人”

在线教育不是一种预设了职业或技能目标的培训。在线教育的最终目标，应当致力于在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提供“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感性和理性协调均衡、具备参与复杂生活所需各种能力的“完整的人”。

首先，这个“完整的人”应当是具有心理成熟人格的个体。心理学一般认为，人格是指那些在个体身上使人的行为比较稳定的、相对持久的特质、倾向或特性模式。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的人格定义是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定义：“人格是个体内部那些决定具有个人特征的行为和思想的心身系统的动力结构。” 他认为，人格这个结构并非是一个静态结构，它还会不断生长或变化。奥尔波特创建的人格理论强调心理健康个体的独特性。1961年，奥尔波特确定了“心理成熟人格”的六个标准（见表2）。(Feist, J. & Feist, 2005)

表2 成熟人格的六个标准（经本文整理）

	成熟人格的六个标准
1	**自我感的扩展。**成熟的人不断寻求对自身以外事件的认同并参与这些事件，他们不仅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们能够参与解决一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或活动。奥尔波特认为，“每个人都自爱，但唯有自我扩展才是成熟的标志。”
2	**与他人热情交往的特征。**成熟的人尊重他人，能理解他人的需要，能感受他人的痛苦，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友爱关系并富有同情心
3	**情绪安宁或自我接纳。**成熟的个体情绪均衡，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不为生活挫折过分烦恼
4	**对环境的现实知觉。**成熟的人并没有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与世界保持联系，关心大多数人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5	**自知力和幽默感。**成熟的人了解自己，因此无须将自己的过失和弱点归咎他人。奥尔波特认为，自知力和幽默感是密切相关的。成熟的人能够察觉生活中不和谐的事，因此无须伪装或故作姿态
6	**统一的人生哲学。**心理健康的人有明确的人生目的。奥尔波特认为，具有成熟的宗教态度和统一的人生哲学会使人的良知达到完善的境界

按照奥尔波特提出的“心理成熟人格”标准，这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懂得合作、平等待人、富有同情心、情绪均衡、适应环境、精神独立、有自知力和幽默感、有明确人生目标”的心理成熟个体。显然，社会上的成年个体并非都能够满足这个标准。而人在主动适应生存环境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心理诉求，显然不能涵盖成熟人格的全部内容。这足以说明一些传统线下教育、职业培训机构所培养的“仅仅参与了职业和技能训练的人”，无法达到奥尔波特“心理成熟人格”的标准。而且，虽然健康的人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但年龄不是成熟的必要条件（Feist, Gregory, J.Feist, 2005）。不过，心理学向来认为，人在后天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的学习中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是人格内容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尔波特也认为人格的结构是动态的，它会随着人的后天学习不断生长或变化。这些观点都非常符合在线教育极力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学习者完全可以在在线教育提供的具备“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终身学习中去逐渐完善并获得成熟的人格。

其次，这个“完整的人”应该成为一个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辨识力、有良知、有担当的公民。为此，他需要具有参与社会所必备的综合性素质和能力。美国教育家玛莎·努斯鲍姆（2017）曾经提出，教育应当培养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公民。有批判力说明有个人的独立思维和思想，而广泛的批判意识来自于学习者辨识其他专业领域的能力；有想象力能够催生创新思维；而有同情心则是社会的道德要求，这些都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些对于人的综合素质、能力的要求和通识教育的目标是相通的。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提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①有效的思考能力（包括逻辑思考能力、关联性的思维、想象力）；②交流思想的能力（表达自己并被他人理解的能力）；③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将全部思想运用于经验领域的能力）；④辨别价值的能力（包括关于品格的价值，如公平竞争、勇气、自我控制、慈善、人性；智识方面的价值，如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成就的尊重等；还有审美价值，如高雅的审美品位和对美的鉴赏力）。“在实践中，它们是不可分的，也不能独立地培养。每一种都是心智正常的人的头脑不可或缺的功能。”（哈佛委员会，2010）

奥尔波特的“成熟人格”侧重人情感、心理层面的和谐健康，哈佛委员会的“四个能力”的要求则偏重人的理性、智力层面与社会的协调，这些从感性和理性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于个人品质的综合性要求，涵盖了“完整的人”的基本内涵。传统线下的专业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抓住了个体人生某一阶段部分实用的理性需要，忽视了个体在完整人生中涉及理性和感性层面的复杂诉求。即使在线教育十分活跃的成人教育领域，哈佛委员会也明确指出：尚未发现，成人仅仅只对或主要对他们能够在职业上获益的教育服务感兴趣（哈佛委员会，2010）。因此，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未来在线教育要借助科技的进步，创建能够促进人的理性和感性均衡发展的基于“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全民素质教育，帮助学习者树立终身学习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赋予未来教育新的内涵。

（二）在线教育的子目标：呵护社会的创新基因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前文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随着）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在技术方面的突破，技术前沿正在迅速拓展。同时，各种传感器产生的海量数据使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能力大幅提升。”（世界经济论坛，2017）面对未来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应该尽快发展那些机器和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天赋，而创新能力正是人类独有的天赋。

未来的在线教育，应当充分尊重人类个性，不遗余力地培育和发展每个学习者独一无二的创新思维能力。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从思维习惯的角度列出了几个创新特质：长于联想、勇于质疑、善于观察、注重搭建关系网并乐于尝试，这些人在把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的方面表现优异（刘洋，2015）。可见，创新思维既包含着逻辑、判断这些理性思维方式，也包含着情感、直觉、想象这些感性思维方式。可以说，创新思维正源自一个个理性和感性协调均衡、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在创新领域，一些线下传统精英类大学通过直接挑战学术领域的前沿问题，从而自然引发创新过程和创新成果，但这样的创新并不具备普遍性。而且，线下精英类教育显然花费了极高的前期成本去培养少量的创新人才，实际上减弱了教育的公平性。相比线下的传统精英教育，在线教育更具有普遍性、公平性。例如，美国谷歌公司和丹麦技术公司Labster合作，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R）已经建立了30多个虚拟实验室，以帮助大学提供在线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位。目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生物在线学位项目、德克萨斯大学以及北美和欧洲一些机构的学生已经可以在这些虚拟实验室进行无限制的科学实验（见图1）。谷歌

公司表示：希望为全球更多的学生带来虚拟实验室体验，包括研究生、本科生、高中生（映维网，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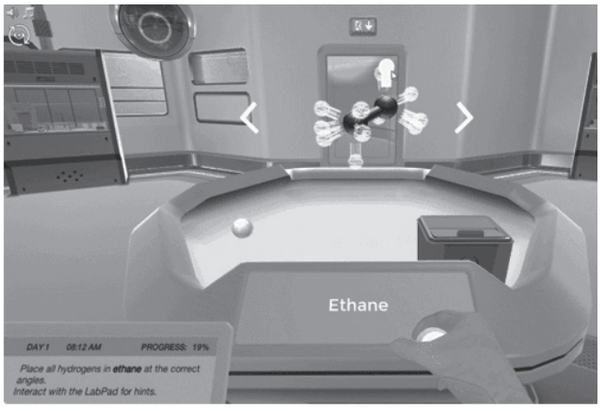

图1 Labster虚拟实验室

显然，在线教育正在积极利用新技术帮助教育实现成本更低、更广泛的知识实践。而通过鼓励在线学习者独立、深入的思考，引导他们的思想不断和外界发生碰撞，提升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线教育能在最大范围内为社会呵护创新的基因，培养学习者的创新思维，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更加广泛的基础。

此外，偏狭的专业教育会限制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转变人的兴趣，限制人类精神的自由性、丰富性和独特性，从根本上扼杀人类天赋的创造性。在线教育能够使学习者摆脱传统线下教育的时空羁绊，使他们更快进入较高层次的知识的广泛实践、跨学科领域中不同方法的学习以及尽可能多地参与各种创新性的思维活动。例如，哈佛大学就认为，比起各个学科的前沿知识，这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蒲实，2017）。芬兰教育委员会曾于2016年实施了“新课程改革”，其改革重点也是“跨学科学习”。其中一个改革的重点就是培养学习者的“横贯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s），横贯能力就是指贯穿于不同学科和领域所需要的通用知识和能力。而与“横贯能力”相关的“现象教学”是基于某种现象的教学，往往涉及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和技能（贾冬婷，2017）。密涅瓦大学校长维奇·钱德勒女士从事在线教育，她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成员（NSB），她认为“密涅瓦大学实行的是跨学科教学，在这里已经没有所谓的学科知识了，直接就是概念的运用和思维习惯的培养。我们培养的核心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马国川，2018）

未来中国在线教育参与培养创新人才，除了在培养学习者批判性思维、丰富他们的情感和想象力等方面应该有独特思路，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学习者在跨学科知识领域的“横贯能力”，培养他们掌握贯穿于不同学科和领域所需要的通用知识和能力，包括获取知识的不同方法、途径和知识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呵护社会的创新基因，培育学习者全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确保他们以创新的姿态游刃有余地应对社会的迅速变化。

（三）在线教育的子目标：提供开放而包容的教育服务

相比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有充分的技术条件去建立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教育模式。开放性的态度不仅仅意味着扩大平等入学的机会，也意味着多方面探索新型教育服务模式，同时也不忽视线下教育改革获得的成果；而包容则意味着一份宽容和关爱之心。

首先，未来的在线教育应当在确保学习者机会平等、便捷学习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满足他们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需要，从而帮助学习者发现自我，自由地去发展个性和才智。芬兰教育中有所谓“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即一种致力于容纳所有学生、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学习、满足他们不同需求的教育。“全纳教育”的教育者会采取包括小组补习、个人咨询、个人辅导、根据个人情况单独授课的方式，如果学生遭遇困难，还会专门针对该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贾冬婷，2017）。相比较芬兰建立的线下传统教育服务模式，在线教育更有技术条件建立一种兼具社会平等与包容的“在线全纳教育”。例如，芬兰学生在没有想好职业方向时，可以同时选择就读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在线教育能够以更有利于学习者的方式实现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学习。此外，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始终在强调“深层学习”。深层学习即学生通过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互相协作、自主学习，掌握学习内容（S·亚当斯贝克尔等，2017）。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在线教育面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需求时，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学习者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增强师生互动、提升教育效率等，参与并持续促进学习者的“深层学习”。而在线课程也始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MOOC的发展绝不是向更多的人分发相关的学习内容，而是学生作为一个个体，能够管理好自己所获得的学习内容，同时做好自我提升、自我转变。”（Downes，2017）在线教育还广泛与大学和企业合作，其“小型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完全基于小型的特定学生群体打造，参与SPOC实验的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先后取得了教

学的成功。“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全球校园”的微型SPOC实验，完全根据企业和学习者需求去设计课程。

此外，相比线下传统教育模式，未来在线教育能够以更包容的心态面对学习者完全不同的学习诉求，从而激发人的个性潜能、诱导人的创造力。英国开放大学一名热爱法语的学习者这样说道，“我一直很喜欢法国和说法语，当我在学校时，我是那么想成为法国人！……”可是（在传统大学）学习期间因为个人原因（事业、婚姻、生育）她不得已多次中断了学习。最终，英国开放大学以非常包容的心态，充分运用在线学习的优势，帮助她完成了近30年断断续续的学习，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学位。而另外一名在英国开放大学攻读人机交互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想关注和研究其他动物，并希望研究和建立人/动物与计算机交互技术。她后来感激地表示，“英国开放大学相信我要做的事情，他们甘愿冒险，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来开展这项研究，尽管它似乎显得有点过于激进。”（The Open University，2018）

未来在线教育理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胸探索各种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不断赋予学习者充分自由的学习选择权，不管他们是为了职业进步，还是纯粹的享受学习乐趣，或是怀有改变世界的梦想，都能以一份宽容和关爱之心回应他们的学习诉求，及时发现他们的学习困难及其相关的社会、行为问题，尽早提供个性化的专业协助。

四、结语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这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名言。显然，真正的“教育目标”不能仅仅从实用的、功利性的角度去考量，也无所谓线下教育和线上教育之分。很多传统线下教育和在线教育者都能够理解：职业只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学习者不仅仅需要一份成功的职业，他更期待一个丰富、完整而有意义的生活。学者李泽厚（2008）曾经指出，人类的理性和感性需要平衡。没有理性，人类无法生存；仅有理性，便成了机器人的世界。在线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必须远离以实用和功利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投入到以学习者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教育事业中。必须明确地告诉未来在线教育提供者：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是培养具备完善的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感性思维能力的、一个能够应对未来的变化、难以被任何机器或人工智能代替的真正的人。

参考文献

[1] 陈赛（2016）.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J]. 三联生活周刊，（45）：45-55.

[2] 弗兰克·H. T. 罗德斯（2007）.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 王晓阳，蓝劲松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40-44+117+129.

[3] 龚春燕，龚冷西（2014）. 创新教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

[4] 哈佛委员会（2010）.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 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0-57+202.

[5] Jess Feist, Gregory J. Feist,（2005）.人格理论[M]. 李茹，傅文清 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355-367.

[6] 贾冬婷（2017）. 不争第一的芬兰教育，少既是多[J]. 三联生活周刊，（40）：38-51.

[7] 李泽厚（2008）.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 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0-12.

[8] 刘洋（2015）. 他们改变中国[J]. 环球科学，（3）：35.

[9] 卢克·约翰逊（2013）. 职业可多向发展[EB/OL]. [2013-8-30].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258?ccode=2G130008.

[10] 马丁·布伯（2002）. 我与你[M]. 陈维钢 译.北京：三联书店：59-60+126.

[11] 马国川（2018）. 美国科学院院士钱德勒：大学教育需要被颠覆[EB/OL].[2018-6-18].http://www.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364906?source_id=40.

[12] 玛莎·努斯鲍姆（2017）. 功利教育批判[M].肖聿 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5.

[13] 蒲实，陈赛 等（2017）. 大学的精神[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36；238.

[14] 钱颖一（2016）.大学的改革（第一卷，学校篇）[M].北京：中信出版社：27-30.

[15] S·亚当斯贝克尔，M·卡明斯，A·戴维斯，A·弗里曼，C·霍尔给辛格，V·安娜塔娜额亚娣（2017）.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高等教育版[J]. 开放学习研究，（2）：1-20.

[16] 世界经济论坛（2017）. 2017~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文编译版）[EB/OL].[2018-1-29]. http://www.ccidwise.com/uploads/soft/160803/1-1P223114146.pdf.

[17] 宋瑞 主编（2018）. 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3.

[18] Stephen Downes.（2017）.在线学习[J].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11）：28.

[19] 王承旭，顾明远（2015）. 比较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27.

[20] 习近平（2013）.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N].光明日报，2013-09-27（01）.

（下转第62页）

【开放大学建设】

基于战略地图的我国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研究

孙　丹

（北京开放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2012年教育部先后批准6所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开放大学，我国开放大学面临着百端待举的局面。在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的历史时期，开放大学应明确其愿景，并构建可行性战略规划来谋划大学发展。本文基于开放大学特征，采用战略地图方法，从使命、相关利益者、内部层面、学习与成长层面四个方面构建了我国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明确了四个层面的逻辑关系，阐述了从“学习与成长层面”到“使命层面”的层层支持关系。通过细化四个层面的战略活动，研究力图找到开放大学战略规划中的关键行动和流程，阐述开放大学战略规划的保障措施，从而描述出开放大学如何创造价值并有效执行战略的过程。

【关键词】战略地图；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41-007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不再是开放大学的特权，各地区提供开放学习机会的机构日益增多，因此来自开放与远程教育机构的竞争以及传统大学网络教育的挑战愈演愈烈，许多开放大学已经面临生源下降的危机，如英国开放大学、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泰国苏可泰大学等。

国内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是国内开放大学的前身，广播电视大学经历了2012年、2013年招生规模的高峰期（闫小晖，2016），迅速进入招生规模的大幅下滑时期，广播电视大学需要做出战略改变和决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办好开放大学，是我国开放大学的重要历史开端。2012年，教育部先后批准更名6所开放大学，包括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广东开放大学与云南开放大学，形成了“5+1”开放大学新局面，此6所开放大学共同肩负着开放大学建设任务。至此，国家对于开放大学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清晰，但顶层设计需要落地，国内各个开放大学在战略规划和执行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制定开放大学战略，开放大学的战略该如何被更好地执行，成为开放大学建设的首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规划对开放大学以及网络教育机构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学战略是对大学未来发展长远性、全局性的谋划和方案，如果说战略是方向，那么战略规划则是实现战略的步骤。大学战略规划不仅是大学战略落地的重要手段，也对大学治理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能够为大学明确治理方向并提高大学治理效率（李福华，王颖，赵普光，2015）；大学的资源多以无形资产为主，有效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组织资源等无形资产的潜能；制定战略规划的过程需要考量各方利益群体，因此战略规划应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协商和沟通产生的共同智慧结晶，一个有效且适合的大学战略规划方案的产生往往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达成了一致，从而更为有效地保障组织

本文系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2016年度在线教育研究基金（全通教育）重点项目《开放大学在线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ZD105）。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7

未来的发展。

（一）国内外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往往缺乏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的确定过程

随着国内外开放大学的迅猛发展，众多知名开放大学纷纷公布了发展战略。英国开放大学（以下简称英开）于2004年6月发布了第一份战略规划《开放大学的未来——2004至2008年优先发展战略》（张美兰，2006），并于近几年发布了最新一版战略规划《The Open University Widening Access and Success Strategy 2012-2015》（The Open University，2012），在这个文件里英开确定了战略规划的原则、优先服务群体，确立了招生、学业完成、学生成就和学生满意度四个方面评价战略成功的指标，明确了从市场、非正式到正式学习、课程等十项战略规划步骤，并指明负责部门。阿萨巴斯卡大学作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开放大学，在其2016年至2019年的战略规划中从开放大学的学习便易性、质量、质量目标、优先措施、产出绩效以及评价等六个方面描述战略规划。日本放送大学发布的《行动计划2012》中明确了两大主要目标以及10个具体行动计划（刘志芳，2018）。国内开放大学会每五年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但是由于不公开发布很难获得。

观察众多开放大学的战略规划，可以发现战略的目标和战略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是战略规划的主体，但是并没有阐明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是如何确定的。

（二）开放大学战略制定方法缺乏共识，存在“理论黑箱”

大学战略规划的制定方法以及理论问题是高教研究领域的基础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大学发展战略的编制，并影响到大学未来的发展前途。但目前的研究现状并不乐观，典型表现为人们在大学战略理论上缺乏共识，关键是缺乏合理、清晰的分类标准，从而使其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理论黑箱”（解德渤，2016）。从大学战略规划的哲学探讨、核心理论到实践研究都非常少，开放大学战略规划的相关理论研究则更为稀缺，通过文献研究可知，多数开放大学战略规划还停留在解读政策文件的层面上，对于开放大学的战略规划全面系统的阐述几乎为零。基于开放大学的愿景、使命以及内外部环境分析，如何推导出3~5年的战略目标？如何确保战略的具体措施一定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战略目标以及战略实施方案是否是众多中层、基层管理者以及教师们的共识？没有共识的基础，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则很难协调一致，各级管理者也无法实施环境改变后的新战略。

二、基于战略地图构建开放大学战略规划的基础

（一）开放大学的特征及问题分析

大学作为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立大学，在战略规划上与企业有着很多不同，例如“松散的耦合结构”（Weick，1976），无秩序的结构（Cohen & March，1986），拒绝改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Gioia，Schultz，& Corley，2000）。开放大学还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开放大学从战略目标来看，多数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成功的定义并非是利润多少，而是使命是否实现

因此在企业战略规划设计中常以财务指标和企业规模为目标的规划思路无法移植至开放大学战略规划中。我国开放大学属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指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接受政府领导，表现形式为组织或机构的法人实体。由于这类组织往往是由政府委托建立的，因此政府（组织建立的受托人）与学习者（目标客户）层面界定了政府和学习者的价值主张，价值主张为无形资产创造价值提供了环境。

2.无形资产比重很大

开放大学的无形资产占比很大，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品牌、创新能力与文化等，真正能让开放大学完成目标是肯定不是学校占地规模、建筑规模等，而是学校的教学能力、学习者在完成学习后的知识转化能力以及受益学生的规模。因此，开放大学的无形资产的盘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3.开放大学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政府与学习者

开放大学是由国家设立的，在完成目标的同时，需要时刻考量“为了达成使命，我们需要满足政府什么样的价值主张”（罗伯特·卡普兰，大卫·诺顿，2005）；学习者的学业成就以及满意度是开放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考核指标，那么在制定战略规划时，需要时刻思考“为了达成使命，我们需要满足学习者什么样的价值主张”（罗伯特·卡普兰，大卫·诺顿，2005）。

4.开放大学的内部竞争力

开放大学的办学初衷是为了“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为了这个初衷，众多开放大学不仅开发了完整的网络教育方式，在线下也设置了多处学习中心，开放大学作为最早接触网络教育的机构，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网络

教育理论以及教学实践，这些无形资产附着在教学人员上，如何充分使用及开发无形资产的潜能值得每一所开放大学深思。

综上可知，开放大学战略制定和执行需要以完成使命为目标，并辅助考虑财务目标，同时需要清晰地说明无形资产的运用和协调。无形资产的价值取决于与战略的协调程度。如果内部流程不能以达成使命为向导，那么无形资产的潜在价值通常不能被实现。只有发挥无形资产的杠杆作用，才能实现持续性的价值创造。

（二）战略地图的应用

战略规划被认为是“致力于制定基础的决策方案，用于塑造和引导管理者思考组织（企业）是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Bryson，1988），也被认为是具有逻辑性、系统性、客观性的管理方法。但是在战略执行阶段，常常存在战略不能如预期执行，从而大大影响了战略规划的有效性。由于战略地图能规避以上问题，得到管理者的欢迎并大规模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中。

1.战略地图概述

战略地图可以通过建立目标、行动方案以及评价指标从而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产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地图不仅仅是一份可帮助相关利益者理解组织战略的战略规划的可视化展现，更是战略规划中四层面目标因果关系的地图，有助于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转变为更具协作性和民主性的组织。考虑到开放大学战略需要落地，需要发挥无形资产最大的潜能，倡导“如果你能衡量它，你就能管理它”的战略地图方法是最为适合的方法之一。战略地图方法的合理运用，可以使开放大学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定位、目标和可用资源，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应付和适应社会的外部变化。更重要的是，战略地图方法提供了一种更灵活和更具适应性的方法来跟随组织内外变化的情况，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动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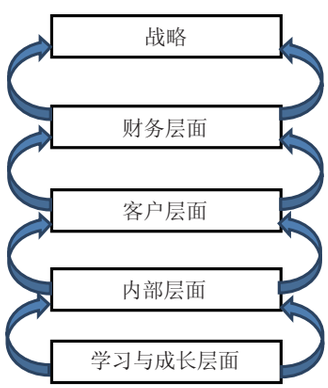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的战略地图框架图

战略地图是用来改善企业无形资产衡量、描述和实施组织战略的工具，它包含的四层面模型为管理团队提供了一种讨论战略方向和优先任务的语言，这四个方面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存在一系列因果关系。

战略地图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战略框架包括：财务业绩，即滞后指标，提供了组织成功的最终定义；客户层面，财务指标能否完成取决于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增长率，因此为了达成财务指标，需要优先完成客户层面的指标；内部层面，客户价值主张的完成率取决于内部流程的合理且必须，内部流程需要既满足达成客户主张的需要，又满足降低成本的要求，因此内部流程业绩时常领先于客户层面的指标；学习与成长层面，此层面从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组织资源角度描述支持内部层面，通过开发无形资产潜能达成战略。这四个层面构成基本的战略地图逻辑框架（见图1）。

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战略框架与企业类似，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成功的定义是实现使命的业绩，而非财务层面。因此，这些组织“达成使命”才能描述出战略的有形成果，显示出这类的战略成功与否。

2.绘制战略地图的要点

绘制战略地图首先通过组织的战略、愿景、使命，明确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层面、学习与成长层面的目标。之后通过四个层面的目标，制定相应的指标。最后基于企业战略的不同，确定各内部流程的优先任务，例如以创新为战略的组织优先将创新流程作为任务。战略地图绘制的难点和要点是对各层面细分指标的理解，以客户层面为例，客户管理可以分为四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流程：选择客户、获得客户、保留客户以及培育客户关系，这四个流程缺一不可。另一个要点是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层面、学习与成长层面的联系，如何通过设置下一层目标而达到上一层的目标是重中之重。

3.开放大学战略地图与企业战略地图的区别

因为开放大学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大学，因此在使用战略地图时，财务绩效不应该作为最终绩效考核指标，相对应的，应以满足政府与学习者主张为最终考核指标。因此，将企业的战略地图做适当调整以适应开放大学的战略地图。

在开放大学的战略地图中，应以满足政府、学习者两个层面价值主张作为最终绩效目标；然后，考虑组织需要擅长哪些业务流程才能达成上述层面绩效，此为内部层面；最后为了实现内部流程，需要思考哪些人力、技术与组织资源的支持匹配，此为学习与成长层面。

四个层面的目标通过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如图2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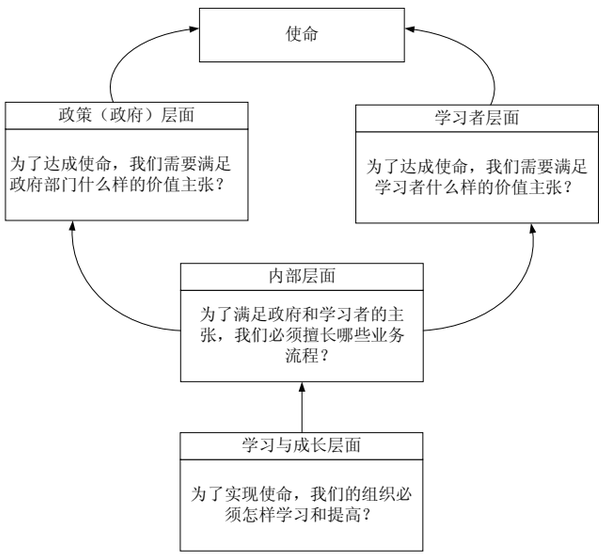

图2 战略地图描述开放大学如何创造价值

示，从顶部开始的假设是：只有政府部门和学习者满意了，使命才能实现，政府部门和学习者价值主张描述了如何创造来自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和学习者的忠诚度。内部流程创造并传送政府部门、学习者价值主张，然后，支持内部流程的无形资产为战略提供了基础，这四个层面目标的协调一致是价值创造的关键。连接四个层面的因果框架也是开发战略地图所依赖的结构，建立战略地图使开放大学明晰如何创造价值以及为谁创造价值。

三、开放大学发展战略地图的绘制

（一）开放大学战略地图的绘制原则

战略地图是战略全面系统的描述，并且是一种可视化语言的表达，在逻辑上，每个层面的目标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战略地图最终要为管理者与管理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沟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具备可执行、可定量考核等要素。因此在进行战略地图构建时，需要满足以下原则。

1.全面地描述战略

在时间上，需要衡量代表长期价值创造战略的关键因素，在空间上，需要全盘考虑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之间的协调合作。

2.构建可以评价的战略框架

战略地图的精髓是“如果你能衡量它，那么你就能管理它。”

3.构建细化、可执行的阶梯式战略目标体系

战略规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落地，细化且可执行的战略目标必然是阶梯式的战略目标体系。

4.平衡来自各种力量的矛盾

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内部存在着种种具有矛盾属性的力量。例如，在开放大学战略规划中，学习者满意度在短期里往往意味着考试容易及格，但这恰恰与学习者的另一个价值主张“学历学位具备更多的含金量”矛盾。在进行战略规划过程中，类似这种矛盾是规划的难点。

（二）开放大学战略地图的绘制流程

1.确定开放大学使命、设计开放大学目标系统

这需要战略研究人员在内外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弄清以下问题：学校的客户是谁？学校最主要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学习者对学校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学校的优势是什么？学校的劣势是什么？学校的价值观和使命是什么？政府部门对学校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学校的教师和员工对于学校的意义如何（大学是否把他们视为宝贵的财富）？在澄清了上述问题后，就可以进行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初步描述（张亚斌，韩瑞婷，2016）。为了明确以上问题，需要对相关政策、学校人员进行大量访问及调研，从而获得客观的答案。虽然我国开放大学面临的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趋同，但是由于各开放大学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并不一致，因此各开放大学的战略也并非一致。例如在我国，国家开放大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的，而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广东开放大学与云南开放大学则是在原来地方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的，前者还肩负带动全国广播电视教育系统的责任；北京开放大学和上海开放大学所在的城市均是人口超过2 000万的特大城市，江苏开放大学和广东开放大学所处的省份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省份，云南开放大学所处的云南省众所周知是具有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省份，也是唯一一个中西部试点院校。

2016年1月16日，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对办好开放大学提出指导意见》文件，明确了开放大学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初步建成，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更加成熟，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条件更加先进，学习制度更加灵活，办学体系不断完善，基本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学习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重要保障，并提出“明确功能定位，开放大学以终身教育思想为引领，努力办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由此可知，开放大学的功能为学习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考虑到我国的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只有42.7%[①]，开放大学所服务的学生应该是想接受高等教育但又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或是就业后想接受继续教育的人群，因此开放大学的使命可以表述为：向一切有能力、有意愿接受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服务。如《教育部对办好开放大学提出指导意见》所示，政府层面对开放大学的期待也非常清晰。从学生角度来看，希望学有所用以及社会承认学历是最为急迫的需求。那么为了达到政府以及学生的价值主张，开放大学需要在学习条件、学习制度、学习资源等方面做出努力。为了以上工作活动顺利开展，势必要对学校的管理能力、教学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与教学融合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具体的开放大学战略框架如下。

根据图3的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我们可以根据开放大学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框架的探讨。在相关利益者层面，政府对开放大学的期待是非常明确的，学习者对开放大学的期待可以做进一步分解：开放大学的学习者有两类，有学历需求的学习者和非学历需求的学习者。这两类学习者通常都是有工学矛盾、急需在职场提升的成人学习者。那么，为了满足其需求，开放大学势必需要提供多样化的入学机会、能够解决工学矛盾的学习方式以及贴近职业发展的高质量教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提高课程及格率与提高教育质量是具有天然矛盾的，这是开放大学战略规划面临的第一个矛盾，也是非常核心的矛盾。

针对不同的开放大学，日后可以继续做更为细化的思考——进一步确定优先业务。开放大学业务从学历角度区分，可以分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从中央和地方授权角度区分，可以分为国家开放大学业务与地方开放大学业务；从办学独立性角度区分，可以分为独立办学业务与合作办学业务；从教学方式角度区分，可以分为在线教学业务与混合式教学业务。在开放大学复杂多样的业务中结合学校的优势和劣势，挑选出优先发展的业务，从而在众多学生群体中确定优先群体，为满足学习者价值主张提供依据。

2.确定内部层面中的关键举措

针对已经明确的价值主张以及学习者群体，需要思考关注哪些关键举措，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需要将人力、物力、财力和关注力聚焦于关键举措上。开放大学战略的关键举措在本质上是对运营管理、学生关系管理、创新流程等细节的确定，这些举措能够保证实现政府和学习者的价值主张，但是并不是所有细节的管理都要关注，只需要关注能够影响结果的关键举措，因为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有所取舍。

通过四个内部流程中的关键举措实现政府与学习者的价值主张。因为对政府和学习者的价值主张有了清晰的蓝图，内部流程的目标即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主张。内部流程实现包括两个关键的战略要素：①它们向相关利益者生产和传递价值；②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流程并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将开放大学的内部流程分为四类：教学管理、学习者关系管理、创新教学活动、法规和社会流程。教学管理是核心的、实现相关利益者价值主张的流程，它包括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运营。学习者关系管理有助于加深与学习者的关系，从获得客户、保持客户与增长客户业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招生管理、学习过程关系维护、学习完成后关系管理。创新教学活动提供创新有效的教学管理模式、教学手段，是教学方式方法与时俱进的重要环节，可以分为：申请新专业、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内容创新。法规和社会流程有助于开放大学持续赢得经营的权利，保证校园环境便捷与安全，保证信息安全，是基本的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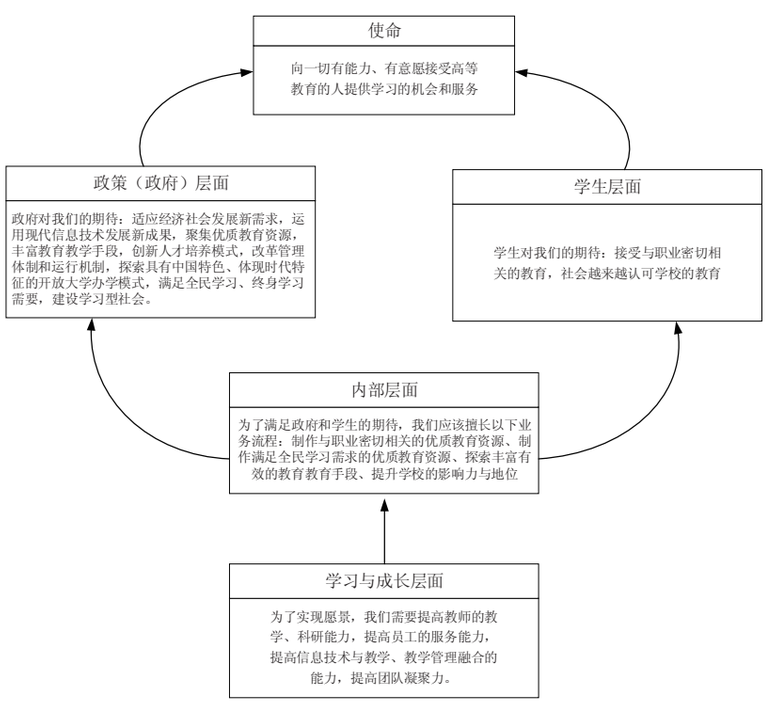

图3 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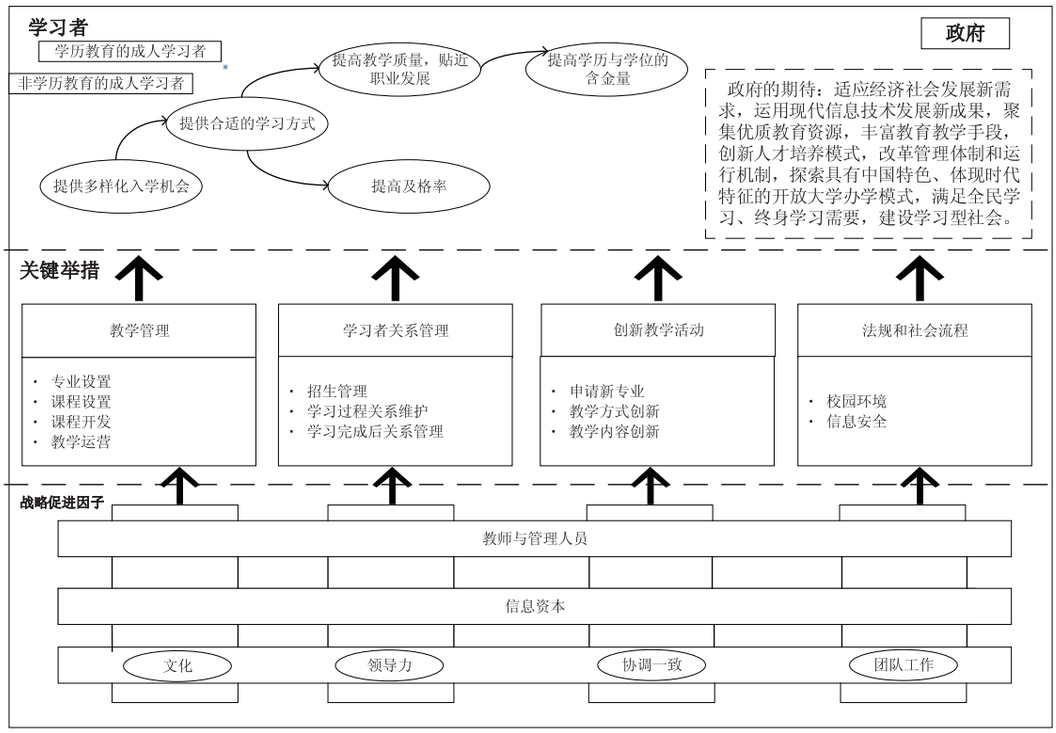

图4 开放大学战略规划细化框架

3.确定学习与成长层面的各项促进战略的因子

为了保障战略关键举措的实施，在组织的内部，需要从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组织资源三个方面给予支持，这三个方面有哪些关键的战略促进因子，需要及时地识别出来。

学习与成长层面描述了开放大学无形资产在战略中的作用，它们也是战略促进因子，可以分为三类：人力资本、信息资本和组织资本。通过战略地图识别战略规划实现所需要的特殊人力、信息和组织资本是关键所在，使无形资产与战略规划协调一致，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无形资产的效用。

4.进行财务预测和模拟，绘制战略地图

在实现开放大学使命，满足政府与学习者价值主张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财务目标，虽然开放大学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投入大于产出的管理行为同样不可取。

综上所述，结合开放大学的使命细化政府层面、学习者层面对开放大学的价值主张，从四个内部流程出发确定保障战略的关键举措，明确学习与成长层面的各项促进战略的因子，从而进一步细化了开放大学战略规划框架（见图4）。

四、开放大学战略规划的保障措施

（一）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战略制定的主体是领导层，领导层对战略的深刻认识才能带动全体人员为了达成目标协调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统筹，由学校领导指导统筹会更有效率地完成战略制定；战略的实施过程需要监督者以及评价者，综上可知，如果有学校领导带领的专门机构负责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将会对战略目标的达成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此专门机构需要根据各开放大学特点制定阶梯式战略框架，使战略目标能够分解成多个小目标；运用多种沟通方式加深基层员工对战略规划的认知，并积极思考在各自角色上的差异。

（二）关注内部流程在不同时期带来的不同业绩，均衡投入四组内部流程

在开发战略地图的内部层面时，管理者需要实行“平衡”战略并投资改善四组流程，这四组内部流程具有不同的时间周期，改善教学管理流程可以在短期获得业绩，改善学习者关系管理流程，可以在中期获得业绩，进行创新教学活动管理以及法规、社会流程，可以在长期获得业绩（见图5）。

（三）构建对应关键流程的行动计划

战略地图描述了战略的逻辑性，也显示了关键举措的内容以及支持关键举措所需的无形资产，但是这些目标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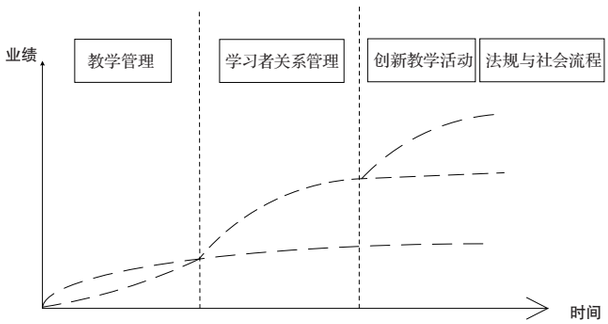

图5 内部流程在不同时间段传递价值

流程不会因为被确定就得以实现，开放大学必须推出一套行动计划，这套行动计划对应于每个需要关键流程，通过执行这套行动计划达到目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卡普兰，大卫·诺顿（2005）. 战略地图：化无形资产为有形成果[M]. 刘俊勇，孙薇 译. 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

[2] 李福华，王颖，赵普光（2015）. 论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J]. 高等教育研究，36（4）：27-32.

[3] 刘志芳（2018）. 世界开放大学发展战略比较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4）：15-21.

[4] 解德渤（2016）. 大学战略规划的基本理论范式[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3）：49-54.

[5] 闫小晖（2016）. 新常态下国家开放大学招生规模研究[J].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6（4）：1-4+106.

[6] 张美兰（2006）. 英国开放大学发展的战略关注——十项优先发展与十项战略风险［J］. 中国远程教育，（6）：73-77.

[7] 张亚斌，韩瑞婷（2016）. 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开放大学体系战略转型[J]. 开放学习研究，（3）：20-24+37.

[8] Bryson, J.M. (1988). A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for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Long Range Planning, 21(1): 73-81.

[9] Cohen, D.& March, G. (1986). Leadership and Ambiguity: 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J].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0] Gioia, D.A., Schultz, M., & Corley, K.G. (2000).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mage, and adaptive instabilit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1): 63-81.

[11] Han, S. & Zhong, Z. (2015). Strategy maps in university management[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43(6):939-953.

[12] The Open University (2012).The Open University Widening Access and Success Strategy 2012-2015[DB/OL]. www.open.ac.uk/about/wideningparticipation/sites/www.open.ac.uk.about.wideningparticipation/files/WideningAccessAndSuccessStrategy.pdf.

[13] Weick, K.E.(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1): 1-19.

作者简介

孙丹，硕士，北京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远程教育。

Research on Strategic Planning Framework of Open University in China Based on Strategy Map

SUN D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201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d the renaming of six open universities successively. Chinese open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a hundred things to be don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open universities and to construct a strategic plan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strategy map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framework of Chinese Open University from four aspects: mission, stakeholders, internal level, learning and growth level, clarifi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four levels, expounds the support relationship from the "learning and growth level" to the "mission level". Four levels of strategic activities are elaborated to find the key actions and processes in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Open University, and the safeguard measures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Open University are elaborated, thus describing how the Open University creates value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s the strategic process.

Keywords: strategy map; Open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 framework

【终身学习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

苑大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在世界范围内，老龄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人口的老龄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也开始关注和讨论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广泛需求，包括经济安全、健康保障、休闲娱乐等。具体到教育领域，开始关注到老年教育的内涵、发展路径以及如何提供更好的保障等。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老龄化也有不同的体验，随着老年人对工作和养育责任的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原先只想维持现有生活状态的老年人不再满足于现状，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终身的发展和丰富的生活。在此背景下，本专栏邀请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对各自语境的老年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介绍、解读与分析，希望能够对中国的老年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内涵及价值阐释

[澳]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Denise Reghenzani-Kearns）

（帕斯卡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协会，澳大利亚 VIC 3001）

张馨邈 译

【摘 要】社会应以何种方式保证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促进老年人保持自信、健康、思维活跃和较高的社会参与度，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一项非常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澳大利亚与世界各国研究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为各国制定老年教育政策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对老年教育及其价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重点分析澳大利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了解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观点和利益相关者对老年教育的期待，为政府制定并实施老年教育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研究者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老年教育对社会和个体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作用，政府在健康政策、护理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和提升。

【关键词】老年教育；澳大利亚；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48-008

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简称ABS）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7%，8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9%（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2；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5）。澳大利亚医疗及服务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简称AIH）测算未来10年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8

澳大利亚老龄人口将会显著增加。到2014年，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1%，2032年8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比2014年增加一倍（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2015）。基于此，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更加完善制度与政策，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社会福利，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使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身体，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然而，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活动导致老年人的个体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种种挑战，为了使老年人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并应对挑战，政策与制度需要不断地改进。相关研究证实，澳大利亚老年人退休后希望能够继续为家庭提供各种支持，继续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到终身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价值及作用。

一、老年教育及其价值：概念及依据

（一）老年教育[①]与“积极老龄化”

在南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研究报告《长寿革命》（The Longevity Revolution）中，学者Kalache对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老年人进行了研究，提出当务之急是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为老年人制定相关政策。同时，他首次提出“全龄型社会（Society for All Ages）”观念（Kalache，2013）。受此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和2007年分别制定城市和社区关爱老人政策框架及行动方案时，将“终身学习”与已有的“健康”“社会参与”“社会安全”三大支柱并列，作为“积极老龄化”的第四大支柱（见图1）。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终身学习、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安全都有最佳的机会来促进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Kalache，2013；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2015，p.8）。图1呈现的是积极老龄化的模型框架，表达了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概念的阐释。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联合国发布的一些报告中也有所体现（UNPF，2005；OECD，2007b）。很多社会组织也都自发积极地为老年人服务。例如，英国社会志愿组织的GO-Science项目，主张以一种策略性的、持续的、政府领导的方式为老年人服务，他们为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向老年人讲授心理健康知识。（GO-Science，2008）

图1 积极老龄化的模型框架

（二）老年教育价值的多面向阐释

1. 老年教育的基本准则

澳大利亚研究者Cuthill等人（2016）对大量老年教育相关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研究，确定了影响老年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Steinberg等人认为，制定老年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降低风险、构建身份资本和循序渐进的学习（Steinberg, Kearns, Reghenzani, & Peel，2007）。人一生之中（包括退休之后）的需求是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要认识到退休之后的老年人不但需要得到护理，还需要有学习的机会，从而使老年人能够提高社会参与度，继续为家庭做贡献并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制定老年教育政策和实施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

这些观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Biggs（2011）研究发现，人们对老年人抱有偏见，认为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继续工作。有些人认为老年医学教育价值在于使老年人自己照顾好自己，Findsen（2013）认为这一观点没有从社会整体结构角度去考虑。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老年人通过学习同样可以获得身心发展，这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老年终身教育价值所在而导致。Findsen提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对老年人进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要大力发展老年终身教育。

2. 老年学习的动机要素

Boulton-Lewis对澳大利亚老年学习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Boulton-Lewis和Buys共同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从以下几方面对老年人的学习动机进行了研究，包括①积极老龄化与学习；②参与/体验继续教育；③学习价值；④继续学习（或不继续学习）的原因；⑤学习兴趣、学习方式；⑥阻碍或促进学习的因素。该研究发现：

老年人通过接受再教育，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增长自我保健知识，提高社会参与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而快乐而充实地度过晚年生活（Boulton-Lewis & Buys，2015，p.763）。Boulton-Lewis与Buys认为一部分老年人进行再学习是带有目的的，另一部分老年人接受再教育只是为了自我实现和满足，是不带任何目的的学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张，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老年终身学习（OECD，2003，p.73）。这引发了老年终身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热潮。例如，学者Field研究发现，学习与健康、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教育可以使人们身心发生积极的变化。老年教育，价值在于从社会的、公民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多维度，从提高自我效能感、增

强社区参与度，使其安稳地过渡到老年生活 (Field, 2013, p.127) 。

Desjardin和Warnke研究发现 (2012) ，老年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满足老年人个人兴趣爱好的教育的缺失，是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减退及产生失落感的重要因素。Desjardin等人主张通过完善老年教育制度政策，使老年人获得满足个人兴趣爱好教育的机会，从而维持老人的认知能力。老年人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培训，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能够延缓认知能力水平的下降。

3. 老年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芬兰研究者Manninen和Meriläinen开展了一项名为“终身教育积极作用”（简称BeLL）的项目。研究者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来自十个欧洲国家的8 646名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占总被试数的40%）老年人进行了关于“丰富多样化成人教育的积极影响作用”的调查研究。调查发现：通过接受再教育，70%至80%的老年人提高了学习动机，增强了社会交往力，获得了幸福感，提高了生活满意度。数据分析发现，丰富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对老年人主要有10种积极的影响作用，而这也是影响其生活态度、生活质量、社会资本、健康、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键因素 (Manninen & Meriläinen, 2014, p.122) 。

研究还发现，成人的学习动机也与年龄有关。青年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比较具有功利性，主要是为了求职谋生，而老年人学习主要是为了适应退休之后的生活，减轻由于丧偶或朋友减少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以及保持生活技能等 (Manninen & Meriläinen, 2014, p.123) 。

伦敦学习效益研究中心从诸多方面证实了学习是影响人们幸福感、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举止的重要因素。Schuller等人认为，成人教育对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和规范重塑”以及“学习的革命性影响”的影响作用，体现出成人教育的价值所在 (Schuller, Preston, Hammond, Brassett-Grundy, & Bynner, 2004, p.182-191) 。

（三）老年教育的认知价值

研究者还从神经科学和神经功能角度出发，探讨了神经科学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了脑可塑性对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影响作用 (OECD, 2007a；OECD, 2007b) 。Reghenzani (2016) 在一项报告中概述了Coulson关于神经细胞重生的观点，认为神经细胞在神经细胞功能（如判断、计划）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重生 (Reghenzani, 2016) 。然而，在具有“多种刺激物”的环境（如保持精神活力、增加新经验、解决疑难问题）中，学习新技能可以提高记忆力。美国老龄化国家标准协会近期研究发现，人的认知能力受基因影响，而这些基因又受教育的影响。人类染色体的74个单独基因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些基因座与提高人们认知能力以及颅内容量，降低情绪的不稳定性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有关。

研究发现，人类寿命的长短也与接受的教育有关 (Olshansky et al., 2012；OECD, 2014) 。这一研究成果可能会引发老年教育与人类寿命相关性的研究。联合国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均主张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是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利。堪培拉大学曾对澳大利亚老年人的经济社会情况展开了调查，研究发现由于老年人普遍未能充分地享有社会物质资源、未能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和获得基本福利，他们（5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依靠通过接受再教育来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维持着健康的身体 (Maranti & Yu, 2011) 。

二、老年教育价值实现的策略及其障碍

教育对于老年人经济社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需要探讨教育，尤其是老年正规教育。以何种方式保证老年人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Cuthill等人 (2016) 认为需要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保证公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参与到多种社会活动之中，这也是公民平等地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和基本权利。这与Jackson提出的关注终身教育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Jackson认为老年教育是保证老年人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Jackson关于终身教育的核心观点在于，终身教育与社会公平相互影响，终身教育促进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促进了终身教育的发展 (Jackson, 2011, p.13) 。

（一）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机构行动策略

2015年和2016年，PASCAL[②]分别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举办了两届以老年教育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希望能够使各界人士形成老年教育领域的统一联盟。PSACAL组织的愿景之一在于提高公民社会参与度，促进学习型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普及终身教育，形成学习型社会。在这两届学术论坛中，来自社会各领域的与会者就老年教育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讨。本文在以下部分对会议中一些组织机构具有代表性的老年教育的政策文本、推进策略进行呈现。

1. 澳大利亚全国老年人产出性老龄化中心（National Seniors Productive Ageing Centre，NSPAC）

中心由澳大利亚国立老年协会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和社会福利部共同资助成立，中心愿景是通过政策措施，使社会各界全方位、多角度理解生产性老龄化，从而提高50岁及50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中心为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者与社区组织、政策决定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从而缩小各方的意见分歧。2015年该中心的一项研究——《活到老学到老：澳大利亚成人教育与培训》(Never Too Late To Learn: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mong mature age Australians)，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学习、教育和培训情况进行了调查，对劳动力市场中老年工作者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对于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终身教育是影响老年人能否实现自身价值并快乐地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这对于那些希望接受继续教育的50岁至59岁的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或培训背景的女性来讲尤为如此。Boulton-Lewis等人研究发现，自我怀疑、薄弱的教育背景是阻碍老年人学习的影响因素，对于年轻人、受教育情况较好的人来说，接受继续教育的障碍较少（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2015）。

2. 圣劳伦斯兄弟会

澳大利亚反贫困慈善机构圣劳伦斯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希望所获得的知识类型以及学习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澳大利亚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获取丰富的知识，自主掌控生活，但有趣的是，他们有时并不是为了学习而参加学习活动。这是因为，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如患病、行动不便、公共交通不便利等），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普遍较低，因此相比起提高自身知识技能、获取信息、积累知识，老年学习者更希望通过学习增加社会交往，提高社会参与度（Kimberley, Simons, & Wickramasinghe, 2015）。

3.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现已逐渐成为提供非正式学习机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维多利亚州，老年人是图书馆公共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借助于技术手段，老年人可以浏览电子文献，在图书馆提供的空间中进行交流、合作和学习。在2015年墨尔本的学术会议中，学者Sieamann对维多利亚州的图书馆在提供多样化课程、延伸社区服务、虚拟游客服务、培训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以上途径是实施终身教育的主要途径（Kimberley et al., 2015）。在2016年的布里斯班学术论坛上，Landmann描述了布里斯班市利用图书馆来普及老年教育的宏伟愿景，将图书馆作为社区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使老年人充分利用丰富的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交流、阅读、学习、工作和放松的机会。布里斯班市这一举措的终极目标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和便利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构建学习型社会（Reghenzani, 2016）。

4. 老年人技术提升项目（Tech Savvy Seniors）

该项目旨在提高老年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PASCAL的前两届学术论坛中，研究者都提到澳大利亚全国推行的“Telstra Connected Seniors”项目中图书馆所具有重要的价值。在2016年布里斯班学术论坛中，学者Robinson提出，信息技术在促进终身学习和在社会公平中发挥重要作用，老年人通过使用互联网可以提高社会参与度、获得更多的知识，因此，老年人迫切需要提高信息技术能力。这与Jackson关于终身学习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Reghenzani, 2015；Reghenzani, 2016）。

5. 学习共同体的参与

在澳大利亚，有一些自发的、自下而上形成的学习共同体，为老年教育提供了非常多的项目。例如第三年龄大学（U3A）和男士工坊（Men's Sheds）等组织，政府不对这些组织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学习共同体组织采用自营资助的方式运营，组织成员通过共享知识与技能而获得积极的发展。由于缺少政府财政资助，社区组织艰难地维持生存。其他一些社区组织代表者也在论坛中进行了汇报，他们主要对社区组织中老年人不能充分地获取学习资源以及如何吸引老年人加入社区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论述。Biesta认为，受经济、城市化等因素影响，政府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财政资助减少，当今社会衍生为一个“自营自助”的社会。老年人自己为老年教育买单便是其中一种表现。（Biesta, 2006；Reghenzani, 2015；Reghenzani, 2016）。

（二）老年教育阻碍的因素

很多澳大利亚终身教育研究者都非常注重终身教育实施中的与阻碍相关的研究。Boulton-Lewis等人提出了老年教育阻碍模型，该模型认为老年教育的阻碍主要有两大类——“结构化阻碍”和“个体/意向阻碍”。结构化阻碍主要与学费、教育活动的组织程序、课程不能满足老年人学习兴趣以及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等有关。个体/意向障碍主要指与自我认可度低、家庭责任、缺少学习时间以及身体限制等有关（Boulton-Lewis, Aird, & Buys, 2016）。亚洲传统文化中认为，女性应当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认为这是“孝道”的一种表现（Wang, 2013）。澳大利亚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国家，亚洲对女性的传统文化观点也对澳大利亚本国性别文化造成了影响。

（三）多元思考推进老年教育的理念

澳大利亚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促进了城市公平、经济发展和社区公众服务的完善。城市的政府当局通过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从整体上调动了终身学习提供者和参与者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使提供者和参与者积极地参与到终身学习中。终身学习是全方位的理念，从健康、安全、文化、生活、适应性、智力、知识基础、环保、创新等方面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学习是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是保证其他社会因素（如健康、安全、文化等）发挥最大价值的关键。学习是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学习可以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会提高老年人参与老年教育的积极性。从健康、安全、文化等多种社会组成要素角度出发，综合定义学习型城市概念也是儒家和谐思想的一种体现（Tam, 2012, p.163）。终身学习的目标在于

促进个体发展。为了使老年人身心得到积极发展，社会需要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值得更多学者参与讨论。[③]

三、老年教育价值未来发展的路径

2015年，欧盟委员会对成人和老年终身教育情况进行了整体调研，发布更新版的《欧盟成人教育议程》（European Commission，2015）。2015年版《欧盟成人教育议程》突出强调终身学习对经济发展和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作用。报告还重点论述了终身学习对所有年龄段学习者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力度紧密相关，即社会经济发展部分取决于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取政府免费（或半免费）提供的教育活动。为此，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European Commission，2015）。2015年，欧洲公民教育学会（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从社会平等角度出发，提出知识社会中终身学习终极目标是提高社会凝聚力和积极公民权、促进个体发展、提高幸福感，并且要以人性化和整体化的方式达成目标（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2015，p.8）。

（一）“积极老龄化”作为政府社会政策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认可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四大关键要素——终身学习、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安全，并将其作为制定老年教育相关政策的依据。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却严重不足，各州政府既没有为实施老年教育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制定充分的行动方案。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制定的终身学习和老年教育政策，与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强调了终身学习和老年学习对员工工作效率、个体发展和幸福感的重要影响作用。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已认识到本国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同时很多重要的组织机构（如澳大利亚老年学会、澳大利亚老年委员会）也倡导“政府要高度关注老年人”，为此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岛、昆士兰州等州的州政府为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而制定了很多社会政策。

澳大利亚的州政府对老年教育有所关注，并且认识到老年教育也是公民参与权的一种体现，但是政府这种认识并不深刻全面。昆士兰州公共和私立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社区组织和机构曾共同资助建立了成人社区教育服务体系，为老年教育提供了充分的服务。然而，这一教育服务体系不再为老年人开设基本的读写课程，转而开设私人订制课程、商业课程。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很少专为老年教育提供专门服务。

（二）“老年友好型城市”：老年教育价值的更高目标

澳大利亚部分州政府制定行动方案来支持和推进老年教育，并提出“老年友好型城市”政策。昆士兰州老年人办公室根据民意调查结果，于2016年颁布了《昆士兰州：老年友好型城市行动方针》，这一行动方针将老年人户外空间、交通、住房和社会参与作为四个优先重点建设的领域。然而，该行动方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将农村排除在外，二是终身教育的目标仅局限于提高公民参与度和就业率上。多数老年人希望可以继续工作、学习、掌握新技能、做志愿服务。终身学习可以使老年人不断地更新知识技能。

昆士兰州2016年颁布的《昆士兰州：老年友好型城市政策方针及实施计划》中，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八大关键要素纳入其中，作为重点建设领域。这些领域是交通、户外空间、住房、社会尊重和社会融入、社会参与、交流与信息获取、公民参与权及就业机会、社区支持及健康服务。昆士兰州在未来4年将投入830万美金用于实施上述行动方针和《政策方针和实施计划》，其中300万美金投资于《促进昆士兰州发展》项目。另外，昆士兰州的地方委员会与社会组织机构共同合作实施老年友好型城市项目，昆士兰州对此也会进行财政资助。昆士兰州还对老年服务支持体系进行资金资助。[④]

维多利亚州老年委员会于2016年发布了《老龄化与人人息息相关：维多利亚老年人孤独感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提出，孤独是维多利亚老年人面临的首要严重问题，孤独感困扰着近10%的老年人。维多利亚州老年委员会部长宣称，老年委员会将设立老年生活规划部门，这个部门将为老年人规划开办各种老年活动。同时老年委员会将在未来四年投入220万美金用于维多利亚州委员会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项目。

维多利亚老年委员会部长提到，政府的愿景……意味着建立学习型社会，并且为每位公民都提供接受优质终身教育的机会；意味着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源，其中包括发挥老年人的价值……”（Commissioner for Senior Victorians，2016）。

（三）老年教育价值与资源整合的未来挑战

国家政府机构、州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在实施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新政策时会遇到诸多困难，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2009年，Schuller和Watson在《探索终身学习未来》中提出，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终身学习概念化和资源重新分配问题。Schuller和Watson（2009）根据年龄段，将终身学习分为四个阶段，并且提出为了增加教育培训机会需要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人到了75周岁便进入了终身学习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同样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Schuller和Watson意识到了老年教育的关键问题——重新定义学习的概念和资源重新分配问题。然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并

且对于政府来讲这些建议未免过于激进。

Steinberg等人 (2007) 研究发现，制定和整合终身教育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两点，一是各级政府所实施的终身教育政策不具有一致性，二是在于各级政府对终身教育的概念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他们提议，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国家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终身教育政策要具有层级递进性和一致性，同时各级政府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共同配合实施终身教育政策，从而充分发挥终身教育对于社会和个体的积极影响作用。各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在以下各方面相互配合。

- 通过共同制定政策来消除对不同概念的误解。
- 通过共同制定成人教育政策（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来强调成人教育对成人兼职工作的重要作用。
- 共同认识到成人非正式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 重视人们不同人生经历的价值。

Steinberg等人 (2007) 还提议政府对终身学习的资助方式需要改变。他们提出，为了整合终身教育政策，各政府部门需要采用激励机制和协同资助方式共同资助终身教育活动 (如共同制定资助计划、减税、集中资源、提供补贴和补助、举办慈善活动等) 。

2015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深入探讨分析了未来经济变化给教育系统带来的挑战。分析发现，随着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澳大利亚将会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预计在未来的10到20年间，40%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所替代。因此，人们必须要不断地参加职业培训，掌握最新的工作技能。在老年化和学习方面，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最关心的是非正式学习、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和退休金问题。但委员会并没有提到终身教育对于社会和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就业市场未来会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就业市场将会以扩大生产率为导向，并且将向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环境也将会发生变化，5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会希望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意识到终身学习对于社会及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能够使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商业经济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

四、结语：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在最近发布的《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中提出，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缺少实施成人教育的协同一致性，导致成人教育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提高公民 (包括老年人) 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报告提出为了更好地实施成人教育，各政府部门之间需要积极配合。学者Istance也提出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各政府部门要协同实施老年教育政策，他提出终身教育与积极老龄化紧密相关 (Delors， 1996；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2016；Istance，2016, p.23) 。

学者Peter Kearns在PASCAL学术论坛会上提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四大关键要素 (健康、社会参与、社会安全和终身学习) 是加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关键所在。PASCAL学术论坛闭幕会上，研究者整合出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的模型框架 (见图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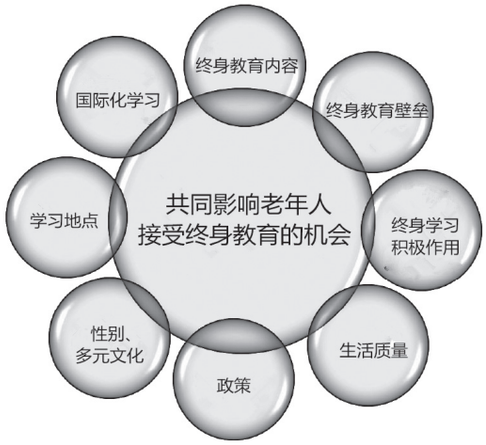

图2 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的模型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于，为了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促进老年人认知发展，政府需要激励老年人参与终身教育活动。为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需要通力协作，共同一致地制定并实施健康政策、积极老龄化政策、终身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保证老年终身教育政策有效实施、促进老年人发展的中坚力量。

注释

①译者注：在原文中作者使用的Learning in Later Life这一术语，均译为老年教育。

②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关注终身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学术平台。成员有来自政府机构、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企业的研究者、政策分析者、政策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组织旨在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空间，网址www.pascalobservatory.org。

③ 详见其他有关学习型社会资源参阅网站 http://pie.pascalobservatory.org及http://learningcities.uil.unesco.org.

④具体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获取：https://www.communities.qld.gov.au/communityservices/seniors/queensland-an-age-friendly-community.

参考文献

[1]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Older Australians at a Glance (4th Edition): Supplementary tables[J/OL].[2016-05-15]. http://www.aihw.gov.au/ publication-detail/?id=6442468045&tab=2.

[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Population by Age and Sex, Australia, States and Territories. [J/OL].[2016-05-15].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0/1CD2B1952AFC5E7ACA257298000F2E76?.

[3]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 [J/OL].[2016-05-15]. http:// www.aihw.gov.a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60129555153.

[4] Biesta, G. (2006). What's the point of lifelong learning if lifelong learning has no point? On the democratic deficit of polic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J].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3 & 4):169-180.

[5] Biggs, S. (2011). Toward critical narrativity: Stories of aging in contemporary social policy[J].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5: 303-316.

[6] Boulton-Lewis, G.M. & Buys, L. (2015). Learning choices, older Australians and active ageing[J].Educational Gerontology, 41(11):757-766.

[7] Boulton-Lewis, G.M., Aird, R. & Buys, L. (2016) . Older Australians: Structural barriers to learning in later life[J]. Current Ageing Science, 9(3):188-195.

[8] Commissioner for Senior Victorians(2016). Ageing is Everyone's Business: A report on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senior Victorians[R].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

[9] Cuthill, M., Buys, L., Wilson, B., Kimberley, H., Reghenzani, D., Kearns, P., Thompson, S., Golding, B., Root, J., & Weston, R. (2016). Conceptualising ageing and learning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vidence base for informed and equitable policy[J]. Journal of Aging Science: 9.

[10] Delors, J. (Chair).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M]. Paris: UNESCO.

[11] Desjardins, R. &Warnke, A.J.(2012). Ageing and Skill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kill gain and skill loss over the lifespan and over time-OECD Working Paper No. 72. [J/OL].[2016-08-29].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 ocumentpdf/?cote=EDU/WKP(2012)9&docLanguage=En.

[12] Dunn, J.R. (2008). 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Making the most of ourselves in the 21st century[R]. London: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13] 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 (2015). Manifesto Building the Future of Learning in Europe: Lifelong Learning Platform[M]. Brussels: European Union:8.

[1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dult Learning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Europe[R]. Luxembourg.

[15] Field, J. (2013). Learn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Towards a virtuous cycle. Conference Precedings – Cities Learning Togethe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learning city[M]. Hong Kong:127.

[16] Findsen, B. (2013). Learning in Later Life: Issues and Education Responses.In C.J. Boden-McGill & K.P. King (Eds.)[J].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Adult Learners: 119-131.

[17] Hinton, C.& Chisea, B. D.(2007).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The birth of a learning science[M]. Paris: OECD.

[18] Istance, D. (2016).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J]. ASE Magazine, (7):22-23.

[19] Jackson, S. (Ed.). (2011). Lifelong Learning and Social Justice: Communities, work and identities in a globalisedworld[M]. Leicester: NIACE:13.

[20] Kalache, A. (2013).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 Creating a society for all ages[M].Adelaide: 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21] Kimberley, H. Simons, B. &Wickramasinghe, S. (2015). Generating Knowhow in Later Life[R].Fitzroy: 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

[22] Manninen, I. &MeriläManninen, M. (2014). Benefits of Lifelong Learning: BeLL Survey Results[R]. Brussels: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European Commission :122-123.

[23] Maranti, R. & Yu.(2011). Persist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among older people in Australia: What are the protecting factors? — NATSEM Working Paper 11/11. [J/OL]. [2016-08-8] http://www.natsem.canberra.edu.au/ storage/WP11%20Final. pdf.

[24]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2015)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mong mature age Australians[R]. Melbourne: National Seniors Productive Ageing Centre.

[25] OECD (2014). Society at a Glance[M]. Paris: OECD.

[26] Olshansky, S.J. et al. (2012).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Due to Race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are Widening, and Many May not Catch Up[J]. Health Affairs, 31 (8): 1803-1813.

[27] Pont, B., Sonnet, A., Werquin, P. et al.(2003). Beyond Rhetoric: Adult Learn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J]. Paris: OECD: 249.

[28] Portal, R. (2015).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in response to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M]. Brazil: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Brazil: 8.

[29] Reghenzani, D. (Ed.).(2015). Seniors as Lifelong

Learners. [J/OL].[2016-05-19] http://pascalobservatory.org/pascalnow/pascal-activities/news/pascal-inclusion-workshop-seniors-lifelong-learners-barriers-strate.

[30] Reghenzani, D. (Ed.).(2016). Seniors as Lifelong Learners. [J/OL].[2016-05-19]https://www.u3aonline.org.au/sites/default/files/inclusion_pascal-ace-library_symposium_brisbane_report.pdf .

[31] Schuller, T. (2007).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Outcomes of Learning [M]. Paris: OECD.

[32] Schuller, T., Preston, J., Hammond, C., Brassett-Grundy, A. &Bynner, J. (2004). The Benefits of Learning: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health, family life and social capital[M]. London: Routledge Falmer:182-191.

[33] Schuller, T. & Watson, D. (2009). Learning through Life: Inquiry into the Future for Lifelong Learning[M]. Leicester: NIACE:182-191.

[34] Steinberg, M. A., Kearns, P.B., Reghenzani, D. M. and Peel, N.M. (2007). Harnessing the New Demographic: Adult and community learning in older populations. [J/OL].[2015-09-29]. http://pascalobservatory.org/pascalnow/pascal-activities/news/harnessing-new-demographic-adult-and-community-learning-older-popul.

[35] Tam, M. (2012).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 Elder learning in Hong Kong.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M]. Dordrecht: Springer:163.

[36]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6). 3rd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employment and the labour market; and social, civic and community life. [J/OL].[2016-10-03]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59/245917e.pdf.

[37]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5) .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J/OL]. [2016-05-22]http://www.unfpa.org/resources/human-rights-principles.

[38] Wang, C-F. (2013). A Different Way for Women to Cope with the Ageing Society: Post-formal thinking approach[C]. Conference Precedings – Cities Learning Togethe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learning city. Hong Kong: 18-20 November 2013.

[3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J/OL]. [2016-05-16].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Global_age friendly cities_Guide_English.pdf._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215/1/WHO_NMH_NPH_02.8.pdf.

作者简介

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Denise Reghenzani-Kearns），博士，澳大利亚学者，帕斯卡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协会（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成员，在澳大利亚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澳大利亚多个社区教育NGO组织合作推进社区终身教育与老年教育工作。

译者简介

张馨邈，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线教育中心考试专员。

Wider Benefits of Seniors' Learning: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Denise Reghenzani-Kearns

(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VIC 3001, Australia)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at an age-friendly society needs to do ensure quality of later life for seniors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learn and, through learning, to retain confidence, good health, active minds, sociability, empowerment and engagement as they age.There are many studies available in Australia and world-wide to provide an evidenced-based approach to policy and provision concerning learning in later lif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nd its benefits but focuses particularly on Australian material, some of it not well-known. It identifies a spectrum of proposals drawn from current studies that draw together key ideas and stakeholder aspirations to create a platform for future strategies. The overall argument is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do not recognise sufficiently the wider benefits of learning for seniors and that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for seniors are not adequately integrated.

Keywords: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ustralia; educational value

【终身学习研究】

新西兰老年教育：现状与政策概览

[新西兰]布莱恩·芬德森（Brian Findsen）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教育学院，新西兰 汉密尔顿 3240）

吴亚婕 苑大勇 编译

【摘 要】随着新西兰人口日益老龄化，老年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新西兰老年教育普遍采用非正规学习的方式，其终身学习的目的具有多样化、普及性等特点。大多终身学习研究都是围绕推进经济发展、促进个人发展、培养积极的公民、提升社会的包容性等方面开展。新西兰的高等教育机构、成人与社区教育机构以及工作场所都参与开展老年教育，老年教育体现出多层次性。此外，基金会等组织也扮演着重要的政策推进角色，积极老龄化成为政策重点。

【关键词】新西兰；老年教育；积极老龄化；政策概览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5-0056-007

新西兰是南太平洋上的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人口相对较少，仅有430万，但国土面积却与英国相当。在早期欧洲历史中，新西兰扮演英国粮仓的角色，一直是重要的农业国家。后来，新西兰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多样化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市场。数据显示，随着亚洲（主要是中国和韩国）人口比例的增长，新西兰种族构成日益多样化，这反映出大量外来移民涌入新西兰。在年龄结构上，总体趋势是人口日益老龄化（65岁以上人群2001年是12.1%；2013年占14.3%），而毛利族和太平洋人口族群却明显趋于年轻化（Statistics New Zealand，2013）。

在社会文化领域，新西兰是一个二元文化国家。1840年英国王室和当地部落签订《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条约确定毛利人作为土地的主人，为他们赋予了国民身份，新西兰国家保护毛利族的语言和文化，毛利人以伙伴关系全面进行社会参与，教育领域亦如此。

一、新西兰的老年教育发展现状

（一）老年的内涵

“谁是老年人？”这个常见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却不常见。将实际年龄作为“老年”划分标志是比较肤浅的，也是不准确的（Phillipson，1998），其他的解释同样缺乏价值。考虑到老化过程中不同人之间的主要差异（如生理、认知、社会）以及不同文化对“老龄化”不同的解释，从法律定义上解释“老年”更为常见，并且或经常与人们生命周期经历的关键转变联系在一起。因此，老年期可能与“退休”或政府发放养老金的时机有关。在新西兰，不论个人经济状况如何，政府养老金在公民65岁时发放，男性与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一样。这反映了新西兰在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的历史沿革。然而，社会中年龄歧视和虐待老人的现象依然存在（Age Concern New Zealand，2011，2012）。

（二）老年人群体的现状

由于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政府的经济变革，近些年全球金融领域的崩溃，贫富差距拉大成为普遍现象，这种差距对老年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5岁以上的人需要经济自足。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养老金不足以作为消除贫困的保证，迫使年龄更大的老年人继续工作，要么兼职或临时，要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寻求新的工作角色。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5.009

2013年新西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3年，22.1%的65岁及以上的人仍在工作（2001年为11.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必将持续挑战“老一代”公民，并显著改变他们的生活，但也要认识到“新的老公民”将更多技术经验和经历带入工作场所，家庭中也有一些乐观的事情在变化。这样的社会变革不断推进，即使政府不是热情支持者，终身学习的需求也在持续推进。

（三）终身学习视角下的老年教育发展

正如学者Withnall（2010）所指出的，深刻题解“学习”与“教育”的内涵并进行区分非常必要。“学习”活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等所有情景（Jarvis，1985），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并付出相当全面的努力。而“教育”通常是系统化、结构化，并且成绩需要得到认证。本文讨论新西兰教育中老年人参与度，他们较为普遍的学习模式是通过非正规学习（有时是有组织的学习），比如为社会机构培训志愿者，或者非正式背景下家庭的休闲活动（McGivney，1999）。终身学习的目的具有多样化、普及性等特点，大多终身学习研究围绕以下四个方面：①推进经济发展；②促进个人发展；③培养积极的公民；④提升社会包容性（Findsen & Formosa，2011；Wain，2004）。在新西兰社会中，终身学习影响经济推进、个人发展、积极公民和社会包容这四个主题，但对老年人的影响力方面差异较大。

1.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

许多“年轻的老年人”，例如“婴儿潮一代”出生的群体进入老年阶段，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准备十分不充分。通常他们夹在更为年迈父母与他们的子女、孙辈之间，因此经济压力较大。毛利人和太平洋人民的群体，尤其是来自人口大家庭以及预期寿命不足等人群（Statistics New Zealand，2013），他们常常面临生活拮据的问题。因此，在主流教育体系中，他们正式学习的机会极其有限。

2.老年群体的个人发展

新西兰主要是通过正规教育以及正式、非正式等形式实现老年教育。其中，第三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U3A）运动是典型的非正式老年教育形式。正如学者Swindell（1999）所述，第三龄大学是以欧洲人的中产阶级为主体，以自助式、参与式为教学形式的老年教育机构。在这种模式下，参与者在社区中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加以实践（Wenger，1999）。U3A是一种老年通识教育项目的优秀案例，从技术上来说，面向所有老年人开放，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只能限于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人群。

3.促进公民发展的角度

老年人学习机会再次出现在非正规学习领域。在许多社会和休闲活动中新西兰老年人都是热心志愿者（Golding，2012），相关机构和组织也在不断吸引老年人参与其中。鉴于社会公正伦理力量，老年人是社会活动（与环境、宗教、工作相关）中的一员，他们有权利接受大众教育，学习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内容。

4.社会包容贯穿于正规学习（包括成人教育）和非正式情境之间

毛利人和太平洋人被高等教育委员会（TEC）确定为“优先群体”，提供许多教育项目用于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问题。其中一个案例是“部落元老（毛利语kaumatua，毛利人长老）”教育计划，一个由毛利人实施的参与式教育范例（Walker，1990）。

二、新西兰的老年教育机构发展特点

（一）新西兰老年教育结构与类型

尽管新西兰的成人教育领域与英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特点，反映了大洋洲地区的独特之处。Findsen（2005，p.84）研究认为，新西兰提供老年教育的机构主体很多元，课程也很多样，老年人可以自主安排同步学习（例如U3A）；有专为老年人开发的、精准定位的老年教育项目（例如旅行和学习）；主流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成人教育课程（例如普通高中提供的成人及社区教育课程）。然而这些课程都未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也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老年教育的重要性。这些组织并未将这类课程的教育功能作为其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课程首要目的是实现社会服务的其他目标，甚至只是作为照顾老年人的一种工具。其中一些机构属于教育行业，例如农村教育活动项目（Ru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Programmes，REAPs），也包括行业以外的其他公司，例如“关注长者”的慈善机构等。因此，部分教育是由老年人自行组织并参与其中，也有些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根据Dakin（1992）的观点，新西兰的成人教育结构和过程可依据衍生（Derivative）和本土（Indigenous）来划分。衍生类型便是“借用”海外模式，将其修改并迁移到当地情境中。因此，新西兰的早期成人教育反映了主流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精神，殖民为其主要机制。因为成人教育机构倾向于满足欧裔新西兰人（Pakeha）的需求。从大学继续教育中心也能看出，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特别是妇女一直是中产阶级的忠实追随者。但不幸的是，新西兰政府近年来不重视成人教育，逐渐缩减了新西兰八所大学的成人教育经费，并在2011年削减了所有大学的成人和社区教育经费。在此之前，政府在2010年削减了80%的学校社区教育经费。从历史上看，经费资助开发的项目都受到了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的青睐。

（二）新西兰老年教育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

在Dakin的分析中，尽管他承认成人教育的重要性，但却很少讨论体现新西兰文化特质的本土化。近几十年来毛利人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毛利人的部落中，民族自治一直是这个国家社会和教育政策推进的重要元素，与《怀唐伊条约》所规定的原则有关。早在白种人帝国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毛利人的传统知识和学习就强调全方位学习是他们部落系统的基本概念（Bishop & Glynn, 2003）。毛利人社区中有一种独特的正规设施，称为“毛利会堂”（Marae），它包括了会议室、宗教场所以及娱乐设施的社区公共场所（Metge, 1984）。

（三）新西兰毛利人的跨代际教育

上世纪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随着毛利语使用的减少，毛利人感受到了危机，通过最初建立用毛利语授课的幼儿园、后来成立贯穿生命历程的其他教育机构来重建他们的主权。在毛利语授课幼儿园中，老年人（Kaumatua）在学前教育环境中充当孩子们的教师，扮演教会他们社会交往的主要角色。1990~2010年间义务教育阶段，三所高等教育学校成立之后，毛利人建立了（基于教授毛利语及毛利文化）毛利语小学（Kura Kaupapa Māori），关注各自毛利部落的利益和发展。实际上，毛利人设立了正规教育计划以便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可以参加。据新西兰高等教育委员会统计，那些毛利大学已经吸引了许多成熟年龄的学生，其中一部分按年龄划分可以归为老年人群体（Ministry of Education，2007）。

三、新西兰老年教育的执行机构及特点

（一）高等教育机构在老年教育中的角色

1.新西兰的高等教育特色

新西兰的高等教育体系较为独特，因为它在后义务教育阶段涵盖了许多的正式（以及一些非正式）教育提供者。除了大学以外，一些高等教育机构隶属于高等教育委员会管辖范围，接受其资助和监督，向其咨询高等教育优先事项和政策（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2010，p.11）。高等教育部门也包含基本读写能力的教育（作为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在职和全日制学习、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和博士研究。在大学和职业学院（Polytechnics）实行开放入学（Open Entry）之后，许多“成年学生”（TEC定义为25岁以上）都在职接受教育。

2.大学中老年学生的现状

根据新西兰教育部的统计，超过40岁的成年学生被称为“老年学生”（Older Students）。统计数据还显示，所有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学生中超过30%的人被列为“老年学生”（MoE, 2006, p.1），近8%的40岁以上的新西兰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且大部分学生的目的是为获得第二学位（Sub-degree）证书以及资格证书。老年学生参与高等教育有以下趋势和特点（Scott, 2010）。

- 2006年时，约一半（48%）年龄在25岁至64岁之间的新西兰人参与不同形式的学习项目；
- 参与非正式学习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 参与正式学习项目学员的年龄与参与率成反比，年龄越大参与正式教育项目的人越少，参与非正式学习的人群中，45~54岁年龄段人最多；
- 已就业成年人比未就业的人群更不愿意接受正式的学习项目；
- 2006年，77%参与非正式学习的成人是出于工作原因（Scott，2010，p.1）。

这些调查结果与国际老年教育的模式研究结果相一致（Thomas，2001；Tuckett & McAulay，2005；Oduaran & Bhola，2006）。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因职业原因接受教育或培训（例如，坚持做一份工作要面对更年轻、更多合格候选人的压力；为新的或重返职场做准备），此趋势证明了一个观点，老年人接受教育并不是完全由于自我价值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活压力所致。以上的这些信息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的“老当益壮群体”更具期待。

事实上，确有一些60岁老年学生已经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无论是高等教育委员会还是教育部都不愿意统计这些老年学生数据，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群体规模很小，主要集中在非职业教育领域。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因为在更广泛的高等教育领域有许多提供老年教育的机构，包括：8所大学；20所理工学院；几百家私人培训机构（例如语言学校，商业、酒店和旅游）；38家行业培训机构（如汽车行业、乳制品行业）；3家毛利大学（主要位于北岛）；学校支持成人与社区教育（ACE）、基础研究、青年培训、工作场所扫盲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包括新西兰扫盲（Literacy Aotearoa）、新西兰儿童游戏中心联合会（NZ Playcentre Federation）和英语课程家庭教师计划（ESOL Home Tutor Schemes）。由于这些是高等教育委员会管辖范围，他们也得到了公共资金的大力支持。

3.新西兰大学中老年教育的地位

从政治上来说，新西兰的成人教育一直在努力保障其地位，作为正规教育的可靠替代形式。从历史上看，成人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形式分散、缺乏集体愿景、缺乏领导能力（Benseman, Findsen & Scott, 1996），一直处于政府看不见的状态。进入新千年，新西兰政府决定由高等教育委员会参理成人和社区教育。表面上来看，这一措施使该领域得到了法律保障，并确保了资金来源。与学校教育相比，这

些还微不足道。最新的国际成人调查结果显示，新西兰的成人读写能力、计算能力等结果很差，这打破了原来新西兰拥有优质成人教育的神话，政府为了提升成年人的读写和计算能力，支持成人与社区教育，新西兰政府做了如下成人与社区教育“优先事项”承诺。

- 针对最初学习不成功的学习者
- 提高基础标准
- 加强社会凝聚力

重点领域包括：

- 读写、计算
- 英语，包括使用其他语种的英语课程（ESOL）
- 毛利语

“目标学习者群体”是那些最初学习不成功的群体、毛利人、帕斯菲卡（Pasifika）、移民和难民（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2013）。其目的是“提高”在教育上取得成就的人群数量。简而言之，这为实现社会包容而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从这一点上看，正规教育系统中开展老年人教育已经实现突破，只是用于老年人读写和计算教育（也许长辈迁移到这个国家加入了年轻家庭）、毛利语（鼓励部落老人流利地说毛利语并传承给年轻一代）和补偿教育（可能提升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的经费有限。

（二）工作场所中推进老年教育

老年人学习中最容易被低估的领域之一是与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有关的领域（包括有偿和无偿），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习要与工作关联。以前所有成人终身学习的主题之一便是经济约束。对老年人来说，这也没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的经济保障来自于个人和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具体工作条件（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临时或周期性）、在正式或非正式学习中各自教育范围，例如工作场所中的师徒关系。考虑到新西兰社会中存在一些社会歧视（Koopman-Boyden, 1993），雇主和雇员都可能无意中（希望不是有意地）接受老一套的社会歧视假设，比如老员工不如年轻员工那么有生产力；老员工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较差，这可能威胁到老年人的学习权利（Rothwell, Sterns, Spokus & Reaser, 2008）。

在对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Davey（2006）指出，2006年近40%的劳动力（从15岁到64岁）年龄在45岁以上，到2018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4%。更为重要的是，65岁以上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许多关于老年人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错误假设将要抛至窗外。国家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老年员工的潜力（Davey & Cornwall, 2003）。考虑到新西兰取消强制退休制度，老年员工和国家经济的“双赢”局面将会出现。随着越来越多的雇主认识到再培训/教育所有员工的好处，未来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老年教育项目都将继续下去。

（三）成人项目中的自主学习

一个较少关注的年长成人学习领域，特别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便是自主学习（SDL）。自主学习的概念有多种含义（Tight, 1996），成人学习项目（Tough, 1971）蕴含自定计划、学习努力理念的非正式自学活动，这些都与老年教育相关，其中大部分自主学习活动为非正式的形式（McGivney, 1999）。当然新西兰也是如此，自主学习的特征是较少受社会阶层影响。无论性别、社会阶层、种族或地理位置如何，老年人都可以独立或在社会中学习。

志愿活动是老年人参与学习活动的另一个领域，他们的学习程度与其志愿者的参与程度紧密相关。考虑到这是自愿选择，老年志愿者参与实践社区相关的自主学习，通常是社会服务。在绿色和平组织、学校导师、慈善机构服务、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导游等组织中随处可见年长员工。与工作相关的是，他们凭借经验和通过适当培训来学习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为实现组织有效而做出贡献（Jarvis, 2001）。

四、新西兰老年教育的政策维度

（一）老年教育的多层次性

新西兰在不同层面（包括国际、政府、机构）运行与老年人生活有关的政策，从不同视角（学习/教育、健康、财务状况、社会福利、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推进。对于老年教育，政府需要一整套的组合政策以及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完成（Boston & Davey, 2006）。

随着成人教育政策的减少，终身学习政策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Findsen & Formosa, 2011）。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经合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新西兰已经是成人教育、终身学习所有重大国际倡议的签署国，是终身学习的积极追随者，特别是提倡民主化。正如《富尔报告》（1972）及许多后续报告（MoE, 2008）提倡的，成人与社区学习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老龄化和教育工作小组（Ageing and Education Working Party, 1987）是老年教育领域积极推动的重要力量，该组织受新西兰全国成人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dult Education）领导，该委员会建议改革举措来突出晚年生活问题、要求教育反馈、明确老年教育成为未来主要关注领域，可惜后来该委员会解散。最近，“终身学习”这个短语已经纳入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语境，但未必能转化为对大龄学习者的经费支持。

（二）积极老龄化的推进策略

与终身学习政策相比，政府更倾向于应对老龄化政

策。正如Tobias (2006) 所言，1999年工党/联盟政府制定了一个积极的老龄化战略 (Positive Ageing Strategy)，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新政策由新西兰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的老年办公室 (Office for Senior Citizens) 执行。老年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强调老年教育的意义重大：

新西兰积极的老龄化战略强化了政府承诺，致力于促进提升社区中老年人的价值和参与度。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在晚年有权利享有尊严。他们有技能、知识和经验，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1999, p.2）。

这份文件中对老年学习有明确的定义——有能力积极衰老，终生辅以良好教育投入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1999, p.3)。关于以后工作生活选择，政策中规定“必须更加重视所有职工的终身学习，以使他们保持和提高自身技能和生产力”（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1999, p.4)。老年办公室支持10项积极的老龄化目标及具体目标，与收入、健康、住房、交通、社区老龄化、文化多样性、农村、态度、就业和机会等因素一致。这些领域中有几个直接提到为老年人提供持续学习/教育。因此，总的来说，政府很关注老龄化问题，支持终身学习。然而，在支持目标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三）政策推进中基金会的角色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2008, p26) 在评述新西兰成人和社区教育中指出，参与这一领域的老年人 (65岁以上) 比例相对较高。成人与社区教育，除了社会效益之外，对个人心理和身体健康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例如，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特别是该校的继续教育) 和卢瓦瓦慈善信托基金（Rauawaawa Charitable Trust) 关系紧密，对保持新西兰部落老年成人学习项目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信托是一个全方位实体，也是为了提升毛利部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而成立。从历史上来说，项目设计是由信托基金和大学共同制定，项目推进中将领导权移交给继续教育中心，长期与毛利人教育、当地社区保持联系。该计划的资金一直由高等教育的成人和社区教育分配，直到最近政府停止向大学提供成人和社区教育 (ACE) 经费。信托基金和大学商定了一项协议备忘录，以确保该方案能够执行。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该方案要符合大学参与的标准 (由高等教育委员会提供)，适合于大学。从信托基金的角度来看，这必须满足毛利人意识形态中可持续学习的原则，并积极运用符合毛利人文化的教学法。

现在信托基金的职责仍然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尤其是老年人。该项目独特之处在于关注部落老人，从全球来看通常优先考虑年轻人。项目引发同伴学习、大规模学习。它的使命宣言是，通过提供健康、社会、教育和金融服务来提高部落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为此，部落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如计算机文化、健康饮食、毛利语言、文化关爱项目、动作类歌曲和演讲、制衣和亚麻篮制作。

五、结语

老年教育很难被认为是新西兰教育的一个独立领域，但大量老年人参与学习，尤其是在非正式和非正规领域。就结构性教育机会而言，老年教育与高等教育并未整合，老年教育资金不足，政府也不感兴趣。因此，成人教育领域的专业方向并未建立老年教育就不足为奇。此外，国家削减成人和社区教育资金投入（高中社区教育和大学教育)，将更多责任交给个人和团体，让他们组织自己的学习活动。这种自助的传统相当普遍，特别是中产阶级，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然而，忽视年长男性学习将是一个错误，更重要的是这与男权文化相一致。新西兰社会正迅速从其欧洲历史根源转向具有多样化和老龄化人口的多民族基础。可以论证的是，两元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将会持续下去，而老年人的学习和教育形式将会更加多样化和创新，将会有更多的本土形式和更少的衍生品。

参考文献

[1] Age Concern New Zealand. (2011/2012). Annual report – 1 July 2011 to 30 June 2012[R/OL]. (2014-01-22). http://www.ageconcern.org.nz/acnz/publications.

[2] Ageing and Education Working Party. (1987). Age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New Zealand[M]. Wellington: National Council of Adult Education.

[3] Benseman, J., Findsen, B. & Scott, M. (Eds.) (1996). The fourth sector: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M]. Palmerston North: The Dunmore Press.

[4] Bishop, R. & Glynn, T. (2003). Culture counts: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M]. London: Zed Books.

[5] Boston, J. & Davey, J.A. (Eds).(2006).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M].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6] Dakin, J. (1992). Derivative and innovative forms of adult educat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20 (2): 29-49.

[7] Davey, J.A (2006). The labour market[A]. Boston, J. & Davey, J.A. (Eds).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M].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189-220.

[8] Davey, J.A. & Cornwall, J. (2003). Maximising the potential of older workers[M]. Wellington: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eing.

[9]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1999). From welfare to well-being and strengthening families[M]. Wellington: Ministry of Social Policy:2-4.

[10] Findsen, B. (2005). Learning later. Malabar[M]. Florida: Krieger Publishing Co.

[11] Findsen, B. & Formosa, M. (2011). Lifelong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 handbook on older adult learning[M].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12] Golding, B. (2012). Men's sheds, community learning and public policy[A]. Bowl, M., Tobias, R., Leahy, J., Ferguson, G. & Gage, J. (Eds). Gender, masculinities and lifelong learning[M]. Abingdon, Oxon: Routledge:122-133.

[13] Jarvis, P. (2001).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n introduction for educators and carers[M]. London: Kogan Page.

[14] Jarvis, P. (1985).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M]. Athens, Georgia: Department of Adult Education.

[15] Koopman-Boyden, P.G. (Ed.) (1993). New Zealand's ageing society: The implications[M]. Wellington: Daphne Brasell Associates Press.

[16] McGivney, V. (1999).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community[M]. Leicester: NIACE.

[17] Metge, J. (1984). Learning and teaching: He tikanga Māori[M]. Wellington: Māori and Island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8]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Older students[M]. Wellingt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 Māori participation in tertiary education 2005[M].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art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National report of New Zealand[M]. Wellingt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1] Oduaran, A. & Bhola, H. (Eds). (2006). Widening access to education as social justice[M].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2] Phillipson, C. (1998). Reconstructing old age: New agendas i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3]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2008).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Economic evaluation of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outcomes[R]. [出版社不详].

[24] Rothwell, W.J., Sterns, H.L., Spokus, D. & Reaser, J.M. (2008). Working longer: New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training and retaining older employees[M].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5] Scott, D. (2010). Non-formal and formal learning – adults in education[M]. Wellingt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6] 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13). 2013 Census QuickStats: About national highlights[R/OL]. http://www.stats.govt.nz.

[27] Swindell, R. (1999). New direc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New Zealand U3As[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27 (1): 41-57.

[28]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2010) Tertiary Education report: Introduction to the key issues in Tertiary Education[R]. http://www.tec.govt.nz.

[29]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2013)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Z/OL]. (2014-01-23). http://www.tec.govt.nz.

[30] Thomas, L. (2001). 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M]. London: Continuum.

[31] Tight, M. (1996).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 concepts[M]. London: Routledge.

[32] Tobias, R. (2006). Educating older adults: Discourses, ideologies and policies 1999-2005[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34 (1), 2-28.

[33] Tough, A. (1971). The adults' learning projects: A fresh approach t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dult learning[M].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34] Tuckett, A. & McAulay, A. (Eds.) (2005). Demography and older learners[M]. Leicester: NIACE.

[35] Walker, R. (1990). Ka whawhai tonu matou: Struggle without end[M]. Auckland: Penguin.

[36] Wain, K. (2004) The learning socie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The education crises[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37] Wenger, E. (1999).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 Withnall, A. (2010). Improving learning in later[M]. London: Routledge.

本文得到授权译自下列英文版：Findsen, Brian (2016). New Zealand. In Findsen, B. & Formosa, M.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older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policies and practic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pp. 297-308.

作者简介

布莱恩·芬德森（Brian Findsen），博士，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教育政策、终身学习等，曾在美国、英国、新西兰多所大学任教，承担成人教育研究与教学工作。

译者简介

吴亚婕，博士，副研究员，北京开放大学。

苑大勇，博士，副研究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

New Zealand Older People Education: Context and Policy Overview

Brian Findsen

(University of Waikato，Hamilton 3240, New Zealand)

Abstract: In New Zealand and rest of the world,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education for the older people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The learning model of New Zealand’s older education is through informal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lifelong learning is diverse, most of them are focuses o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active citizens, and enhanc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society etc. New Zealand’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workplaces are all educating older people. Older education are multiple levels, active ageing has become a policy priority, and the foundations are become important roles.

Keywords: New Zealand; older people education; active ageing; policy

---

（上接第40页）

[21] 习近平（2018）.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 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

[22] 映维网（2018）. 与Labster合作，谷歌开始为多个高校提供VR情景实验教学[EB/OL].[2018-8-24]. http://yivian.com/news/49677.html.

[23] The Open University（2018）.Case study: Jane Radvan [EB/OL].[2018-7-30]. http://www.openuniversity.edu/life-enhancing-learning/pursue-an-interest/jane-radvan.

[24] The Open University（2018）.Case study: Clara Mancini [EB/OL].[2018-7-30]. http://www.openuniversity.edu/life-enhancing-learning/change-the-world/clara-mancini.

作者简介

韩斌，博士，北京开放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在线教育发展战略、远程学习者体验设计等。

The Goal of Onlin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Whole Man”

HAN Bin

(College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Strive to develop education for all and lifelong education, make each citizen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to develop himself,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benefit the public, is a clear requirement to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change of talent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the service target of online education is no longer traditional learner, so the goal of onlin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ssue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listic mission of online education for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noble education and for-profit education,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personal goals and social goals, suggests that the final goal of online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a simple commercial purpose, but to cultivate “the Whole Ma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is final goal, online education should also broadly cultivate the society’s innovative genes, and provide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services.

Keywords：online education; educational goals; the whole man; offline education